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当代托洛茨基主义 ——埃内斯特·曼德尔思想研究

Dangdai Tuoluocijizhuyi
Aineisite Mandeer Sixiang Yanjiu

吕佳翼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当代托洛茨基主义 ——埃内斯特·曼德尔思想研究

Dangdai Tuoluocijizhuyi
Aineisite Mandeer Sixiang Yanjiu

吕佳翼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托洛茨基主义：埃内斯特·曼德尔思想研究 / 吕佳翼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8

ISBN 978-7-5161-8799-9

I. ①当… II. ①吕… III. ①曼德尔 (Mandel, E.) —思想评论
IV. ①D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81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莎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42 千字
定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是 2015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后期资助项目，课题名称：“当代托洛茨基主义——埃内斯特·曼德尔思想研究”，课题编号：15HQZZ015）的最终成果。



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当代“第四国际”主要领袖，托派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序

孙承叔^①

吕佳翼的力作《当代托洛茨基主义——埃内斯特·曼德尔思想研究》一书终于要出版了，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十分欣慰，这是他近四年刻苦研究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这本书也是我国系统研究曼德尔思想的第一本专著，具有重新开启托派思想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托洛茨基之后，曼德尔是“第四国际”最主要的领导者和思想家，由于他与“托派”的千丝万缕联系，因而自然也在批判之列，然而他却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被研究的学者仅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极小的一部分，即在哲学上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不满并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一部分学者和思想家。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在西方自称马克思主义并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大有人在，曼德尔就是其中之一。其实，从更开放的心态讲，西方社会民主党、欧洲共产主义、“第四国际”的思想家、理论家都应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都自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理应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曼德尔著作等身，发表的专著就有几十部，尤其是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长波理论、过渡社会理论的提出，需要坚实的马克思《资本论》理论功底和现代史知识。吕佳翼几乎研究了他的所有著作，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手稿，研究了当代史和国际共运史，研究了部分的“托

^① 孙承叔（1948—），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历史哲学、《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

派”著作，以及国内能获得的所有研究资料。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曼德爾的思想，他还亲自翻译了他的两本专著和许多论文。正是这种扎实的研究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才造就了今天的学术成就。

我感到吕佳翼专著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厘清了传统社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分歧的真正根源

谈曼德爾自然不能离开托洛茨基，因为曼德爾是托洛茨基主要思想的继承者。托洛茨基曾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对军队的领导和在党内的地位也高于斯大林，为什么在列宁去世以后，却变成了“托派”领袖，成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党内的别动队”，成为“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先锋队”，并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一场清除“托派”的运动？吕佳翼研究后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批评。斯大林是在1924年秋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构想的，并于1925年逐渐背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27年开始合作化和国有化运动，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国有制加计划经济。这一理念一露头，托洛茨基就开始批判。

托洛茨基认为我们面对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不能离开普遍的世界交往的，因而想在封闭的环境中搞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他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生产力赶回到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猛烈企图冲破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中去呢？”“正是这个论点先天就把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一种反动理论而排斥、拒绝和抛到一边去了。”^①不要说落后的俄国，即使生产力发达的英国，也不能在一国的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没有海外资源和贸易等，英国这个拥有高水平生产力的国家就会站不住

^① [苏]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5年版，第46页。

脚。如果海外资源和贸易被切断，生产力很快就会下降。所以说，在大不列颠岛上也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①

由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前提，因而为了推进这种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必然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罪人，成为“托派”，成为被批判被清洗的对象。

托洛茨基是不断革命论的坚持者，认为任何国家都必须进行革命，以确保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但革命后依然要不断革命，因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建成，如恩格斯所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② 由于落后国家没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③ 因此在落后国家匆忙宣布并实行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变私有制为国有制，实行全国范围的计划经济，其结果将在两方面阻碍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在国内，无可避免地要形成官僚阶层，变工农国家为官僚国家。因为全国的人、事、物，全国的生产、经营、消费、分配、生活都纳入统一的管理，没有一支全国性的官僚队伍是不行的。为了镇压反对派，维持社会的平稳，没有强大的警察、监狱、法庭、军队和宣传机器也是不行的。生产力的低下，决定了官僚国家成为国民财富最大侵吞者，成为与民争利的最大异在，而民众则长期处于贫困中，人民的国家异化为官僚的国家。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所说：“官僚征服了比左翼反对派更多的东西。它征服了布尔什维克党。它击败了列宁的纲领，而列宁曾经看到国家机关‘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主要危险。官僚击败了所有这些敌人：反对派、党和列宁，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思想和论辩，而是自己的社会力量。官僚的沉重的臀部压倒了革命的头。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秘密。”^④ 斯大林创造了官僚国家机器，并维护着这台机

① [日]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③ [苏]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十章，柴金如译，载《“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25页。

④ [苏]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编印，第67页。

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其结果只能是“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是国家属于官僚”^①。

第二，在国际上，则彻底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推出以后，要求“第三国际”各国支部以保卫苏联政权为最高职责，不仅要求各国开展清除“托派”运动，而且要求各国革命服从保卫苏联运动，从而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这实际上分为两块，第一块是不适当地要求各国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失败，而且造成德国、英国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指出：“从一九二三年起……我们所看到的已经不只是无产阶级的失败，而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失败。这种政策在德国、英国和中国造成的严重错误……在德国，由于一九二三年领导集团的投降，无产阶级发现自己的力量已被消耗殆尽；在英国，无产阶级受到共产国际直到一九二六年还继续和它保持同盟关系的一个领导集团的欺骗和出卖；在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把无产阶级骗进了国民党的圈套。这是造成失败的直接的、无可争辩的原因。”^② 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使各国共产党产生了要摆脱共产国际控制走自己革命道路的愿望，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成为民族共产主义兴起的理由，其结果也就导致了第三国际的最后解散。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如果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范围以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着手鼓吹这个理论……法国的党也会起而效之。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崩离析的开端。”^③

第二块是不适当地夸大了与社会民主党的对立而助长了法西斯势力。为了强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斯大林把暴力革命原则绝对化，从而把主张议会道路的西方社会民主党统统看作是法西斯帮凶，是一种“社会法西斯主义”，其结果不仅阻碍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而

① [苏]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编印，第182页。

② [苏]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5年版，第206—207页。

③ 同上书，第63—64页。

且助长了法西斯势力。托洛茨基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把社会民主派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是荒谬的。面对纳粹主义的威胁，建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绝对必要的。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由于纳粹主义危及自身，因此至少对于党员群众来说，是存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的。”^① 斯大林的错误是在关键时刻阻碍和延迟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由于对内停止革命，变人民国家为官僚国家，对外停止革命，变世界革命联盟为苏联的工具，托洛茨基才决意成立“第四国际”，希望把革命进行到底。托洛茨基希望重建革命的领导中心，但是“这个中心不是依靠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中心’。它不会无视各国大多数党员的成熟程度和理解能力，随意指派或废除他们国家或党的领导。它肯定不会不顾不同国家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发展，强行颁布带有强迫性质的‘策略’……而最主要的是，这个中心绝对不会迫使任何一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从属于另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或服从于另一国的外交策略。我们要的是这样一个中心：它能把一切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经验、实践以及从中得出的教训集中起来。它要以这种集中为基础，用公开讨论以及以理服人的方法，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向所有共产党人提出一个一般的方针。它还要以无产阶级采取的越来越多的共同行动来取代现在那种口头上的‘团结一致’和枯燥无味的‘经验交流’。因此，这个‘中心’将用不断发展的国际革命力量的集中来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国际性集中。”^② 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离开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和实践，我们很难理解这段历史。也正因此，吕佳翼断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一直可以追溯到‘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个源头。”（本书第137页）这一分析是深刻的，也是大胆的。

二 肯定了曼德尔对当代世界的二大理论贡献

曼德尔继承了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并在两个方面推进了这一理

^① [日]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② [比] 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齐春子、胡尔湖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4—35页。

论，一是提出了著名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二是提出了极其深刻的过渡社会理论。

曼德尔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其之所以有如此影响力，根本原因是他继承了马克思分析当代社会的立场和方法，他的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分析基础上的。

1962年，他发表的第一本成名作就是二卷本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本书是他在10年中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结果。两年后，他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由于简明，被翻译成12国文字，销量达到200万册，成为当时学术影响最广的一本书。以后又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年）、《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1976年）、《第二次衰退：对1970年代经济衰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978年）、《新〈资本论〉导言》（1981年）等与经济相关的著作，但影响最久远的是《晚期资本主义》（1972年）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80年），正是这两本著作奠定了他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而他的经济学功底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界也是非常罕见的。

曼德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古典帝国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点分析的是前两个阶段，由于有马克思和列宁，因而有了分析的利器，而最难的是第三阶段，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互相打仗，而是互相勾结压迫第三世界，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率下降的规律一再被突破，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不再期望暴力革命，世界革命的希望在哪里？为此他花大力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和长波理论就是他对世界学术界的最大贡献。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花大力研究世界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社会主义，说明苏联。“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大的背景，离开资本统治的时代性质不可能说明社会主义。

吕佳翼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这两本书的内容。

曼德尔认为，与自由资本主义与古典帝国主义时期相比，晚期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特征是世界市场的真正形成。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活动范围很狭小，因而国内矛盾尖锐。资本的生命在世界市场，因而争夺世界市场，成为古典帝国主义必然选择，其结果是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

世界大战一方面证明了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贪婪性和狭隘性；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还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积累的财富损失一半以上。正是这一血的教训使美国的倡导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共识：变竞争为垄断，不再是发达国家间的武力竞争，而是互相间结盟，制定游戏规则，共同统治世界。布雷顿森林会议、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工具应运而生。资本不再需要直接统治殖民地，但是资本需要任何国家都向资本开放。正是在美国的倡导下，真正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由于发达和不发达并存，由于资本能自由地游走于世界各地，其必然的结果，是财富不断地向发达国家转移，这是理解晚期资本主义一切现象的基础，也是制定“第四国际”一切革命战略的基础。正如曼德尔所说：“资本积累本身就产生发达和不发达。”^①“如果没有不发达的地区，也就不可能有剩余转化到工业化地区去，因而那里也就没有资本积累的加速。如果没有不发达国家的存在，在整个这个历史时期之中，就决不可能有剩余转化到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有资本积累的加速。如果没有不发达的工业分支的存在的话，也不会有剩余转化到所谓发达的部门中去，而且在过去这二十五年中，也不会有相应的资本积累的加速。”^②正是落后地区的存在，以及不断拓展的世界市场使资本获得再生的能力。因此三个历史时期，资本的内在本质是一样的，“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决不是暗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有了变化。”^③它的本质仍然遵循资本积累的原则。

但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竞争走向垄断，共同统治着世界，因而它又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1)国家的干预作用越来越强，它不仅干预国内经济，而且维持国际秩序。(2)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并形成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虚拟资本。(3)多国公司形成，并成为“大资本有决定意义的组织形式”^④。(4)落后国家、第三世界越来越边缘化。(5)消费社会形成，并瓦解着无产阶级的斗志。(6)科技与资本联盟，“科技意识形态已经内化到人们的性格、本能结构之中，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

③ 同上书，第3页。

④ 同上书，第368页。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① (7)持久的通货膨胀和军事工业，成为发达国家转移矛盾、控制世界、增长财富的工具。因此晚期资本主义不是矛盾的缓和，而是潜藏更深的冲突。吕佳翼在书中详细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并单辟一章全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经济异化、政治异化、技术异化、社会异化、宗教异化和思想异化。

构成晚期资本主义核心内容的是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每50年左右要进行一次周期性的波动，从扩张进入收缩，再从收缩进入扩张。“在这长波中，走下坡（从扩张性长波进入萧条性长波的阶段）是内生的，而上升则不是，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能够引起平均利润率强大而稳定地上升。”^② 吕佳翼说：“根据曼德尔对长波的历史分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共经历了四次长波：第一次是1793—1847年，其中1793—1825年为扩张期，1826—1847年为收缩期；第二次是1848—1893年，其中1848—1873年为扩张期，1874—1893年为收缩期；第三次是1894—1939年，其中1894—1913年为扩张期，1914—1939年为收缩期；第四次是1940年以后，其中1940—45^③—1966年为扩张期，1967年起为收缩期。扩张期以利润率的上升为主要特征，收缩期以利润率的停滞或下降为主要特征。”（本书第82页）这四次长波又与大国的兴衰有很大的关系，“1848—1873年英国居相对霸权地位，1873—1893年英国的霸权地位下降，1893—1913年英国又居相对霸权地位，1914—1940年英国的霸权地位又下降，1940（48）—1960年代美国居霸权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对下降。”（本书第84页）不仅如此，“四次长波又是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四次技术革命的：第一次是工业革命本身的长波；第二次是第一次技术革命的长波；第三次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长波，第四次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长波。”（本书第85页）由于曼德尔的原创性，因而他的长波理论成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在这里，他坚持了马克思的资本分析原则，“任何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只

① 刘英杰：《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第54页。

② [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3页。

③ 北美自1940年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自1945—1948年起。

能够是一个资本积累理论。”^① 同时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虽然不如哈贝马斯那么视域宽广，从现代国家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两方面进行分析，但曼德尔始终坚持从资本原则，从经济领域这一基础进行分析，因而不失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曼德尔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要研究现代社会主义，曼德尔学说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对当代社会主义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曼德尔的过渡社会理论。吕佳翼认为这是对于中国学者最有价值的部分。

过渡社会，即两个相继演进的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曼德尔研究过渡社会的目的是要说明苏联本质上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苏联是他思考的重心，苏联的模式影响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苏联的蜕变，将直接改变社会主义运动。他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1967年）、《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1976年）、《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1977年）、《论欧洲共产主义》（1978年）、《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1992年）等著作中。

曼德尔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苏联社会有两个先天不足，一是生产力落后；二是西方革命没有成功，因而是在孤立、落后的环境中向社会主义过渡，本应走承认市场经济的新经济政策道路，但自1924年秋以后，斯大林不顾生产力落后的事实，不顾西方革命没有成功并作出榜样的事实，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贸然推进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其结果造成官僚与民生的长期对立，最后由于权力与货币的相互勾结，而葬送了苏联和相当一批国家的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认为闭关锁国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生产力赶回到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猛烈企图冲破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中去呢？”^②

① [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页。

② [苏]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璐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5年版，第46页。

苏联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国家所有和计划经济，但是又实行全员工资制，因而消费领域遵循的是市场逻辑，由此曼德尔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经济秩序，是受两个对抗性的经济逻辑所统治的：计划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因而，过渡社会的特有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非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与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分配关系产生的商品生产因素（带有朝向私人占有和私人致富的动力）的混杂结合。这个结合是……在社会主义未能充分成熟之前被资本主义压制的结果。”^①

由于是国家所有和计划经济，因此要管理全国的人、财、物，要维持社会稳定和防止暴乱，必须要建立强大的官僚体系，包括军队、警察、监狱、法庭和宣传机器。由于生产力低下，因而可供分配的财富非常有限，而国家又不可能不依靠官僚进行管理，这些无权的官僚往往在尝到权力的好处后发生异化，因而与民争利必不可免，官僚与民生的矛盾构成过渡社会的基本矛盾。曼德尔把它们称为官僚变态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工人官僚国家。“由于苏联经济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管理，苏联经济的计划性和被看作完成计划的主要动力的官僚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苏联经济的主要矛盾。”^② 成为官僚，追逐利益成为人们潜在的价值追求，“建立机构（指官僚机构——引者注），这最初只是被视为一种手段，但很快却被视为目的。特别是那些自认为与这些组织具有最为直接的关系、并把自己与这些组织等同起来的人，以及经常参与组织活动、体现机构、扮演主要官吏和将来官僚角色的人，更是把它视为目标。”^③

托洛茨基曾深刻地指出：“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费品，因此便引起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如果商店里的货物充足，购买者就可以随时去买。如果货物很少，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而在队排得很长的时候，就必须指派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④

① [比]曼德尔：《过渡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规律十点提纲》，何虹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②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16页。

③ [比]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高德平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④ [苏]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编印，第80

由于分配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因而形式上是全民工资制，而实际上是极其不公平的，因为官僚可以享受许多特权，正像曼德尔所说的：“一个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者用8小时劳动能够交换到的消费品数量是X，那么一个高级官僚在同样工作8小时之后，则不仅得到他的薪金，而且还能得到以实物形式提供的特殊的奢侈品和服务，相当于10X或者20X。”^①

因而当权力为官僚的利益服务，当权力与货币相勾结，当民众长期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无钱、无权、无声的时候，苏联政权的瓦解也就成为必然的了。正如托洛茨基在1933年10月的《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一文中所写：“官僚主义继续无阻碍的发展，必定会导致经济、文化发展的停顿，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整个社会的向下滑落。但是这就不但会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而且意味着官僚统治的结束。代替工人国家的，将不会是‘社会官僚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②曼德尔长期否定官僚社会的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但在苏东剧变发生后，他最后也认为：“它（即苏联社会中的官僚阶层——引者注）无法使自己演化成为一种新型的统治阶级，而只能蜕变成为旧的资本家阶级。”^③其实官僚属于什么阶级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官僚脱离了人民，伤害了人民，以致苏联国旗落地时没有人民站出来捍卫这个政权。

吕佳翼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因而“在‘一国社会主义’、官僚主义和苏联解体这三者的联结中，曼德尔实际上对苏联解体提出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解释逻辑：‘一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落后→官僚主义蜕变→苏联解体。”（本书第178页）

三 对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体制与苏联的体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唯一不同的是中国及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而苏联则没有，在社会生活的相当方面，中

①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② 转引自：[比]曼德尔：《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兆立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第三章，注释[38]。

③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国至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体制的存在，因而认真研究曼德尔对苏联社会的分析，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曼德尔认为苏联进行十月革命是完全正确的，革命后国家代表人民把主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也完全是正确的，问题是在生产力低下和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过早地实行全国范围的计划经济，一方面，把经济的发展封闭于一国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在官僚队伍建立起来后，政权就停止了革命，官僚逐渐演化为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

曼德尔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即生产者和全体公民的自我管理。”^① 苏联的计划经济本质是国家的管理代替生产者与公民的自我管理，财富的分配权是掌握在官僚手里，而不是生产者自己手里，因而生产者与国家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与国家的关系，本质上并没有建立起能激发劳动者积极性的公有制体系。

此外，在过渡社会，“计划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而决不能消极地在市场面前屈服……计划应当用刺激的办法去领导市场。”^② 排斥市场只能加强官僚的权力。在农业方面，曼德尔认为过渡社会不可强行实行农业国有化，“工人国家必须优先考虑成立主要是雇农和贫农参加的农业合作社或集体组织。这些组织在初期必须接受国家的投资和贷款，使他们能够以比私人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进行生产。这些组织必须能够给它的成员提供比中农，甚至一部分富农还要高的生活水平。”^③ 也就是说，是适应市场的集体经济，而不是纳入计划的国营经济。

由于官僚对全国，尤其对全国经济的管理，因而它具有非资本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两面性，“工人官僚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最清楚地表现在行政权力和货币财富的关系中。官僚集团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掌握货币财富，而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另外，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和货币财富的影响。而这个集团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则是体现于如下

①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3页。

② 同上书，第273页。

③ [比]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高德平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6页。

的事实，即它无法将自己从权力垄断和货币权力相交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法建立起全新的统治机制。”^①正是权力与货币的双重诱惑，使官僚最终脱离人民。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一书中，对国民收入（分成三部分，即生产者个人消费、积累、非生产性消费如军工等）变化作了以下的统计：生产者个人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官僚统治前期的55%下降到官僚统治后期的35%，而全国经济积累的相应变化是从15%上升到20%，相反全国非生产性消费则从30%上升到45%^②，因而人民的收入实际并没有与经济同步上升，而是下降了20%，而非生产性消费，包括军火工业、军队、警察、监狱、法庭、宣传部门的开支，以及官僚的特权享受，却上升了15%，这正是政权脱离人民并与民争利的最好佐证。

生产者个人消费的下降，必然“会导致生产者蓄意怠工，对生产不负责任，因而不得不依靠‘强迫劳动’……在苏联……强制的手段，不是市场规律，而是行政控制、压制和镇压——即官僚专制主义。”^③

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是在苏联，党必须依靠官僚才能维持统治，因而不是代表人民对官员进行监督，实行民主选举、撤换、轮换，而是维护官僚利益并对不同政见进行压制，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堕落。

曼德尔认为，面对官僚的两重性，过渡社会最重要的是进行民主建设，他在《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一书中指出：“托洛茨基认为，官僚层的专政是一个历史过渡现象。这种现象，至少在长期中，会无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如果在这种复辟发生以前它不被工人权力、苏维埃民主的恢复所取代的话。”^④因而恢复工人权力和苏维埃民主是关键。

曼德尔提出确保工人政权的四点意见：1. 应当在社会主义宪法的范围内允许广泛的政治自由，包括结社、示威、罢工、出版的自由，和组织

①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② 同上书，第43页。

③ 同上书，第42页。

④ [比]曼德尔：《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兆立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第三章。

不同政党的自由。2. 社会主义应当实行多党制，允许工人内部的不同派别以政党的形式活动。禁止其他党派和党内不同派别的存在，是使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抵制官僚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3. 党政应当严格分离，党不能在任何程度上代替群众行使权力，党的领导是通过以正确的理论和纲领使群众信服来实现的。4. 应当发展直接民主，“尊重工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或大众委员会的民主。”^①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实行生产者自治，这是国家逐渐消亡的实质和基础。

曼德尔强调：“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百万个以上。我们未必有能力去解决其中一半。”但如能解决以下“6个至7个问题便足够了：要消除阶级社会、铲除人与人的剥削和压迫、根除社会不平等，容许社会所有人发展他们的独特潜能、消除战争和群体暴力。”^② 因而曼德尔的基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的。

为了把问题引向深入，曼德尔提出了一个引人沉思的问题，即在过渡社会，我们能不能在某些最基本的消费领域实行最初级的“按需分配”？即某些最基本的领域是非市场的。这些最基本的领域指满足一个人生存最基本的粮食、医疗、教育、养老等需要。

曼德尔认为，人类作为生物和社会个体，在基本需要的量上而不是质上具有某种“一成不变”的稳定特性。“稍为严肃地研究一下人类学和历史，就能证明：这些需要恰恰是异常稳定的。食物、衣着、住处（由于某些气候条件的关系，还有取暖）、防止野兽侵袭和躲避风雨、装饰和锻炼筋骨的愿望、传宗接代，这六种基本需要似乎从猿人到真人以来还未变过，现在也仍然占消费开支的绝大部分。加上医药卫生方面的需要和消遣的需要……这少数基本需要，与其说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毋宁说是人类学上的特点。”^③ “既然这些需要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基本上是不变的，既然连过去最富有的有产阶级也没有在消费开支上超出这种异常狭窄的需要范围，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达到物

①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67.

② [比]曼德尔：《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③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7页。

资丰富、个人觉悟和社会觉悟都比过去成熟得多，这会在需要方面引起极大的变化。”^① 如果在过渡社会，能逐渐对这些基本需要实行最初级的按需分配，那将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如果“对该产品实行免费分配，较之以不断下挫的‘实际’价格继续出售该产品，在经济上要更有效率，因为产品的分配成本会大大降低。”^② 如过去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医疗成本比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疗成本要低得多，不会产生现在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的情况，使广大人民群众有一个最低的医疗条件。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向社会主义迈进了一步，“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物质生活不稳定和无保障状态，第一次消失了，恐惧和绝望的心情也随之消失了。无保障状态曾使一切个人，其中还间接地包括属于统治阶级的个人在内，产生这种恐惧和绝望。”^③ 由于实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正如曼德尔所正确地指出的：“只有实现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产生新的生活方式。问题不在于宣传社会主义道德，而是要创造社会的和心理的物质条件，使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实行这种社会主义道德。”^④ 曼德尔所提的这一点，对中国难道没有现实意义吗？

对于曼德尔的局限性，吕佳翼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例如过于激进，不仅对苏联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欧洲共产主义进行了过激的批评，忽视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正面意义；对现实并没有理想的近期改革方案，理论上带有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缺乏研究，并没有真正解决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西方并终生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于一个活跃于国际舞台、领导世界上仅存的国际共运组织长达几十年时间，并提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两大理论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研究，并从中吸取营养吗？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我们只有面向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坚

①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7页。

②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

③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5页。

④ 同上书，第292页。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从哲学上批评“正统”并受到“正统”批评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以曼德尔为代表的“第四国际”，则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批评“正统社会主义”并受到“正统”批判和清算的马克思主义。

我相信吕佳翼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开辟了一个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领域，虽是初创并显得不够成熟，但理论高度、理论深度和理论勇气是值得赞叹的，我期望由此而引起一些讨论和争论。

2015年7月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	(12)
第一节 不断革命论——“纵的方面”	(12)
第二节 不断革命论——“横的方面”	(18)
第三节 不断革命论的当代局限——基于托派本体论的视角	(24)
第四节 托洛茨基对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批判	(30)
第五节 托派在苏联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对苏联社会性质与历史命运的再思考	(35)
第二章 “第四国际”与曼德尔	(57)
第一节 “第四国际”的形成	(57)
第二节 曼德尔与托洛茨基主义	(62)
第三章 “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与方法	(69)
第一节 “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	(69)
第二节 “晚期资本主义”的方法	(73)
第四章 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与晚期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的长期增长	(80)
第一节 曼德尔长波理论的主要观点	(80)
第二节 对曼德尔长波理论的主要批评观点评析	(88)
第五章 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面貌与基本矛盾	(93)
第一节 部分有理性与整体无理性之间矛盾的激化与国家力量的增强	(93)
第二节 科技、脑力劳动的异化与技术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	(95)

第三节	消费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100)
第六章	晚期资本主义与新殖民主义	(104)
第一节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经济结构	(104)
第二节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超额利润与不等价交换	(111)
第三节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新殖民主义	(116)
第七章	曼德尔对马克思异化论的理解与阐发	(121)
第一节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四种异化形式及其根源	(121)
第二节	矛盾与误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马克思 的异化理论	(127)
第八章	曼德尔的革命战略理论	(135)
第一节	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批判	(135)
第二节	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批判	(139)
第九章	曼德尔的革命主体理论	(146)
第一节	先锋党与工人群众的辩证关系——以阶级意识为 中心	(146)
第二节	“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马克思革命 理论的立足点	(156)
第十章	过渡社会的经济特点与主要矛盾	(163)
第一节	过渡社会理论小引	(163)
第二节	过渡社会的经济特点	(165)
第三节	过渡社会中官僚问题的根源	(170)
第四节	过渡社会中官僚的性质与趋势	(175)
第十一章	过渡社会的对策与前景	(180)
第一节	过渡社会中所应注意的问题或采取的措施	(180)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愿景	(184)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之基	(190)
结 语		(196)
附 曼德尔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		(203)
参考文献		(207)
后 记		(214)

导 论

我们曾经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批判代替研究，后来表明这是一种误解（片面的理解）。与此同时，在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还有另一种误解，这就是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把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看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因而也是以批判代替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在我们的误解中，如果说前者是从右的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后者则是从左的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能以愈来愈客观的态度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汲取其中的合理内容，作为在丰富发展当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在此语境中，前一种误解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纠正，甚至有矫枉过正之嫌，而对后一种误解的纠正则还较弱。总的说来，在国内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诸种流派的研究现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并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人们关注的视域中，并在近年来推出了一批新的著译成果；相形之下，托派“第四国际”的思想长期以来鲜受关注。固然，托洛茨基有其理论局限，托洛茨基的有些理论显然已为历史所证伪；固然，托洛茨基主义者把马、恩、列、托并提的观点颇可争议，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理论中也有不少因激烈而偏激、因执着而执拗之处。但是，其中并非没有真知灼见，并非没有值得我们思考、给予我们启发之处。比如托派对于苏联弊端的揭露、对于官僚主义根源的分析、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反思社会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的失败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比如当代“第四国际”领袖，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理论——就对国际左翼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也值得我

们深入研究。

因此，本书试图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和历史为背景，对当代“第四国际”领袖、著名托派理论家埃内斯特·曼德尔的思想作一较系统的研究。由于曼德尔的思想与托洛茨基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因此，对曼德尔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客观评价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由于曼德尔长期以来担任着“第四国际”理论的和实际的领袖，曼德尔的思想为20世纪下半叶的“第四国际”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通过对曼德尔思想的研究也能使我们把握当代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动态。总之，希望本书对曼德尔思想的研究能有助于在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之局限性的基础上，形成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重新思考托派提出的一些问题，发掘其中有价值的方面。这种“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对于我们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能有所启发；另一方面体现在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真义，其旨在：废除私有制、推翻任何形式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实现生产者的联合自治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曼德尔之所以能成为一位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在于他能不囿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固有框架，做单纯的传声筒，他能从马克思主义更早的鼻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作家的著作中直接汲取养分，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创的理论观点——如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形成自己的一定的理论体系。这些创造性的部分无疑是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发展，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发展，因而值得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批判地汲取和有选择地借鉴。

20世纪80年代，国内研究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阎志民著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极左派——托派“第四国际”》（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李显荣著的《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前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第四国际”的历史、现状和理论，但它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和人格有着太多的误解误读，因而对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持完全批判的态度，这阻碍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正面价值的发掘。后者是国内首部——恐怕迄今也是唯一一部全面研究和评述托洛茨基生平的历史著作，该著作在当时简单化、漫画式批判

托洛茨基的历史传统下试图把托洛茨基还原进一种历史、具体的语境中，其价值不容否定。但它对托洛茨基的历史叙述和理论评定还是深受传统成见的左右，翔实的史料并未能使它在对托洛茨基的研究和评价上形成更客观的观点，因为对史料的筛选和解读本是会受到先入之见的折射和过滤的。比如，它说托洛茨基创建“第四国际”“充分暴露了他妄图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野心”^①，说托洛茨基的遗嘱“主要是从个人的政治荣誉出发来写的”，因为他“非常贪图声名，关注着自己死后的政治荣誉和历史地位”^②，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其哲学基础就是唯意志论”^③，等等，都渗透了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不能说是客观的公允之论。20世纪90年代在台湾出版的唐宝林著的《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无疑也是这一领域中的开创性著作，但与上述《托洛茨基评传》相似甚至比它更严重，在对史料的筛选和编排背后是一副沉淀了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之成见的眼光，因此中国托派活动家和理论家王凡西说：“这本书的所谓‘资料丰富’，而其‘真实性’却大打折扣。”^④

近些年来，对托洛茨基的研究有所改观，对托洛茨基能持一种比较客观的研究立场，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也有明显的提高，改变了之前那种一边倒地批判托洛茨基的思维定式。比如，研究托洛茨基的文艺和文化理论的有李莉的《托洛茨基的文艺观》（《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5期）和邱运华的《问题与主义：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两文。前者分三个方面分析了托洛茨基文艺观的成因，流露出对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精彩段落的赞赏。后者从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艺”学说的评述三个方面论述了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并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个术语以及托洛茨基对它们的阐述，具

① 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2页。

② 同上书，第585—586页。

③ 同上书，第587页。

④ 谢山：《〈中国托派史〉是怎样一本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xieshan/marxist.org-chinese-xieshan-19960126.htm>。

有合理的内核，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建设过程中，具有先导的作用和参照价值。”^① 郑异凡的托洛茨基研究也推进了国内对托洛茨基的重新评价。他的《托洛茨基生平和思想简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 年第 2 期）一文在对托洛茨基生平和理论的扼要概述中同情地评价了托洛茨基的历史贡献，认为：“托洛茨基其人备受物议，但他无疑是个革命家，在苏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参与领导了俄国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建立红军并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他是最早揭露和批判斯大林错误的人物。在总结苏共丧权、苏联解体的教训中，托洛茨基当年的一些评论颇值得注意。”^② 但郑异凡也反对在对托洛茨基的重新评价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像某些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把托洛茨基神化成“先知”。郑异凡还编译了托洛茨基的部分著作。如果说以上所述的还只是研究托洛茨基的一些论文，那么陈秋霞的博士论文《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山大学，2009）则可以说是一部研究托洛茨基革命理论的专著。它详细地论述了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以及托洛茨基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具体论题和经济决策，使它们构成一个广义的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评析了其中的得失及其根源。陈秋霞与其导师合撰的《托洛茨基的重大理论贡献——纪念托洛茨基诞辰 130 周年》（《学术论坛》2009 年第 10 期）一文高度肯定了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认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经受了十月革命的检验”，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是对无产阶级的自主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高扬。”^③ 总之，近年来国内学界在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中的一个趋势是，逐渐发掘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价值，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肯定程度逐渐增加。但尽管如此，国内学界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关注和研究还显得非常有限，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价值远未得到充分的开掘，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如不断革命论的误解

① 邱运华：《问题与主义：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研究》，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第 72 页。

② 郑异凡：《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简论》，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 年第 2 期，第 44 页。

③ 陈秋霞、李尚德：《托洛茨基的重大理论贡献——纪念托洛茨基诞辰 130 周年》，载《学术论坛》2009 年第 10 期，第 44 页。

还是普遍性的，以讹传讹之处甚多。

与此同时，我们能读到另一类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中文著述，它们站在与前述对托洛茨基主义一边倒的批判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也与上述纯学术的研究有所不同。它们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作品，其著名者如郑超麟、王凡西（即王文元）等。他们把托洛茨基主义作为身体力行的信念，参与了几乎从中共建党以来就伴随的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托派活动。他们对托洛茨基主义基本持无批判的捍卫和辩护态度，自觉运用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和评价事物。他们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译介和关于中国托派活动的史料上。由于他们把托洛茨基主义主要作为信仰而非仅仅研究的对象，他们的翻译也往往是高质量的，如王凡西和郑超麟合译的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由于他们亲历了中国托派的历史活动，他们的相关记述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如《郑超麟回忆录》、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以及刘平梅的《中国托派党史》等。《中国托派党史》的目的是写出与上述唐宝林的《中国托派史》不同的另一种中国托派史。但尽管有这些理论贡献，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理论著述在学术性和原创性上显得不够，很难说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有什么发展。

国外研究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比较出色的著作主要有：波兰记者伊萨克·多伊彻著的托洛茨基的传记《先知三部曲》（包括《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分别出版于1954年、1959年和196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中译本）、日本学者对马忠行著的《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尼尔斯著的《革命良心》（高德平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利用了大量关于托洛茨基的第一手资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权威著作，它把托洛茨基称作“先知”，给予高度的评价，但也分析了托洛茨基的失误，它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态度是同情而不认同。对马忠行的《托洛茨基主义》一书概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历史，扼要而深入，对于了解和研究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颇具参考价值。丹尼尔斯的《革命良心》一书对苏共党内的历史细节多有披露，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的形成史。此外，皮埃尔·弗朗克著的《“第四国际”》（刘宏宜等译，商

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是研究“第四国际”历史的重要资料, 由于作者是与托洛茨基并肩战斗过的“第四国际”的领袖, 因此他对“第四国际”历史的记述是比较准确和细致的, 尽管也有评论认为该书作为“第四国际”下属学校的党史教材“已具有显著的领导层本位意识, 与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渐行渐远”。^① 曼德尔当然更是当代研究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家, 也是本书将要展开论述的对象, 所以此处暂不赘述。国外其他几部研究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著述, 可参看陈秋霞的博士论文《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文献综述”部分。总的说来, 国外研究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专著虽然数量也不多, 但却要比国内的研究(包括托派人士的论述)深入得多。

国内对当代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领袖和最大代表曼德尔的关注和研究就更为有限了, 尚无比较系统的研究, 尚未形成相关的专著。这与我们对托洛茨基主义本身的重视不够是有关的。在曼德尔的著作中, 《晚期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国内学者关注最多的两本。涉及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有以下这些论文。韩雅丽的论文《詹姆逊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指出詹姆逊是在曼德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詹姆逊的该理论把后现代主义文化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在理论上的反映, 因而, 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两相对应的关系。张亮的论文《晚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晚期资本主义”: 一种历史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 期) 梳理了“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桑巴特、纳塔莉·莫斯科斯、波洛克、霍克海默、阿多诺、曼德尔、哈贝马斯这些作者笔下的演变历程, 因而使我们了解到“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渊源和背景。唐正东的论文《在科学抽象与具体历史之间: 方法论的视角——从曼德尔、艾伦·伍德等人的方法论缺陷谈起》(《东岳论丛》2008 年第 3 期) 在与艾伦·伍德等人的比较的视域中, 批评了曼德尔的方法论缺陷, 指出曼德尔的方法论即中间环节理论的视域太过狭隘, 只考

^① “第四国际—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5%9B%9B%E5%9B%BD%E9%99%85>。

虑经济因素，而没有把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考虑在内。唐正东指出，曼德尔中间环节理论视域的狭隘，与他只是用它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晚期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长期增长的事实有关，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仅仅当作经验事实来加以解释”，而不是“视之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历史事实。”^①唐正东认为，虽然曼德尔也作出了晚期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危机的指认，但是，这与他以中间环节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长期增长的事实所作的解释是缺乏内在统一性的“两张皮”。赵光武的论文《晚期资本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首先简要地论述了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特点，然后结合其他人的观点论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形成、特点、走向及其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关联。

关注曼德尔的长波理论的主要是一些经济学背景的学者。许建康的论文《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经济纵横》2009年第11期）指出经济长波论各学派争论的最大焦点在于长波“第二个拐点”的发生学问题（即长波由收缩期进入扩张期的原因），论述了曼德尔对此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需要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进一步挖掘和思考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孟捷的论文《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述评》（《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马建堂的论文《长波理论模型评述》（《中州学刊》1990年第3期）、肖磊和赵磊的论文《长期经济波动理论研究述评》（《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总的说来都是在一种比较的视域中论述了包括曼德尔在内的各派长波理论的优长与不足，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曼德尔长波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用偶然的、外生的原因解释长波的“第二个拐点”。

此外，还有对曼德尔思想其他方面的少量研究。杜建国的短论《曼德尔是技术决定论者吗？》（《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0期）反驳了美国学者迪尔·维斯福特对曼德尔的误解，指出曼德尔不仅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而且还相当重视工人阶级的主体能动性。曹浩瀚的论文《曼德尔的工人官僚理论略述》（《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2期）概述了曼德尔

^① 唐正东：《在科学抽象与具体历史之间：方法论的视角》，载《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第146页。

《权力与货币》一书中的官僚理论，托派人士刘平梅对该书的书评^①亦然。王国宏的论文《曼德尔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4期）从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危机的分析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力量及一般战略三个方面简要介绍了曼德尔的社会主义思想。托派人士陈东在曼德尔逝后的纪念文章《纪念革命家曼德尔》^②中非常简要地介绍了曼德尔的生平、理论贡献与瑕疵。

国外对曼德尔的专门研究也数量有限。维尔卡曼（Francois Vercaemen）的《埃内斯特·曼德尔》^③和 Gilbert Achcar 的《曼德尔（1923—1995）思想肖像》^④两文分别介绍了曼德尔的生平和思想。简·威廉姆·斯丢特（Jan Willem Stutje）的《埃内斯特·曼德尔——一个反叛者的被推迟的梦想》^⑤是一部关于曼德尔的传记，由于作者是首个能够接近和获得曼德尔档案的作家，并采访了许多相关人物，因而使本传记建立在极其翔实的资料基础上，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曼德尔的研究中最有分量的著作。曼德尔生前的朋友塔里克·艾里（Tariq Ali）这样评论它：“迄今尚未出现一本关于曼德尔的严肃的传记或思想史。简·威廉姆·斯丢特的基于充分研究的记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不仅试图解释曼德尔的观点，而且试图解释它们在曼德尔个人历史的背景下的发展。对于那些只知道埃内斯特·曼德尔是一个革命领袖的人来说，斯丢特对于其传主的私人生活所作的细节描述也许会令人惊讶。斯丢特是第一个能充分接触到曼德尔档案的人，他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不仅如此，他还广泛地采访了那些了解这个人、了解这位思想家和活动家的人。他成功地使曼德尔处于他那个时代思想和政治剧变中，追溯了这位学者和革命者从孩提时代，经第二次世

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刘平梅，<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liupingmei/marxist.org-chinese-LauPingMui-20020827.htm>，写于2002年。

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曼德尔，<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rnest-Mandel/marxist.org-chinese-mandel-life.htm>，写于1995年。

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曼德尔，<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rnest-Mandel/marxist.org-chinese-mandel-life2.htm>，写于1995年。

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曼德尔，<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rnest-Mandel/marxist.org-chinese-mandel-life3.htm>，写于1995年。

⑤ 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 Christopher Beck, Peter Drucker, Verso, 2009.

界大战和‘68事件’，直到1995年去世的发展历程。”^①

根据笔者对曼德尔思想的总体性认识，曼德尔的思想包括两大方面，这两大方面是与20世纪的两类社会现实相对应的。20世纪的世界，基本上就是由两类社会组成的：在一类社会中，继续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另一类以苏联为典型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是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对前一类社会的论述，形成了曼德尔的包括长波理论在内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一类社会的论述，形成了曼德尔的过渡社会理论，这就是曼德尔思想的两大方面。联结这两个方面的是曼德尔的革命理论，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和过渡社会理论共同的结论。因而，如果用最简要的一句话来概括曼德尔的思想面貌的话，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和过渡社会理论是曼德尔思想的两翼，革命理论是联结这两翼的枢纽。

以此反观国内曼德尔思想的研究现状，便不难发现对曼德尔思想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曼德尔思想之一翼，即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而对构成他思想另一翼的过渡社会理论及联结此两翼的革命理论则关注甚微。即便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也多属“旁敲侧击”式的附带论及，而不是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专门研究，更谈不上是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全面研究。与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一书本身的包容宏富相比，它们只是从其中的某些方面揭示了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内涵。其中，研究曼德尔长波理论的经济学者往往忽视曼德尔长波理论与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的关联，对它作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研究，因而，难免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解。这些可谓曼德尔研究现状中的不足。

对曼德尔思想的研究现状中的这种不足，影响了对曼德尔思想之意义的充分发掘。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于我们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与新的现象之间的关系、认识资本主义今后的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的使命，一定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因此，全面深入地研究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在今天有着重

^① [巴基斯坦] 塔里克·艾里：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 "Foreword", Verso, 2009。

要的意义。另外，曼德尔的过渡社会和革命理论对于我们重新反思 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起落提供了一种“另类”的视角，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重新确立起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因此，客观地研究和评价曼德尔的过渡社会和革命理论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将鉴于国内对曼德尔研究现状中的上述不足，力图对曼德尔思想中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革命和过渡社会理论作出全面深入的梳理，并加以适当的评论，从而使其意义充分开显出来。通过这一工作，也就围绕着“晚期资本主义”、“革命”与“过渡社会”这三个关键词勾勒出了曼德尔思想的主要面貌，达到了对于曼德尔思想及其意义的一种比较全面的把握。如果说“晚期资本主义”、“革命”与“过渡社会”是曼德尔思想的三个关键词，那么，“革命”是联结另两者的枢纽。因此，本书就试图围绕这三个关键词展开对曼德尔思想的论述。

为了把曼德尔放在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背景中来研究，以显示曼德尔对托洛茨基主义基本理论的衔接和发展，本书的第一、二章首先论述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形成，以及曼德尔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第三章至第七章可以说是围绕“晚期资本主义”这个关键词。更具体地说，第三章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的方法论；第四章通过对长波理论的论述说明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平均利润率的长期增长；第五章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面貌与基本矛盾：部分有理性与整体无理性之间矛盾的激化与国家力量的增强，科技、脑力劳动的异化与技术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消费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第六章是第五章内容的延续，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面貌与基本矛盾在国际关系层面上的表现，即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新殖民主义；第七章论述曼德尔的异化理论——主要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诸异化形式及其经济根源的揭露和批判，也涉及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文本学分析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第八、九两章围绕“革命”这个关键词，分别论述曼德尔的革命战略理论和革命主体理论，这里面既体现了曼德尔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理论的捍卫，也体现了曼德尔对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革命活动实际经验的总结。第十、十一两章围绕“过渡社会”这个关键词。第十章论述以苏联为典型的过渡社会的经济特点、

主要矛盾即官僚主义问题；第十一章论述过渡社会前进至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需注意的问题或采取的措施，以及对社会主义前景的预期。结语部分则总结全文，试图对曼德尔的思想作出一种总体性的评价。

第一章 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

由于斯大林主义大规模地歪曲和掩饰真相，托洛茨基主义大概是国际共运史上遭到误解最多的一种理论。在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受苏联的影响，长期以来“托洛茨基主义”或“托派”成了一个贬义甚至敌意的称呼并对之充满批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苏联真相的解密以及对托洛茨基持一种较客观的研究立场，对托洛茨基理论的认识不断深入并逐渐对之有所肯定。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是非常不够。为了研究托洛茨基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我们不得不追根溯源至它的鼻祖——托洛茨基本人的理论，以及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第四国际”的形成历史。当然，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地讨论托洛茨基的几个最关键的理论观点，首先是作为托洛茨基理论核心的不断革命论，以及由之引发的对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批判。它们奠定了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基础。其中也会涉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的某些理论分歧，这些分歧导致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分裂。通过对托洛茨基主义基本理论的论述，能更好地理解曼德尔对之的衔接与创新，及其利弊得失所在。

第一节 不断革命论——“纵的方面”

在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论中，最重要和最著名者莫过于不断革命论了。但不断革命论也遭到最多的误解，因此特别值得详细阐发。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可以说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托洛茨基则结合时代的特点对之作出了创造性的发挥，使其成为一个系统的和相对独立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写道：“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只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消灭封建主义、改良资本主

义——引者注)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这样一句话结束该文:“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一文的“第一条”又指出:“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②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也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③(粗体为原有)的话。在这些话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提出了“不断革命”这个词,而且蕴含了为托洛茨基后来所发展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其中,“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指示的是不断革命论的“纵的方面”;“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指示的是不断革命论的“横的方面”。这正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两大方面或两个基本点。下文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论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首先说不断革命论的“纵的方面”。这个问题发生在对1905年俄国革命性质的判断上,围绕这一点共产生了三种观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认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两者的分歧在于: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认为在无产阶级已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资产阶级已丧失了胜利领导革命的能力,需要由无产阶级领导工农来完成此一革命。根据列宁此时的观点,这种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是“工农民主专政”,这是革命的第一阶段;革命的第二阶段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建立真正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2、299页。

② 同上书,第605页。

③ 同上书,第104页。

“无产阶级专政”。但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观点，即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要领导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什么工农民主专政；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因而也就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之分，这两者已是融为一体，没有后者前者也无法完成。也就是说，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分歧在于，为了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首先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还是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不否认工农联盟的重要作用，因而确切地说是“以农民为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农民主专政”与“以农民为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强调程度有所不同，对农民革命作用的估计程度有所不同。托洛茨基的“以农民为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强调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地位，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政权中占多数派；而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虽也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但并不否认农民可以在该政权中占多数派。也就是说，列宁较为相信农民相对独立的革命作用，托洛茨基则不承认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就其阶级内容来说，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只有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这个党要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和总的来说也能够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要能够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程度的援助下夺取政权，并且要能够决定自己的革命纲领。整个现代史表明，特别是最近二十五年的俄国经验表明，在建立农民政党的道路上，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就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由于这种原因，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分子在一切决定性的关头，尤其是在战争和革命中，总是跟着大资产阶级走；下层分子跟着无产阶级走；中层分子则不得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在克伦斯基政权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阶段，即没有工农民主专政。”^① 列宁和托洛茨基对

^① [苏]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十章，柴金如译，载《“不断革命”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23—224页。

农民革命作用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他们在革命战略上“两阶段论”与“一阶段论”的分歧。

那么，更早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问题上是怎么看的，有没有相关的论述？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不断革命”的观点，他们的革命战略是否就与托洛茨基一致呢？其实，“两阶段论”与“一阶段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都可以找到渊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经历了某种发展。比如，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有如下著名的话：“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①这是先资产阶级革命、后无产阶级革命的“两阶段论”，尽管这两个阶段之间的间隔可以非常之短。在稍后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革命上提出了同样的观点：“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取得一个相当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②在该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强调无产阶级的独立利益和独立组织，强调无产阶级须做好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同盟中分蘖出来、转而与之对抗的准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仍认为有一个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共同革命甚至以后者为主的阶段。因而这篇文章虽提出了“不断革命”一词，但仍是“两阶段论”，而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不同。但这种“两阶段论”与列宁的“两阶段论”也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列宁更强调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革命后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也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则认为小资产阶级将是革命的主力，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1、293、298页。

后也将建立小资产阶级的暂时统治。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阶段论”看作是列宁“两阶段论”的原型，而列宁也确实深受马恩这些理论的影响。然而，19世纪中叶德国革命的现实使马克思失望，不仅自由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使马克思失望，于是，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观点发生了某种转变：“当时（即在上述《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引者注）马克思所期待的是在德国出现一个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也就是说，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在农民的支持下暂时掌握政权。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这也正是没有发生的事。而且没有偶然发生过。早在上世纪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表明自己没有力量实现它自己的独立的革命。马克思是考虑到这个教训的。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即在上面提到的传单发表以后六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这一段被拉狄克完全忘记了的话，是了解十月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全面探讨的整个问题的真正宝贵的钥匙……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是不是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合作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是必要的呢？是的，他是认为必要的。他是不是认为农民有可能在革命中担任领导角色或者甚至仅仅担任一个独立的角色呢？不是，他并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①“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以农民为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包含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阶段论”。因此，对马忠行这样来评价列宁的“两阶段论”与托洛茨基的“一阶段论”之间的分歧：“列宁如果是师兄，托洛茨基就是师弟……师兄从老地方（即马克思原来的观点——引者注）起步，师弟从新地方（即马克思后来的观点——引者注）出发！”^②

然而，列宁也并非始终固守与托洛茨基的这种分歧，以《四月提纲》为转折的标志，此后列宁逐渐接近托洛茨基的观点。托洛茨基认为“工农民主专政”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在俄国的革命进程中是否曾建立起

^① [苏]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七章，柴金如译，载《“不断革命”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96—197页。

^② [日]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9页。

“工农民主专政”呢？1917年3月俄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权和“工农民主专政”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认为“已经到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①，列宁在几乎同时的《论策略书》中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对此加注道：“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而且列宁立即对此作了非常重要的大段补充：“这个公式（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分裂。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② 这表明列宁对之前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及与之相联系的两阶段革命论作了重大的修正，在向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方向靠拢。在土地革命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作出了由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决定，实际上是使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结合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在某种程度上已使革命的两阶段合并成了一阶段。此后，《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列宁对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基本上达到了与托洛茨基一致的观点：“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列宁在同一段中又重复了这同一句话）^③ 这些都表明以《四月提纲》为转折点，列宁已在很大程度上对之前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和两阶段革命论作出修正，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分歧在逐渐缩小。十月革命后列宁的著作中几乎不再使用“工农民主专政”的说法这一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至于列宁是否已经完全放弃了之前的理论，而走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上来，这是可以商榷的。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③ 同上书，第827页。

曼德尔大体上是这么认为的，但对马忠行则认为列宁虽然对之前的理论作出了重大修正，却似乎并未完全放弃。不管怎么说，可以比较肯定的是，十月革命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也许仍有差异，但已很难再说存在着分歧和对立。然而斯大林派根本不顾上述具体史实，死死抓住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在某一历史阶段上的分歧，并把它夸大成不可弥合的矛盾。实际上，反观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① 时由斯大林派所把持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即使中共放弃自身独立性而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倒是在马恩列托的理论中都毫无依据，只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背叛。

第二节 不断革命论——“横的方面”

不断革命论的“横的方面”，一言以蔽之，就是指只有当至少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否则革命就一直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在一国或少数几国范围内已经取得的革命果实也随时面临着覆亡的危险。有人把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论理解成多个国家同时爆发革命，这当然完全是误解。其实，世界革命论是指革命的完成必须是世界性的，至于革命的爆发在各国完全可以有先后——不是没有同时爆发的可能，只是其概率较小。根据世界革命论，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应该在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致力于推进世界革命，离开了后者，前者也必不能维持或必然要变质。与此相对立的，是“一国社会主义”论，即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局限在一国之内，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建成。——当然，必须指出，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使用的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非更加初级的“社会主义”。

那么，世界革命论与“一国社会主义”论之间的对立是何时、如何形成的？追本溯源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持“世界革命论”的观点，

^① 在中共语境中一般称之为国民革命、大革命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但在托洛茨基主义语境中一般称之为第二次中国革命，第一次中国革命则是指辛亥革命，托洛茨基所说的第三次中国革命则是指第二次中国革命失败后，对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一轮革命浪潮的预期。

他们从未设想可以在一国之内——哪怕是最发达的国家——建立共产主义。连力倡“一国社会主义”论、反对世界革命论的斯大林也不否认这一点。比如，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明确指出：“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① 此处的“同时发生”只能理解为大体上的同时，而非严格意义的同时，因为恩格斯紧接着就有“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的字句，表明共产主义革命在不同的国家仍会有相对的快慢、先后之别。此时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最快最容易”，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识到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虽然最具备革命的客观物质条件，但未必具有最成熟的主观条件。在1887年恩格斯已改变了革命在“英国最快最容易”的观点，而是认为“可能将来首先发动的也仍然是法国人，但是彻底的结局只能在德国打出来”^②，而在1894年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更明确地指出：“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③ 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如此，请看马克思的如下三段话。（1）1848年《革命运动》：“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④（2）1950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显示出，这种革命在多么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5页。

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设施。”^①（3）1870年《机密通知》：“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②马克思的这些话表明了两点：第一，社会主义革命未必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首先发生，因为“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从时间上看，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认识比恩格斯更早。第二，其他国家的革命必须放在与英国这个资本的“首都”和“心脏”的联系中来看待，而非孤立地看待。这是世界革命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前后都无变化。上述这两点中其实已蕴含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横的方面”的全部萌芽。

既然马、恩毫无疑问是世界革命论者，那么“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否是列宁的首创呢？斯大林派是这样声称的，据说这是列宁根据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发展。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斯大林派的影响，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列宁从来没有认为在一国之内可以建立社会主义——更别提共产主义了，列宁也从未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长期孤立地在俄国一国之内。列宁对此的论述引不胜引，只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这段发言也就够了：“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③如果说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纵的方面”确实与列宁存在过某种分歧，因而使斯大林有把柄可抓；那么，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横的方面”即世界革命论则从未与列宁发生过分歧，所谓“分歧”只能是斯大林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实上，在列宁去世前，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主要指的就是其“纵的方面”，因为其“横的方面”即世界革命论本是马、恩、列的共识，根本没有把它作为托洛茨基的独特理论。而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全面推出“一国社会主义”论，否定世界革命论，并把“一国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2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0页。

论归结为列宁的发明，于是，世界革命论这才成为托洛茨基的独特理论，成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又一显著部分。在1924年前，苏共党内没有一个人——包括斯大林——认为可以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在1924年初的时候，斯大林本人还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的初版中写道：“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我国革命的历史便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国的努力，特别是靠一个像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这就是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总特征。”^①当然这段话后来被斯大林修改掉了。斯大林正式推出“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在1924年秋以后，它表达了苏联官僚层的利益，它是现实中革命退潮、官僚坐大的理论反映。而“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提出和推行又使得革命夭折的现实进一步巩固下来。关于这一点将在本书后文中详细阐述。

实际上，列宁根据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得出的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俄国这个落后国家率先发生，而不是俄国可以单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而这一点倒还不是列宁首先提出的。前面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期到社会主义革命不会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首先发生。而预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将会首先发生于落后的俄国的，则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早在1905年的《总结与展望》中就已在预期俄国率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列宁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首先在欧洲发生。这与前一部分所述的托洛茨基的一阶段革命论与列宁的两阶段革命论之间的分歧是有关的。托洛茨基的一阶段革命论认为俄国将直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将一并包含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完成，因而1905年的革命就将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而列宁的两阶段革命论则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还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因此，托洛茨基比列宁早预期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但列宁毕竟是少有的杰出马克思主义领袖，他并不拘泥于自己早先的理论，在他预想的第一阶段革命尚未真正完成时，他根据现实形势决

^① [比]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齐春子、胡尔湖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定不再在此停留，而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换言之，他此时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发生在俄国，而不必在西欧。因此，后来列宁多次向越飞^①回忆道，1905年以来托洛茨基在政治上常常是正确的。^②

托洛茨基虽提出俄国可率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托洛茨基对此立即要加以补充的是：此一革命必须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接应，否则必败无疑。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③ 这就是不平衡发展规律及其限度。其实，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那三段话已经表明了这种不平衡发展规律及其限度，托洛茨基不过是结合俄国的实际对之进一步明确化罢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在落后国家发生这一论点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可能论”，而不能把它看作抽离具体历史条件的“必然论”。这也是不平衡发展规律的限度。从这种不平衡发展规律中，托洛茨基得出了一个由他自己命名的所谓“复合发展规律”。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和全球性使得落后国家不必按部就班地经历先进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发展阶段，而是可以跳跃，把先进国家历时性的各阶段加以特殊的结合，从而变成一种共时性的复合状态。但这种跳跃阶段的发展也是有其限度的：当后发的落后国家把先进国家历时性的各阶段加以结合成一种新状态时，也许会产生新的问题和矛盾；当后发的落后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消化先进国家的最新发展成果时，也许会产生“南橘北枳”的结果；后发的落后国家虽具备跳跃发展的优势，但也因此蕴含着更大的复辟风险。这种“复合发展规律”及其限度可以看作是不平衡发展规律及其限度的引申。

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一国之内建成，主要不是什么外国军事干涉的原因，而归根结底是经济原因——由唯物史观所决定的经济原因。如果孤

① 越飞：苏联外交家、革命家，托洛茨基好友。列宁曾多次向他谈起对托洛茨基1905年以来革命理论的赞同，但托洛茨基为越飞的安全考虑，阻止他说出。越飞在自杀前给托洛茨基的诀别信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② 越飞给托洛茨基的诀别信中说：“从1905年起，您在政治上始终是正确的。我曾不止一次向您提起过我亲耳听列宁说，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现在我再一次重复这句话。”参看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石瓮、施用勤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四十二章。

③ [苏]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十章，柴金如译，载《“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25页。

立地从俄国一国来看，十月革命的确是不合时宜的“早产儿”，因为俄国的生产力远未达到要求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俄国的生产力也不足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只有从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看——用上文引用的马克思的话来说，“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期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十月革命才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只有作为世界革命的一个环节（开端环节），十月革命的正当性，以及俄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当性，才能确立。单从俄国一国来看，要从前资本主义阶段跳跃至社会主义阶段，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违背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①的。在单独一国范围内，没有什么不平衡发展规律可言。上述不平衡发展规律恰恰建立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上。换言之，要使不平衡发展规律在俄国起作用，使俄国有可能产生向社会主义的跳跃，就必须打破“一国社会主义”的藩篱。如果说在落后的俄国一国之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在发达资本主义的一国——如当时的英国——之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呢？托洛茨基认为，也不能。资本主义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和世界分工体系，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使然和必然要求，换言之，在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已经容不下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在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又如何能容得下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要将经济活动的范围限制在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这不就意味着要使这种经济倒退到前资本主义的水平去吗？“举例来说，没有海外资源和贸易等，英国这个拥有高水平生产力的国家就会站不住脚。如果海外资源和贸易被切断，生产力很快就会下降。所以说，在大不列颠岛上也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愈发达，与外界的联系就愈密切，如果这些联系纽带被切断，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反而会遇到更多的经济障碍和经济困难。”^②对当时的英国来说是如此，对如今的美国又何尝不

^①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或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这三大社会形态或发展阶段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第一阶段对应于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第二阶段对应于资本主义；第三阶段对应于共产主义。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② [日]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是？美国何尝可以在切断一切外部资源和贸易的情况下维持高水平的经济发展？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一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划时代的重创之后，反观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世界革命论与“一国社会主义”论之争，应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眼光。

第三节 不断革命论的当代局限 ——基于托派本体论的视角

一 自然辩证法：托派的本体论基础

我们从托派的本体论基础说起，这个本体论基础就是主要继承自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从我们现有掌握的材料来看，托洛茨基本人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专门论述，但他在论述其他问题时所表露出来的自然辩证法（也即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在托派来说，这两者是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保卫马克思主义》这一辩论文集，托洛茨基在论述苏联社会性质、驳斥论敌时，多次论及辩证法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辩证法在这里主要被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过程性，包括事物发展中自我否定的观点、质量互变的观点，以及辩证法的这些观点中所蕴含的革命性。^①

据此托洛茨基指出，一个人现实的政治立场似乎与他对辩证法的态度毫无关系，但实际上两者紧密相关，离开革命阵营的人往往以抛弃辩证法为开端。托洛茨基的这些观点应该说并无超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之处，只是对后者的运用。而且在运用它们分析现实问题时，应该说也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托洛茨基在这些辩论文章中是在为下述观点辩护，即苏联的蜕化并未超出工人国家的范畴，而这一观点实际上并不成立^②。由此可见，这种辩证法本非包治百病的药方。

^① 由于自然辩证法在本体论基础中缺乏主体维度，因此它关于事物发展的观点、自我否定的观点并不能导出主体的革命性，也就是说，它与主体革命性之间缺乏本体论基础中的内在联结，它们之间的所谓联系只能是外在的。下文将对这一点展开论述。

^② 具体论述可参看本章第五节：“托派在苏联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对苏联社会性质与历史命运的再思考。”

托洛茨基的自然辩证法观点也体现在他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和自然科学家的评论中，他在被贬职为电气技术管理局和工业科技管理局领导人期间，一度对这个问题颇感兴趣并发表过相关论述。“人的思维的统一性及其多样性是托洛茨基的重大主题。他再次以门捷列夫的著作作为起点，考察了现代科学的结构。门捷列夫已经发现，化学的基础是物理学，而化学反应是由粒子的物理性能和机械性能引起的。”^① 在此基础上，托洛茨基同样地把化学作为生理学的基础，又把生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基础，也即：物理学（特别是力学）→化学→生理学→心理学。托洛茨基认为，虽然各个领域有其特殊规律，不能将这四者混为一谈，但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后者总是以前者为基础，或者说总是前者的某种推演，因此整个现代自然科学“归根结底”建立在物理学特别是其力学定律上，它是说明一切自然科学问题的原始基点。顺便说一下，正是从心理学建立在生理学这个角度出发，托洛茨基为弗洛伊德的学说辩护，认为它可以与唯物主义相容，认为它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前者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因而常常夹杂着不可靠的内容。总之，“托洛茨基广泛回顾了‘最近几十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哲学上的含义。他断言，这种进步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几乎从未间断的胜利”。^② 最后，这一自然辩证法甚至把现代社会科学、人类社会领域也纳入进去，如多伊彻在转述托洛茨基的观点时所说：“现代社会科学是与人类在探究支配自然的法则中所获得的洞察力分不开的；它把社会视为自然的一个特殊部分。”^③ 至此，自然辩证法作为本体论基础的地位昭然若揭。

后来的乔治·诺瓦克和曼德尔完全继承了这一观点。诺瓦克是一位美国托派，托洛茨基曾令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多作努力，回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歪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护，他也不负使命，在这方面著述颇丰，成为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坚决捍卫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保卫恩格斯》这一长文，在这篇文章中诺瓦克继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传统，明确论述了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

① [波] 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周任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② 同上书，第193页。

③ 同上书，第192页。

证法的观点，坚决抨击了以实践观点偷换这一本体论基础的各派哲学。由于这种观点不仅与上述托洛茨基的观点一致，而且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比较接近，所以就不作展开了。

二 自然辩证法与不断革命论的脱节

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这种本体论基础与作为托派之根本（乃至全部）理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解释的基本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他们的本体论基础也是自然辩证法，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作为自然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之延伸的经济决定论。从本体论基础来看，第二国际与托派并无原则区别。但第二国际从这一本体论基础逻辑得出所谓的坐等革命论，实即放弃革命斗争；而托派却是以高扬革命斗争著称。另外，作为第二国际理论的对立面，卢卡奇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没有历史主体参与的自然辩证法，确立了强调无产阶级主体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实即为高扬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革命主动性的作用奠定本体论基础。而托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把自然辩证法本体论基础（第二国际）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作用的强调（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非逻辑地结合在一起，中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逻辑的断裂。

为了确定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曼德尔在《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这本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小册子中的一段话。顺便说一下，这本小册子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分为两章，而且两者之间缺乏逻辑上的联结。上述的那段话说：“历史的辩证法，起初这主要是客观上的，但是，到了无产阶级来根据预先决定的计划来改造社会的时候，这个革命方案的出现，使历史辩证法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使历史辩证法变成客观与主观交互作用的了——译者注）——虽然这个方案的制作和实现是联系于客观的现已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是不受人类意志决定的。”^①

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客观（自然）辩证法与主客观辩证法之间

^① [比]曼德尔：《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向青译，第十六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rnest-Mandel/1977book/16.htm>。

的联结与转化，用引文中的话说，它们统一于“历史辩证法”。然而，姑且不说这种“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仍然是自然辩证法，我们要问的是，这两者（自然辩证法和主客体辩证法）之间的转化是如何实现的？如果说在以前的时代中，都是靠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或者换个说法也一样，即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它的自然发展），那么，为什么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客观（自然）辩证法已经不足以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已经不足以保证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而需要主客体的辩证法，也即无产阶级独立于客观规律（或自然辩证法）之外的独立能动作用了？按照自然辩证法或客观规律的逻辑，以前的社会形态的转化（如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不需要在此客观规律以外强调革命阶级的主体作用，因为他们的革命作用是由此客观规律必然决定的，或者说已经被此客观规律包含在内，也就是说他们的革命作用是必然会发挥的，尽管他们不一定自觉意识到。那么，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为什么这种自然辩证法或客观历史规律就再不能如此自动地发挥作用，为什么客观历史规律中不再包含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不再必然地决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而需要特别地在客观规律以外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托派一反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把无产阶级的主观因素说成决定性的，如曼德尔所说：“在我们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历史的主观因素’（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领导）对于决定阶级大战的结果，决定全人类的前途，起一种原始性的作用。”^①实际上，曼德尔和托派深感客观规律是不可能决定无产阶级必然发挥革命作用，不可能决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前进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里感到了自然辩证法或客观规律论的不够，因此，需要强调无产阶级在客观规律以外的能动作用，这反映在哲学上，就是求助于主客体的辩证法。因此，曼德尔上述那段话中所谓的自然辩证法向主客体辩证法的转化，无非反映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实际困境，并企图通过将主客体辩证法外在地嫁

^① [比]曼德尔：《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向青译，第十七章，<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rnest-Mandel/1977book/17.htm>。

接其上来解决这个困境。然而，这与它的本体论基础缺乏内在的统一性。

这两者的结合表现为实际结论上的一种奇怪的折中：一方面，按照自然辩证法或客观规律论，资本主义必然垮台，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从经济规律上论证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要求的主客体辩证法，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匮乏或革命行动的失策，都将导致社会主义的难产；从而曼德尔认为人类将面临这样一种前途，即资本主义灭亡而社会主义没有来临的“野蛮主义”或者人类灭亡。简言之，托派理论中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它的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崇奉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把阶级意识这一主观方面夸大和强调到脱离实际历史情境的程度，从而把这两方面打成两概。

根据以上的论述，托派的本体论基础与其不断革命论之间是存在脱节的。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在革命的实战经验中，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作了出神入化的发挥，但并没有自觉到它的本体论基础问题；而在涉及哲学的“显问题”时，他则沿袭了来自第二国际的传统观点（包括列宁前期的哲学观点）。但是就不断革命论本身来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性视域中，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直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等创造性论点，在本体论层面上是不能自限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与之相应的所谓客观规律论的，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这一本体论基础的突破，只是尚未提升到对其本体论基础的自觉论证。如果说托洛茨基由于革命节奏的紧迫和后期生活的危机根本无暇深入这项工作，那么后来的托派并未对此有何推进，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了。这无疑构成了托派理论体系中的某种不足。同时，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在一种理论的本体论基础与它对革命的实际态度之间并无直接的或绝对的决定关系，托派的自然辩证法并没有决定它对革命的消极以待，正如某些高扬阶级意识、实践哲学的理论家在现实中却十分畏惧革命。

三 本体论视域中不断革命论的当代局限

总之，哲学本体论与革命理论之间在托洛茨基那里尚是潜在的理论脱节，到了当代托派这里凸显为一种明确的断裂，这是一种由于在其哲学基

础中缺乏主客体互动的辩证法而导致的理论困境，这是客体决定性与主体能动性在其本体论基础中爆裂为两端的表現。如上所说，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解释的基本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他们的本体论基础也是自然辩证法，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不过是作为自然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之延伸的经济决定论。而作为对第二国际理论的反拨，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没有历史主体参与的自然辩证法，确立了强调无产阶级主体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实即为高扬无产阶级意识和革命主动性的作用奠定本体论基础。正如有的论者指出，在本体论基础中爆裂为两端的客体决定性与主体能动性，分别为上述两派各执一端。^①

而在托派，这爆裂的两端却被它的本体论和革命理论分别据有，从而导致两者的割裂，这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托派的某种理论困局与实践缺失。在理论上，具体表现为忽视资本主义客体的具体情境和部分质变对工人阶级主体阶级意识的决定性重塑（这方面倒是为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地发挥了），脱离实际地高扬和诉诸阶级意识，造成了对不断革命论的超经验运用，从而陷入了某种革命激进主义的乌托邦。其实当代托派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把本是产生和发展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不断革命论抽象化、教条化，从而成了黑格尔所谓的脱离具体内容的“主观反思”。在实践中，当代托派缺乏一个着眼于近期的改革方案，不顾条件地把革命置于议程之上，不仅否认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以及在缓和矛盾、延缓革命上所确实起到的作用，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局部反抗运动也评价不高，认为在不把它们整合进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诉诸根本性社会革命的情况下，就只有十分有限的意义。^②这就使其理论带有一种貌似激进、实则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质。这就是当代托派之不断革命论的根本性理论缺陷。

^① 参见吴晓明：《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② 参见 Ernest Mandel: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73; 曼德尔的“答问”。

第四节 托洛茨基对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批判

一 对苏联的批判

托洛茨基对苏联的批判是与不断革命论——特别是不断革命论的“横的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能孤立在一国之内，而斯大林执意逆规律而为，就不能不引起某些倒退性的变化。这种倒退性变化的表现就是苏维埃的“热月”（即对革命的反动），苏联成了“蜕化的工人国家”。历史上的“热月政变”是指，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雅各宾派被推翻，建立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热月”即由此得名。从由激进派掌权到由保守派掌权，可以说是某种反动，但这两者在反对封建专制和维护资本主义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并未颠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因而不能说是“反革命”，只能说是革命基础上的反动。托洛茨基正是这个意义上使用“热月”一词，指代苏联的蜕化的。也就是说，苏联的蜕化尚未丢失十月革命的成果。“蜕化的工人国家”的主要特点是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建立起了强大的官僚统治，如托洛茨基所说：“官僚征服了比左翼反对派更多的东西。它征服了布尔什维克党。它击败了列宁的纲领，而列宁曾经看到国家机关‘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主要危险。官僚击败了所有这些敌人：反对派、党和列宁，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思想和论辩，而是自己的社会力量。官僚的沉重的臀部压倒了革命的头。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秘密。”^①

托洛茨基批评苏联的官僚统治是“铁板一块主义”的官僚集中制，而非民主集中制。托洛茨基认为，一般来说，应当允许党内反对派和除布尔什维克党以外的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创造使它们消亡的条件，如果强行禁止它们，则只能产生更坏的后果。托洛茨基指出，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前后对党内派别和其他政党的禁止只能看作是特殊时期下的非常手段和权宜之计，应当在局势好转后立即取消，同时布尔什维克也深谙这些措施因扼杀了党和国家的民主而蕴藏着的危险，因此

^① [苏]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编印，第67页。

从一开始就对它们持谨慎态度。然而这些措施却迎合了官僚的利益和助长了官僚的发展。这些措施终于被巩固下来、常态化，既是官僚主义使然，也为官僚主义的进一步严重化植下了祸因。当然，从根子上说，官僚主义的发展是与“一国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诸多失败有关的，这种客观局势迫使主观措施朝有利于官僚主义的方向发展。关于“一国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具体联系，将在本书后文中加以详细分析。

托洛茨基认为，官僚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而非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官僚所立足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国有制，因而尽管“蜕化”却仍然是“工人国家”。托洛茨基不同意苏联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历史上第一次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是无产阶级用社会革命的方法做到的，而不是资本家用国家托拉斯化的方法办到的……把资本家的国家主义和苏维埃制度混同起来的企图是多么荒谬。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进步的。”^①因而对待蜕化的苏联的总的态度是，既要保卫苏联，又要打倒官僚，这需要通过一次补充性的政治革命才能达到。所谓政治革命是指统治权从同一个阶级的一个阶层转入另一个阶层手中，而不根本改变社会的生产关系。总的来说苏联处在一种具有矛盾性质的过渡社会中，这种矛盾性质决定了它的两种可能前途：如果工人通过政治革命成功地推翻官僚，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否则也可以倒退到资本主义。“归根到底，问题将决定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现有社会力量的斗争。”^②归根到底，不能离开世界革命来看待苏联问题，苏联的蜕化和“热月”本与世界革命的失败有关，那么苏联要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也就离不开世界革命的继续推进。

然而，托洛茨基对苏联的上述观点在托洛茨基主义者或亲托洛茨基主义者内部也是有异议的，并且这常常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曼德尔基本上是全盘继承了托洛茨基对苏联的上述观点的，仅有的不同也许在于他比托洛茨基更高估了官僚，认为官僚能够维持现状，即工人、官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三角斗争，既不向社会主义前进，也不向资本主义倒退，直到下一波革命浪潮的到来把官僚的反动力量推翻。曼德尔

① [苏]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编印，第181页。

② 同上书，第186页。

不太倾向于认为——或不太愿意承认工人官僚国家复辟资本主义这一可能，直到苏东剧变的前夕才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点。曼德尔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这一微妙差别真如对马忠行所评说：“托洛茨基说：‘是先蜕化，后垮台’，但‘第四国际’的追随者脑子里到什么时候也只想着‘蜕化’，不然他们就不心安理得！”^①

对马忠行对托洛茨基的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是明确持反对态度的，尽管他显然也是一个亲托洛茨基主义者。对马忠行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什么“工人国家”；托洛茨基根据苏联是国有制就认为苏联仍是工人国家，这是一种国有拜物教的错误观点。从这点上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主义一样“把马克思和列宁局限在私有财产等于资本主义、国有财产等于社会主义这个被歪曲了的哲学框框内。”^②对马忠行认为，政权从工人手里转移到官僚手里就意味着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工人共同占有的生产关系、所有关系就不存在了。托洛茨基忘记了：第一、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不是单纯的国有经济，其本质内容是工人共同占有；第二、最重要的是……过渡时期经济是以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劳动力商品化）为杠杆、征服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过程。如果官僚专政下的国有经济不是向着这个方向，而是与此相反（实际上，托洛茨基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应该说，这是生产关系、所有关系的更加有决定性的质变。”^③也就是说，对马忠行认为，官僚统治的实现就意味着十月革命的成果已经丢失，而不是像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在保有十月革命成果基础上的“热月”反动。因此，对马忠行也不同意苏联是处在“过渡时期”的观点，他说：“托洛茨基号召举行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人民起义（‘政治革命’）一事本身就已自动表明，这种制度是不能纳入‘过渡时期’范畴的”，“在马克思、列宁那里，根本不曾有过需要‘政治革命’的‘过渡时期’的概念。如果需要政治革命，就不成其为‘过渡时期’了！”^④这实际是一种比托洛茨基更激进的观点，如果说托洛茨基比曼德尔更多地认

① [日]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② 同上书，第115页。

③ 同上书，第103页。

④ 同上书，第114、106页。

识到官僚的反动性，那么对马忠行对官僚反动性的认识比托洛茨基又更进了一步，认为官僚统治的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不再是过渡时期、不再保有十月革命的成果，因而也就根本不值得保卫了，这是对马忠行的观点。据说，托洛茨基的夫人娜塔莉娅后来也采纳了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

在对托洛茨基苏联观的反对观点中，除了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是“官僚集产主义”，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第四国际”的主要成员马科斯·夏克曼、詹姆斯·盘纳姆。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斯大林主义在俄国，或在它掌权的任何地方，都是残忍的极权主义——新的剥削形态”，“工人……是现代奴隶，他们的劳动力是归国家、亦即归官僚所有的动产。农民是国家奴隶，即相当于工业部门的现代奴隶的农业奴隶”，斯大林体制“尽管是无法预料的反动杂烩，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集产主义时代的一部分。”^① 根据这种观点，既然苏联已不再是工人国家，那么也就不必、不应像托洛茨基所主张的那样保卫苏联。这也是一种相当激进的观点，但既是“集产主义”，又是“奴隶制”，这两者如何能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种新的制度形态，也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对官僚统治后苏联社会性质的看法在中国的托派人士中间也有类似的分歧。如郑超麟持国家资本主义观；王凡西曾认为苏联是官僚集产主义，后来又回到托洛茨基的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上来。总之，苏联的社会性质问题是托洛茨基主义内部非常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以致成为分裂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因，影响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发展。理论的争论迄今难有统一，苏东剧变却以现实回应了托洛茨基的预计：不断蜕化的官僚终将以走资告终；不断披露出来的苏联档案真相也印证了对官僚统治不可高估。但，那不是社会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内部从来未变的共识。

二 对第三国际的批判

在托洛茨基看来，与苏联本身的蜕化相伴随的，是共产国际的变质，其转折点是在列宁卧病不起的1923年。尤其是1924年秋随着“一国社会

^① 转引自〔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主义”理论的提出，共产国际在斯大林主义的笼罩下彻底变质了，由致力于推进世界革命的工人国际变成了服务于苏联官僚利益的外交工具。斯大林派共产国际所作出的错误指导对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其中有些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影响是致命的，如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所说：“在一九二三年以前，战后各种运动和起义的失败，起初是由于共产党还不存在，后来则是由于共产党的年轻和软弱。从一九二三年起，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已经不只是无产阶级的失败，而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失败。这种政策在德国、英国和中国造成的严重错误，以及它在一系列其他国家所犯的程度较轻的错误，其性质都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如果要找到类似的例子，就只有翻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历史，或者是这个时期以前几十年的历史……在德国，由于一九二三年领导集团的投降，无产阶级发现自己的力量已被消耗殆尽；在英国，无产阶级受到共产国际直到一九二六年还继续和它保持同盟关系的一个领导集团的欺骗和出卖；在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把无产阶级骗进了国民党的圈套。这是造成失败的直接的、无可争辩的原因。同样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种失败就具有了涣散人心的性质。如果企图证明即使政策正确也不可避免会出现这些失败，那就是掉进了丑恶的宿命论的泥坑，那就是抛弃了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领导的作用及其重要性的概念。”^①

此外，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主义问题上的所谓“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和“人民阵线”政策也是托洛茨基批判的矛头所向。“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最初是由斯大林在1924年9月的《论国际形势》一文中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指，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即“社会法西斯主义”，它与法西斯主义是“互相补充的”“双生子”；而且，共产国际由于对法西斯主义的低估，把社会民主党视为主要敌人，而把法西斯主义视为主要敌人的观点反倒受到了谴责。据此，共产党非但不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倒一度与纳粹党形成了反对社会民主

^① [苏]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璐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5年版，第206—207页。

党的统一战线。这是一种错误的极左策略，在托洛茨基看来，固然需要“把社会民主派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左翼支柱而加以反对”，“但是，把社会民主派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是荒谬的。面对纳粹主义的威胁，建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绝对必要的。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由于纳粹主义危及自身，因此至少对于党员群众来说，是存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的。而部署了这条防御战线，就有可能伺机发动进攻，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① 这就是托洛茨基对“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批判。如果说“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是一种极左的错误策略，“人民阵线”政策则跳到了极右的错误策略。1934年，迫于希特勒上台后工人群众的压力，斯大林派不得不悄然放弃“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并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人民阵线”论。所谓“人民阵线”是指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等左翼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联合起来的反法西斯政策。托洛茨基则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必要时可以与社会民主党甚至小资产阶级大众联合，但与利益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是完全错误的，这与其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不如说是资产阶级政党对无产阶级的利用，而且在革命前夜时期，这只会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扼杀无产阶级革命。

第五节 托派在苏联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对苏联社会性质与历史命运的再思考

在苏联问题的研究上，托洛茨基主义（或简称“托派”）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流派。它是最早（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看到苏联体制的问题，并提出严厉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而且，由于托派本是在苏联内部作为斯大林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因此它在对由斯大林所奠定的苏联体制的认识上应当说比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有着更切实的体察。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使各马克思主义流派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之时，唯托派安之若素，似乎早在预料之中。的确，托洛茨基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指出苏联蜕变的基本趋势是复辟资本主义。至少这一点就足以在苏东剧

^① [日]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变后引起我们对托洛茨基相关理论的重新反思。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在苏联问题上，托派远非定于一尊，相反，恰恰这个问题是托派内部剧烈争议和分歧最大的问题，成为引起托派分裂的头号原因，托洛茨基在世时就是如此，遑论以后。归结起来，在苏联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所决定的对苏政策上，在托派内部共形成了三种相互对立的代表性观点。应当说，这一分歧绝非托派内部的无谓争议，而是反映了第一个工人国家苏联的官僚化蜕变给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新问题。也许我们会说，根据马克思主义，苏联的社会性质不是已很清楚，难道这还需要重新讨论吗？其实稍微深究一下，这个问题并不清楚。现在我们知道，苏联社会还远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谈论的作为共产主义之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且它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现象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后者背道而驰的。那么，它在何种意义上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它的社会性质又是什么，不是值得进一步追问吗？当然，我们通常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斯大林体制的社会主义，或同义反复地称之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但是，靠在“社会主义”之前加上上述定语，除了表明它与经典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外，果然能真正揭示它的社会性质吗？现在我们对苏联解体的探讨汗牛充栋，但对苏联的社会性质其实是缺乏深究的。我们实际上是把尚待解决的问题作为默认的前提接受下来了。然而，如果对苏联的社会性质这个前提问题不加深究，那么对苏联解体的整个探讨就难免有其视域上的盲点。这就是我们通过讨论托派在苏联问题上的分歧，来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的必要所在。

一 “一国社会主义”：托派论析苏联问题的特定视域

我们从托派在苏联问题上的共识说起，这个共识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开始，但必须完成于世界舞台，社会主义革命和通往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长期孤立于一国或少数国家，特别是落后的一国或少数落后国家。与它相对立的，当然就是斯大林的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马、恩从来都是在世界视域中谈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列宁究竟是世界革命论者还是“一国社会主义”论的首倡者就有所争议了。其实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列宁只是提出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可以率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但决不认为革命的胜利和通往社会主义的建设可以长期

孤立俄国一国，相反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翻一翻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列宁数十次地谈到苏联的维系以及进而向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端赖世界革命特别是发达国家革命的发展。^① 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总共出现两次（《论欧洲联邦口号》^② 和《论合作社》^③）在这个

① 如：1921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0页）直到列宁临终前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还为“一国社会主义”而担忧，还把希望寄托于西方的革命，他说：“因此，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5页）

② 这里仅需指出，列宁在该文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4页）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非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斯大林却混淆了两者。

③ 列宁在《论合作社》第1篇中确实存在如下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8页）似乎一国之内就已具备了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但是，但这段话只能被看作列宁对合作社作用的极而言之，而不是经过字斟句酌的推敲之论。原因是列宁在隔一天后在《论合作社》第2篇的末尾就提出了与此矛盾的观点，列宁说：“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4页）这段话表明，上面那段话提到的那些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措施并非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完全条件，因为至少还有文化问题有待解决，而文化问题的解决又有赖于“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相当的物质基础”，而这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异常困难的”。结合这两段话来理解，上面那段话提到的那些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措施只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治方面的条件，它们是“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但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全部条件。而既然文化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这在不继承资本主义已有文明的条件下，在落后的苏联一国内能够解决吗？而且，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论合作社》的这两文是1923年1月4—6日间列宁于病中口授的，因此难免有参差出入之处，因此不能在某些论述上固守字句而作出与列宁在其他场合的大量论述相悖反的理解。在口授《论合作社》两个月之后、接近于临终绝笔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再次明确地表达了世界革命的观点（参看前面注释中的引文）。

问题上比较模棱的说法，后来被斯大林利用来证明他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但稍微深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两处也没有违背列宁在其他多处所强调的世界革命思想。因此，“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始作俑者只能是斯大林本人，列宁是“一国社会主义”论的首倡者之类的说法也无非是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炮制出来的误解。其实斯大林也只是在1924年秋以后才提出这个理论，在此之前在苏共党内这个理论连影子都没有，而且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产生这个理论。就在1924年初，斯大林本人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的初版中还表达过需要多个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思想；当然在再版时这段话被删掉了。因此，也只是在这以后，世界革命的思想才凸显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才成为托洛茨基的专利。^①而在此之前，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事业必须是世界性的，而不能是一国范围的？因为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跟民族国家的疆界发生矛盾，“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输出、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这就出现了一个

^① 列宁与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论上的分歧，不在于世界革命论，而在于不断革命论的另一个观点，即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直接进行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包括在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分两个阶段先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他们的分歧在于革命的一阶段论还是二阶段论。而这又涉及无产阶级在革命政权中的领导权问题。托洛茨基的一阶段论由于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认为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在革命政权中无产阶级应占有对于农民的绝对优势。而根据列宁的二阶段论，革命的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政权的性质就相应地是工农民主专政，即不强调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权。可见在这一分歧中又包含着对于农民及其革命作用的不同看法；由于该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就点到为止不作展开了。总之，在列宁生前，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主要就是指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应静态地看待这种分歧。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实际上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转向托洛茨基的一阶段论，当然由于实践的复杂性，这种转向也不是绝对的和完全的。可以说，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对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也许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已谈不上原则性的分歧。将列宁与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早期分歧固化，而无视上述发展过程，是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制造的迷雾。

问题：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生产力赶回到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猛烈企图冲破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中去呢？”^① 对于像苏联这样未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来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更不可能，因为这意味着跳跃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第二大社会形态。除非得到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持，把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继承过来，否则这种跳跃是违背规律，不能成功的。而要得到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持，就必须有革命在世界舞台上的胜利。以上所说的是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因，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围攻等外部原因，就不难理解，长期孤立在一国（特别是落后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通往社会主义的建设终将以失败告终。当然，在最终的失败和垮台之前，蜕化变质会是它的前奏。我们可以循此思路理解苏联在列宁去世后的蜕变，它从通往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蜕变为与社会主义渐行渐远的官僚专制国家，为什么？归根结底，与世界革命的夭折使革命孤立落后一国（后来则是孤立少数落后国家）有关。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不可能建设一个新社会，相反地，如马克思所说，一切陈腐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官僚主义不过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复活了过去的阶级统治而已。

世界革命的夭折使革命孤立落后一国，与苏联的官僚主义蜕变这两者之间详细的因果联系，由于笔者已有另文详述^②，此处不赘，只是简要地提示这一点，提请注意。从中可见，苏联的官僚统治本是世界革命的夭折使革命孤立落后一国的产物，因此，维持“一国社会主义”的现状是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世界革命的深化和扩展对这种格局的打破是在根本上使他们感到恐惧的，这就是作为该官僚集团之代表的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论、反对世界革命论的现实根源。根据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由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在苏联一国就能建成，世界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不是推进世界革命，而是保卫苏联这个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堡垒。因而，这个理论实际上使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从属于苏联

^① [苏]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5年版，第46页。

^② 可参看本书第十章第三节。

一国（实即克里姆林宫官僚）的利益。这样，“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付诸实践又反过来阻碍世界革命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世界革命的夭折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此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然而，如上所说，“一国社会主义”由于违背规律，是不能持久的，它既然不能前进到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那么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其基本趋势。考茨基曾批评苏联的十月革命是早产，因为它逾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考茨基的这个批评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看到在世界革命的视域中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发展的可能性。然而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考茨基的这个批评恰恰是正确的，因为当社会主义尚未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实现时，落后国家是不能实现这种跨越的。强行地在这些国家搬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其结果便是：先蜕变，后垮台。无论是就这些国家本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还是就世界资本主义的总体格局而言，复辟资本主义（或至少是利用资本机制）都成为一种不得不然的选择。^①

二 苏联的社会性质：托派主流观点

如果说“一国社会主义”导致苏联的官僚化蜕变是托派对苏联问题的基本共识，那么蜕变后苏联的社会性质问题则引起了托派中的重大争议。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期，苏联作为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它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既超越了资本主义，但尚未达到社会主义。此时国家尚未消亡，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或简称工人国家。但是，由于上述的特殊情况

^① 在苏东剧变之前，关于官僚化的苏联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在托派内部也有所争议。比如，多伊彻在《先知三部曲》的第三部即《流亡的先知》中就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情况，批评了托洛茨基关于官僚终将复辟资本主义的论断。当代托派领袖曼德尔在苏东剧变之前，也认为官僚具有既反工人阶级、又反资本主义的两面性，也就是否定了官僚主动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当然，苏东剧变证明了正确的是托洛茨基。由于苏东剧变已明确证伪了托派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歧见，所以正文中对此不再展开。值得稍作补充的是，托洛茨基并不认为复辟资本主义会由官僚一蹴而就地实现，而是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如多伊彻所说：“托洛茨基毫不怀疑斯大林不会跨越这道界线（复辟资本主义——引者注），但他担心别的人会踩着斯大林的尸体最终跨越这道界线。”（[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施用勤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也就是说，苏联将经历一个先蜕变、后垮台的过程。应当说，托洛茨基的这一判断完全得到了印证。因此，这部分的讨论主要着眼于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而对托派中就这一问题的歧见忽略不计。

(社会主义革命和通往社会主义的建设孤立落后一国所导致的官僚化蜕变)，必然要对工人国家的理论作出相应修正。托洛茨基在1934年承认苏联在列宁逝世后就发生了“热月”，这种“热月”是革命基础上的反动，但还谈不上是反革命。也就是说，苏联是在工人国家范围内发生的蜕变，这种蜕变尽管极其严重，但尚未改变工人国家的性质。既然如此，官僚就不是工人阶级之外的新阶级，而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特权阶层。这一官僚阶层窃夺了苏联工人阶级的统治权，为了打倒官僚阶层，苏联工人阶级必须发动一场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不同于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政权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移，而政治革命则是政权从同个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转移。然而，苏联的政治革命要成功必须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革命的配合，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仍然要在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解决。托洛茨基至死仍坚持这个观点，这也是后来为当代托派领袖曼德尔所坚持的托派主流观点。托派中的另两种歧见则认为，苏联的蜕变已超出工人国家的范围，不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一者认为它是官僚集产主义；一者认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托派主流观点和托派中的歧见都认为苏联极其堕落，但分歧在于是否突破了工人国家的底线。就是这一点差别极其重要，因为它将决定世界无产阶级的对苏政策。

如果根据托派的主流观点，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那么世界无产阶级对苏联的政策就应当是，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同时无条件捍卫苏联。如果苏联已不再是工人国家，那么世界无产阶级不仅不应捍卫，而且应把苏联与资本主义一同反对。归根结底，托洛茨基认为，苏联不管如何堕落，毕竟比资本主义进步，而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的托派则认为苏联即便不是比“民主阵营”的资本主义更大的恶，至少两者也是同等的恶。特别是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竟可以跟法西斯联盟欺凌弱小民族，这一问题就更其尖锐化起来：苏联堕落至此还是值得保卫的吗？那些反对苏联值得保卫的人实际上是从这个结论反过去推定苏联的社会性质，即苏联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官僚当然也就不是工人阶级中的特权阶层，而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

（一）国有制 = 工人国家？

那么，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托洛茨基关于苏联革命成果尚存、仍属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国家）的论断能否成立。应当说，没有谁比托洛茨

基对苏联的全面蜕化有着更切身的体会，他在《被背叛了的革命》等论著中也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那么，托洛茨基认为十月革命的成果尚存、工人国家的底线尚未突破的依据何在呢？这就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制，这也几乎是唯一尚存的革命遗产。托洛茨基不仅把苏联国内的国有制视为工人国家尚存的标志，而且把苏联通过侵略在他国确立国有制也视为进步现象。^①但问题在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就能保证工人国家也即无产阶级专政吗？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清楚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包括作为其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重温一下马、恩的基本理论对决定上述争议是有益的。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②“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当然还不是共产主义（包括作为其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为阶级还存在，国家还存在，这只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只有“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③，当阶级以及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也消亡的时候，才是共产主义。根据马、恩的上述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特征是“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然后才有可能使得无产阶级的统治本身变得不再必要，也就是说才能使无产阶级的统治消亡。然而，在政权从无产阶级手里转到了官僚的手里的情况下——如托洛茨基所承认的那样，一切生产工具还掌握在全体无产者手里

① 托洛茨基认为，官僚化苏联的入侵所带给他国的国有制虽然带有官僚化苏联的一切弊端，但比起被侵略国原来的私有制和有产阶级统治还是一种历史进步，因此他认为，被侵略国的无产阶级首先应当联合苏联红军打倒本国无产阶级统治，再谋求推翻（苏联和本国）官僚的革命。可参看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若干实例的讨论，比如，希特勒如果侵占苏联奴役下的乌克兰（《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载《保卫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实际发生的苏芬战争中（《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之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载《保卫马克思主义》），被侵略国的无产阶级应首先联合谁、反对谁的问题。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③ 同上书，第294页。

吗？显然不是。而是掌握在官僚的国家手里，或者说官僚通过掌握政权而掌握了该国家的生产资料，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是，国家——姑且这么说——‘属于’官僚。”^①也正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这种转移（即从无产阶级手里转移到官僚手里），官僚对劳动群众的剥削才可能。否则，如果生产资料没有从无产阶级手里转移出去的话，就不能想象广大的劳动者还能受压迫和剥削。那么这显然就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即工人国家）了！对马忠行的下述评论是非常到位的：“如果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热月，政权从无产阶级大众手里转到了他人（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政府或小资产阶级政府’）手中，例如象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转到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手里，实际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关系、所有关系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导致私有财产的复活’，也是如此……所以政权从工人手里转到官僚手里就不能不意味着基本的生产关系本身的变动。这就是说，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工人共同占有的生产关系、所有关系就不存在了……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不是单纯的国有经济，其本质内容是工人共同占有。”^②

托洛茨基所关注和提防的仅是私有财产的复活，或者说政权是否转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而对政权是否从全体无产阶级手里转移出去这一点并不警惕，对这一点的后果估计严重不足。其实，只要政权从全体无产阶级手里转出去了，生产资料不再掌握在全体无产者手里了，那么不管生产资料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还是官僚的国有，无产阶级专政都已不再存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为什么托洛茨基会认为官僚的国有就比资本家的私有较高一筹呢？这是不能成立的，国家既然已经不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国有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部分的国有制，但这些国有制与那里的无产阶级有何关系呢？因为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所以国有就还是资本家所有，只不过是全体资本家所有罢了。我们不会认为资产阶级的国有制是对无产阶级的有利因素，同样地，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官僚的国有制就是对无产阶级的

^① [苏]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编印，第182页。

^② [日]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03页。

有利因素。资本家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有制剥削无产阶级，同样地，官僚也是利用国有制剥削无产阶级，国有制在这两个场合有什么高下之别吗？托洛茨基把国有制——而不管这个“国”还是不是在无产阶级手里——无条件地认作革命的尚存成果，认作值得保卫的对象，这是不是对国有制的盲崇，或称国有拜物教呢？托洛茨基居住墨西哥期间曾担任他秘书的拉雅·杜娜叶夫斯卡娅女士就此说过一段切中要害的话：“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把马克思和列宁局限在私有财产等于资本主义、国有财产等于社会主义这个被歪曲了的哲学框框内。由于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等于国有财产的观点与斯大林的纲领基本上没有区别，所以尽管托洛茨基不断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斗争，但是他的思想却不可能有力量指示独立的方向。”^①

此外，这种把国有制视为工人国家的基本标志和尚存果实的观点也不能解释在这种国有制遭到颠覆的苏东剧变中，工人阶级竟完全放弃抵抗。托洛茨基和曼德尔从来都认为官僚如果要复辟资本主义，则必须要击败工人的反抗，也就是说将在反革命与保卫革命之间发生对决，但事实上，不仅对决不曾发生，连“反革命”的定性都显得多余。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衰落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点，因为阶级意识再衰落，总也不至于对事关他们根本利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无动于衷。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他们并不觉得这种国有制对他们有何积极意义，并不觉得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是对他们尚存果实的掠夺。

综上所述，托洛茨基把国有制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也即工人国家）的可靠标志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与此问题紧密联系的是官僚是一个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阶层的问题。托洛茨基在上述观点上的错误直接导致了在这一点上误判。

（二）官僚是阶层还是阶级？

官僚是否是一个阶级，决定这个问题的比较简便而可靠的方法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基本定义，再考察一下苏联官僚的实际是否符合这个定义。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对阶级的定义是这样的：“所谓阶级，

^① 《异化与革命》，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294页。转引自：[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 列宁这段话对阶级的定义是非常明确的，是否是阶级主要看它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由这种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所决定的、在社会财富分配中自己所得财富的方式和多寡。托洛茨基自己也说：“各个阶级是由它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占的地位来划分的，并且首先是从它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的。”^②（黑体为引者所加）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这两段话都指出，阶级的特征归根结底是由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界定的。那么，如上所说，苏联官僚通过国家掌握生产资料，以及苏联工人通过这同一个国家被剥夺生产资料，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是两个不同阶级，决定了官僚不是工人中的一个阶层，而是另个不同的阶级！我们再重温一下上引列宁那段话中的最后一句：“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句话指出了划分为不同阶级的后果，进一步佐证了苏联官僚是一个不同于工人的阶级，因为前者无疑地占有后者的劳动。

苏联官僚如此巨量地占有工人的劳动，如果还认为他们同处一个阶级之内，那就根本推翻了列宁对阶级的上述定义。对于官僚是否阶级的问题，托洛茨基似乎不是从阶级的定义出发，再对比苏联的实际经验地加以确定，而是从“工人国家”这个概念中先验地推导出来的：因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尽管极度扭曲），所以其中的官僚只能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而不能是一个别的阶级。然而这个推论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推论的前提——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如上所说就是错误的。托洛茨基的推论实际上是倒因为果，因为决定苏联是否是一个工人国家，首先就要看工人、官僚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并由此决定他们俩是否属于同个阶级。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② [苏]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编印，第181页。

如果他俩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决定了他俩属于不同的阶级，那么苏联就不是工人国家。但托洛茨基却是反过来：首先武断地守住苏联是工人国家这个观点，再从中先验地推出官僚必然属于工人阶级中的一个阶层，而全然不顾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实际关系。如果托洛茨基的苏联是工人国家，以及官僚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阶层等观点不能成立，那么，苏联是过渡社会^①，世界无产阶级对待苏联的态度等当然也就要全部修正。

三 苏联的社会性质：托派中的歧见之一

托派中的第一种歧见就认为，官僚是建立在财产国有制基础上的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这个国家据此可名为官僚集产主义国家。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应该是意大利的前托派成员布鲁诺·里齐，但他认为这仍然是一个比资本主义进步的制度。托洛茨基在辩论文集《保卫马克思主义》中的主要论敌盘纳姆、夏克曼等人以更粗糙的形式发展了这个观点，但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已无进步性可言，如果不是比资本主义更恶的话。中国托派王凡西在《苏联与社会主义》（或名《苏联研究》）（1950年于中国香港）一书中也持苏联是官僚集产主义的观点，而且论之甚详，颇可作为这一派的代表性观点来参看。

王凡西指出官僚统治地位的实现和对群众的剥削正是依赖于国有制的财产形式：“在反动的官僚与进步的财产形式之间，非但没有矛盾，倒是相合无间的。官僚的存在及其延续，非但不必抛弃集体主义的财产基础，倒是恰恰依靠着这个基础，恰恰以这一基础为其生死条件……举凡沙皇时代的幽灵，希腊东正教的丑物，全都被恢复了，可是都使他们复活在‘社会主义的’财产基础上，使他们适应并附属于这个基础。正是立足于国有财产制上面，借着这些古旧的规范典章之助，官僚们得以提高自己的权势到喜马拉雅山之巅，正是因为控制和支配了全体劳动者的剩余生产物，一手握住了经济与政治合一的大权，官僚们得以降低生产群众地位到

^① 顺便指出，即便按照托洛茨基本人对苏联性质的界定，苏联是过渡社会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根据托洛茨基，苏联需要一场得到西方国家社会革命配合的政治革命，才能向社会主义成功过渡。也就是说，苏联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只能是世界革命，而非其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称之为向着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吗？当然，如果根据托派中歧见者的观点，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的话，那么就更谈不上过渡社会了。

十八层地狱。”^① 官僚虽然与资产阶级一样是剥削阶级，但与以往的建立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剥削阶级毕竟不同，因而与其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不如认为他们是另一种新型的剥削阶级，这种剥削阶级建立在财产的集体所有制之上，因而名之为官僚集产主义。王凡西认为，它虽然还未曾完全定型，但在苏联已是一个独立与完整的制度形态了。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落后一国中堕落变态的产物，但一旦产生出这一制度以后，这一制度的复制就未必要重新经历苏联的那种过程了；就像最初的人虽然是从猴子变来，但后来人的生产就不必经历这个过程了。王凡西认为，虽然构成官僚集产主义诸特征的来源纷繁复杂，“譬如，有的是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有的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落后性，更有的是从法西斯那里直接抄来的。至于诸历史年代，则有的似乎属于未来（如全民国有制），而有的仿佛属于遥远的过去（如帝王崇拜、等级制、奴工，等等）。若论形式，则更是五光十色，弄得人眼花缭乱。凡是历史科学上见过的一切主义：奴隶主义、中世主义、绝对主义、拿破仑主义、法西斯主义、改良主义、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无一不可在官僚集产主义中找到各自的一点形相”^②，但是停留在这些分散的特征上是不行的，而必须要把握由它们所构成的这个整体的本质，这个整体的本质就是官僚集产主义。

这个观点对突破把国有制视为工人国家可靠标志的国有拜物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仍然令人难以认同。首先是觉得这个定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根性”，它似乎完全是这些论者生造出来的，它像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无力解释现实的情况下，便生造出一些新术语和新理论附加到马克思主义上去，于是它们便显得是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而不像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实际并对理论作出的新发展。最显然的一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关于支持这一论点的原理——不是找不到相关的语句，找不到相关的语句很正常，而是找不到相关的原理！因此，与其认为它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创新，不如说它们表现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根性。这个理论比托洛茨基的苏联理论更彻底地揭

^① 王凡西：《苏联与社会主义》，<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wangfanxi/marxist.org-chinese-wong-195007.htm>。

^② 同上。

示了、批判了苏联的阴暗面以及不可救药性、不值得保卫的原因，但是，总觉得失之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这些纷繁复杂现象的理论概括力和把握力，因而有点像是托洛茨基所谓的“术语行刺”。我们知道，在托派以外甚至马克思主义以外，也有持类似观点的，如密洛凡·德拉热斯的《新阶级》，但也只有“术语行刺”的效果，而缺乏马克思主义对事物本质的理论概括力。其次是按照这个理论，苏联模式是一种独立、完整的社会形态，而非任何过渡时期，那么应当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并持存一定的历史时期，但事实上，这一模式的垮台之速也表明它只能算是一种过渡时期（当然不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因为它缺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不断再生产自身的能力。就因为这种理论本身的无根性，就决定了它的非稳定性，持这种理论观点的人往往也不能从一而终，他们或者回到托派正统的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论（如王凡西），或者走到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去（如夏克曼和盘纳姆），甚至以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告终。

四 苏联的社会性质：托派中的歧见之二

我们接着来讨论托派中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第二种歧见，也即第三派观点。这派观点在反对托洛茨基的国有拜物教，认为官僚是一个阶级，苏联是一个剥削社会上与上述官僚集产主义论者有很大程度的相同之处。但是，他们不认为官僚是一个“新阶级”，苏联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他们认为苏联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当然是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官僚则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当然是特殊的资产阶级）。持这个观点的如日本的对马忠行和中国的郑超麟，而且持论者都比较坚守这个理论，这与该理论本身在马克思主义中有较可靠的理论根基有关。

（一）“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为了讨论这个理论，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虽然托洛茨基反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论，但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详细解释颇可参考：“‘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最初是指资产阶级国家直接负责运输工具或者工业企业时而出现的一切现象的。采取这种措施的必要性是生产力已经超过资本主义并且正在使资本主义在实践中部分地否定自己的征象之一。但是，这个衰落的制度连同它的自我否定的因素，还是作为资本主义

制度而继续存在下去。从理论上说，的确可以想像这样一种情况，即整个资产阶级本身可以构成一个股份公司，这个公司依靠它的国家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这样一种制度的经济法则不会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我们知道，一个资本家的利润收入并不是在他自己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所直接创造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是全国创造的总剩余价值按照他的资本额所应得到的一部分。在一种完整地‘国家资本主义’之下，这种平均利润率的法则不必经过迂回的道路——即各种资本之间进行竞争——来实现，而是立即直接地经过国家的计算就会实现。然而，这样一种制度还从来没有存在过，而由于财产所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它也永远不会存在——尤其是因为国家具有资本主义财产的唯一大贮藏所的性质以后，就会非常容易地变成社会革命的一个目标。”^①

托洛茨基的这段话表明，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克服自由竞争的无序性而产生的一种自我否定，其形式是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使国家履行一个总资本家的职责，各资本家好像都加入了国家这个总的股份公司，国家则在各资本家之间直接按其各自的股份额度分配利润，而免于无序的竞争。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所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而这个基本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述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国家资本主义要克服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个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一矛盾的加深，国家资本主义就成为一种补救的趋势。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就指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的上述矛盾的激化，国家的力量就愈益增强，资本与国家的结合就愈益紧密，国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的作用就日益凸显。当然，具体来说，在实际情况中，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不会像托洛茨基所说的直接分配利润那么简单。

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即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高级形态和成熟形态，他说：“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

^① [苏]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编印，第179页。

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顶点，国家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② 综上所述，国家资本主义是由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高阶形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家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越来越起到联合起来的资本家的作用，资产阶级国家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财产的唯一大贮藏所，这种趋势当然是为克服资本主义愈益激化的矛盾的产物。

（二）理论上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

可以设想，这种趋势发展到极端，整个资产阶级国家就只有一家总公司，也只有一个总资本家。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不仅如托洛茨基上面那段话中所指出，而且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集中时对此有更明确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到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到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③ 在这种极端形态下，无疑就达到了财产或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国有制，并且由于是在一个总资本家手下生产，无疑也实行了高度的计划，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可见，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和生产的完全计划化并非通往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有属性，而也可以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端形态所采取的形式。也因此，在国家资本主义与通往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两者之间，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了。这种相似性为前者向后者的革命性转变准备了物质条件，所以列宁要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3页。

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①但两者也有两点本质的不同：1. 前者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所有制，后者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所有制；2. 后者将导向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消亡。关于这两点本质的不同容后细论，这里暂且提出。

但是，上述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即上述引文中，马克思所说的一个社会中的全部资本融合为一个总资本这一点却还只是一种理论设想；尽管马克思所说的前一点，即一个生产部门中的全部资本融合为一个单一的资本这一点在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托拉斯中早已是某种事实。可能的原因有二：1. 现实因素的复杂性使得实际的发展总是不能达到理论抽象的纯粹性，就像利润率的平均化也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2. 就像托洛茨基所说，国家具有资本主义财产的唯一贮藏所的性质以后，就很容易成为社会革命的目标，也就是说，在真正达到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之前，已被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拿下了。

（三）理论上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特殊情况下转变为现实

但是，有没有一种特殊的可能，使这种在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中尚未实现的、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的、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某种意想不到的特殊条件下转变成现实？是的，蜕化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况。

那是什么条件铸成了这种特殊的可能呢？苏联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无产阶级专政，这在苏联一国的历史发展序列上是实现了一个大跃进，但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这种大跃进并不能保持，而必然要发生某种倒退，但是它又没有全然退回资本主义，而是退回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在理论上的极限状态。换言之，苏联先是进了一步，然后由于“一国社会主义”，倒退了半步，于是就进入了这种介于资本主义与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状态，即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退回了半步，但就苏联一国的视域来看，还是超出了苏联实际的发展水平，因为苏联实际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还是较低的，还远未达到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水平。所以，它与那种理想中的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又有区别，即主要是生产力水平上的差别。

苏联的这种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如上所说，具有与无产阶级专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页。

政的貌似性，但又有两点本质的不同：1. 它的国有制不是无产阶级的国有制。2. 它不是导向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消亡。所以它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仍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国家资本主义。苏联的情况正是这样，由无产阶级专政退回了国家资本主义，其原因就是我们在本节第一部分中反复强调的世界革命的夭折所导致的“一国社会主义”，这种“一国社会主义”必然要发生倒退，至于是倒退到一般的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则是一个程度问题、一个时间问题。但是说它在短时间内最容易倒退到（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好理解的，因为两者在形式上最相似。当然，苏联所实现的（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除了比理想中的（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更低之外，还与它自身的诸多特点相结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透过这些次要信息把握其本质。

（四）苏联国家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点区别

1. 区别之一

上面提到（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两点本质的不同。第一点是，虽然两者都是国有制，但由于国家的归属不同，财产和生产资料的归属便自然不同。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生产资料属于无产阶级即全体无产者。在（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家本身属于一个“总资本家”，因此生产资料的国有实际也就是这个“总资本家”所有。苏联的官僚就是这个“总资本家”。前文详细的论述已经指出，苏联官僚是一个与无产阶级不同的阶级，及其通过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等，此处不拟重复。此处仅需补充的是，苏联官僚这个不同于无产阶级的剥削阶级，正充当了（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中的“总资本家”角色。（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中的“总资本家”，虽然在理论抽象上说是“一个”，但其实当然不止一个，而只是说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不像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家那样，使他们似乎是“一个”。为了更好地理解，可以想象，斯大林这个苏联官僚的总代表，就是（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中的“总资本家”。其他的官僚都是以斯大林的利益为轴心旋转，就他们利益的一致性而言，是“一个”资本家。就他们通过国有制这个形式占有生产资料来说，他们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而非一般资本主义。就他们与工人的

对立，及其对工人的剥削来说，他们确实是“资本家”，而不可能是工人的同类。因而，总括上面三点，他们合起来就是（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中的“总资本家”。

那么，构成“总资本家”的这些官僚是否还构成为一个“阶级”呢？当然，也可以保留“阶级”这个称呼，但要理解它们之作为“一个总资本家”，与一般资产阶级的不同。郑超麟称之为“官僚资产阶级”，对马忠行称之为“号外资产阶级”。对马忠行的这个理论更具有启示性，他说：“如果将斯大林主义官僚看作一个阶级，应该定为什么阶级呢？我认为，恩格斯已经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随着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恩格斯的这段话，至今几乎还未被注意。但是，为了了解苏联统治层（不，是所有斯大林主义社会体制的统治层），这恰恰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可以把这些统治层规定为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资产阶级雇佣职员的最高形式。这是‘资产阶级之外的资产阶级’。我想，可以简单明了地称之为‘号外资产阶级’。”^①对马忠行说（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家阶级是“雇佣职员的高级形式”，苏联从上至下的官僚正是如此，他们采取了雇员的形式。

2. 区别之二

上面提到，苏联的（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第二点本质的不同，即后者应当导向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消亡，而前者不仅远不能做到这一点，而是恰恰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从这一点来看，它从本质上就脱不出资本主义这个范畴。正如对马忠行所说：“如果这个国家不是按照公社形式组织起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不是循着扬弃价值规律的方向，那么无论其国有化如何彻底，仍然要否定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我曾多次强调，是否理解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分水岭。”^②我们假设，如果资本主义发展到这种程度，即在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内（而不仅是一个社会

① [日]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② 同上书，第110页。

中) 达到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 即整个世界的资本都融合为一个总的资本, 掌握在一个总的资本家手里, 那么只要将这个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打破, 就立即可以使价值规律消亡, 也就是说价值规律的消亡只差这形式上的一步了。但是, 苏联的情况不是这样, 上面提到, 它的生产力其实远没有达到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程度, 它是硬被拽上来的, 因此, 生产力的低水平就决定了价值规律不可能趋于消亡, 而是要在更大规模上起作用。这就注定了苏联的这个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不能往前走, 不能往扬弃价值规律的方向上走, 而至多只能停留在(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点上, 并随时发生继续的倒退。这就是苏联问题的根本!

价值规律在苏联不能趋于消亡, 而且还要占据基础地位, 这完全是由生产力的较低水平决定的。关于价值规律在苏联占基础地位的说法, 正统托派如曼德尔是不承认的, 因此他们也就势必不能同意我们关于苏联不是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推论。曼德尔认为, 苏联只有局部存在的商品生产, 苏联经济“是计划配置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混合体, 价值规律起作用, 但是不占有主导地位。”^① 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

如何判断价值规律在一个社会中占基础地位与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讲“货币转化为资本”时指出其关键在于劳动力的买卖, 这也就是价值规律是否起基础作用的标准所在, 即劳动力的商品化, 或者说雇佣工资制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 商品生产局部存在, 但无劳动力的商品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价值规律不占基础地位; 在正常的、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中, 商品生产也可能局部存在, 但扬弃了劳动力的商品化, 也可以说价值规律不占基础地位。但在苏联这个特殊的、变态的过渡社会中, 却绝不能这么说。这是因为, 如拉雅女士所说, “斯大林主义体制所采取的积累方式是以雇佣工资制度(劳动力商品化)为基础的所谓生产财富中心主义这种本质上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为生产而生产’的制度)。”^② 在劳动力的商品化或雇佣工资制度不废除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导向价值规律消亡的方向, 而且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机能仍

^①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

^② 转引自:[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然存在，也就是说价值规律仍然起基础作用，因而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而不属于商品生产只是部分存在的过渡社会。曼德尔判断苏联社会中货币不能转变为资本的依据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只存在于消费品领域，而不再存在于生产资料领域，“在这时的市场条件下，它（即货币——引者注）自动地不再能转变为资本，因为私人占有生产工具受到禁止（工业），或大大受到限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因此，劳动力作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商品而由私人购买的情况消失了”^①。

（五）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为倒退埋下了伏笔

曼德尔认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制，或者说生产资料的非私人所有就能防止货币转变为资本。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本身就是“总资本家”呢？像我们上面对（极端形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那样，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劳动力作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商品而由私人购买的情况消失了”，但劳动力作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商品而由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购买的情况复活了。而况，随着苏联社会矛盾——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所有制关系的基本矛盾——以官僚主义为杠杆的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甚至在生产资料领域也在复活，如曼德尔指出：“企业自负盈亏的原则又使货币在生产资料领域内重新成为支付手段。因此，在生产资料领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重新出现的倾向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一切现象：计划化本身瓦解的倾向，就都显现出来。”^② 这表明什么呢？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不仅不能往前走，而且也不能原地维持，而有一种继续倒退的趋势。其原因还是我们前面说的，苏联本国生产力水平与所有制结构的不匹配，使它先从无产阶级专政倒退至（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再由（极端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继续后退。一直后退到什么程度才算稳定呢？从理论上说，一直要后退到大体符合于苏联本国的生产力水平的一般资本主义（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和一般垄断资本主义）为止。

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十月革命能得到欧洲革命的支持，从而苏联能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文明成果继承过来，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包

①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6页。

② 同上书，第220页。

括所有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事业，那么这些后退都能避免，而可以从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前进。当然，根据托洛茨基的革命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及其限度理论，苏联虽然先取得革命的胜利并先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但由于其本国经济的落后性还是会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晚进入社会主义。但尽管如此，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援助，至少可以保证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蜕化，只不过需要在过渡时期拖延较长的时间而已。所以世界革命仍是问题的关键。

据说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亚去世前也已采纳了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她在1961年11月9日给法兰西晚报的抗议信中指出：“如果不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使成为产生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基础的全部警察组织、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解体，那么一切非斯大林化运动显然都不过是纸上谈兵。”^①（黑体为引者所加）这里值得注意的关键词除了“国家资本主义”外，还有“反革命”和“经济组织”。因为前文指出过，托洛茨基在承认苏联的热月后，还认为这是革命基础上的反动，而难以说是反革命。此外，娜塔莉亚指出必须使全部“经济组织”解体，也就是说斯大林体制下的国有制也是完全不应保护的。这些都表明了其对托洛茨基生前观点的改变，也表明了随着形势的继续恶化托洛茨基之转向这一观点的可能。

^① 转引自：[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第二章 “第四国际”与曼德尔

为了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理解曼德尔，除了有必要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外，还有必要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历史。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也是一个少有研究的大课题，特别是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诸多分裂和派别林立，更使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显得头绪纷繁。像前一章对托洛茨基主义基本理论的论述一样，这里也只能突出几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以一窥“第四国际”形成及后续发展的概貌，从而为更好地理解曼德尔的事业和思想提供一个必要的背景。

第一节 “第四国际”的形成

据《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中所说，“托洛茨基主义”一词是由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曾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米留可夫首先使用的，并且他早在1905年就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过殊死斗争。后来，“托洛茨基主义”被托洛茨基的对手在党内斗争中使用，把它变成了一个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称呼，也就是说，通过它人为地制造出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不可弥合的对立。季诺维也夫在自己支持者的一次集会上曾坦白说：“同志们，这应当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①如上文所说，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在革命战略（即所谓不断革命论的“纵的方面”）上确曾有过分歧，但这些分歧在十月革命前后已逐渐弥合，然而托洛茨基的反对者们却利用这些分歧，“把过去的意

^① [日]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以便为夺取权力服务。自从1923年3月列宁病倒起，苏联党内就陷入争夺权力的派别斗争，其主要阶段如下：

1923—1925年：

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longleftrightarrow 托派（左翼反对派）

1926—1927年：

斯大林、布哈林派 \longleftrightarrow 托派、季诺维也夫派（联合反对派）

1928年下半年：

斯大林 \longleftrightarrow 布哈林派

最终斯大林通过对党内主要人物和派别的各个击破独揽大权，苏联和共产国际开始斯大林化的过程。而由于托洛茨基派始终没有停止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活动，因此成为斯大林不断要打击的对象。特别是托洛茨基流亡海外后，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对斯大林主义苏联来说，成了比帝国主义更大的威胁，斯大林深感低估了托洛茨基，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国是一个错误。于是，要求各国共产党严厉肃清和镇压托派，对托洛茨基本人更是急欲除之而后快。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终于被斯大林派买通的凶手西班牙人拉蒙·梅尔卡德暗害。在这个过程中，托洛茨基在权斗中的笨拙策略常为人所诟病，特别是托洛茨基没有很好地利用列宁的《遗嘱》——列宁在《遗嘱》中提出了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托洛茨基甚至一度公开否认这份遗嘱的存在。这决定性地导致了托洛茨基派的失败和斯大林派的上台。本来，根据托洛茨基当时在苏联和党内远高于斯大林的影响，加上列宁的《遗嘱》，如果托洛茨基能运用适当的斗争策略（这对于擅长作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分析的托洛茨基来说本是不难实现的），要在派别斗争中胜出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这位擅长革命战略与策略的革命家在党内斗争中却常常显得笨拙和错失良机，这多少是个谜，不少托洛茨基主义者或亲托洛茨基主义者往往为此惋惜。然而，在曼德尔看来，责怪托洛茨基在权斗中策略笨拙的人完全误解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根本无意于权力斗争的，“在左翼反对派看来，官僚篡权本身是革命退潮的标志。在群众陷于被动的时期而进行‘权争’，是冒险家和反动头目干的事，尽管他们间或使自己隐藏于过去的革命旗帜的飘展之中。对于深知‘权力’只是来源于群众的革命攻势的人来说，反动时期的任务显然在于

保持革命传统、在党的先进分子之间保持接触、分析热月的发展，从而为世界舞台上以及苏联将来的革命浪潮做好准备。”^① 托洛茨基本人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托洛茨基派通过权斗而上台，那与斯大林主义官僚还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但是，难道大革命家在革命的关节点上就不能采取一点“权谋”上的灵活性，以便于推进革命的发展吗？列宁就不是这样的。列宁就有高度灵活性的一面，“一旦看到现实必要性，他就能排除其他考虑，乃至使用一些不大光明磊落的手段，如在他反对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时那样，有时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乘德国的铅封车返回俄国。”^② 王凡西在《毛泽东思想论稿》中也分析过列宁是善于把“经”与“权”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范。托洛茨基在这方面就远不如列宁，就凭这个原因，托洛茨基也只能充当第二小提琴手。

如果说1923年至1928年是托派反对派在苏联国内形成和活动的时期，那么随着1929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1929年至1933年初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形成时期。这个时候的主要活动包括：（一）在1929年夏的中东铁路事件^③中，苏联派军进行干预，此时有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提出“苏联帝国主义”和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针对此，托洛茨基在《保卫苏联和左翼反对派》的小册子中指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指出要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保卫苏联；（二）就是上文在论述对共产国际的批判时讲到的促成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三）把自己作为共产国际内的反对派反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这段时期，托洛茨基还不曾设想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尽管有人向托

^①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9.

^② 石瓮、施用勤等：《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译者前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③ “那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有一段路线要经过中国领土。关于在中国领土上的那一段铁路的管理问题，苏联和中国当时订有协议。这些协议是在列宁的政府主动废除了沙皇时代签订的所有条约……后，由苏、中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缔结的。中国的反革命势力取得胜利以后，蒋介石想用武力把负责管理该段铁路的苏联人员赶走。从战略观点上看，这对苏联构成很大的威胁，因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太平洋的港口会因此而同整个西伯利亚隔绝。”参看〔法〕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刘宏宜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洛茨基提议，但却被托洛茨基拒绝。如与托洛茨基并肩战斗过的皮埃尔·弗朗克所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时期的政策是，反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和新的革命政党。我们的政策把为纠正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支部的斗争作为基本方向。尽管我们遭到排斥，我们还是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国际及共产党的一个派别，一个为使这些组织重新采取一项正确的革命政策而斗争的派别。”^①

1933年夏季前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托洛茨基决定建立“第四国际”。促成这一转折的直接原因是上述共产国际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面前的彻底破产，而斯大林派的共产国际毫无悔改之意，这使托洛茨基深感共产国际已无可救药，不可对它再图改良。并且从1935年初起，托洛茨基提出需要在苏联进行补充性的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但“第四国际”在1938年才正式建立，在这之前的1933年至1938年可以看作是“第四国际”的筹备期。托洛茨基把建立“第四国际”看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十月革命。“第四国际”的筹备工作主要包括：（一）“1933年秋英国独立工党召开了一次向那些既不属于第二国际、也不属于第三国际的组织开放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希特勒的上台对国际局势和全世界工人运动所发生的影响。托洛茨基主义者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们在会上寻求支持者，宣传‘成立第四国际的必要性’，说服其他组织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这次会议最后发表了由托派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德国工人社会党、荷兰的工人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联合签署的《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宣布必须建立新的国际。”^②（二）1934年春，拟定第一个《过渡纲领》的草案。（三）由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弱小，所以采取“打进去主义”的组织策略，即使自己加入现有的社会党中。这个策略在一定时期内扩大了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队伍，但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如果说在苏联社会性质观点上的分歧是促使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分裂的主要原因，那么它就是第二原因。

^① [法] 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刘宏宜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页。

^② 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3页。

1938年9月，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宣告“第四国际”的成立，把托洛茨基主笔的《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过渡纲领》（简称《过渡纲领》）提交会议审查并获得通过，它成为指导“第四国际”活动的纲领性文件。全文分为21小节：“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无产阶级及其领导”、“最低纲领和过渡纲领”、“工资和工时的活的计算法”、“过渡时期的工会”、“工厂委员会”、“‘营业秘密’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没收个别资本家集团的财产”、“没收私人银行和信贷体系国有化”、“纠察线—警卫—工人民兵队—武装无产阶级问题”、“工农联盟”、“反帝和反战斗争”、“工农政府”、“苏维埃”、“落后国家和过渡要求的纲领”、“在法西斯国家里的过渡要求纲领”、“苏联和过渡时期问题”、“反对机会主义和无原则的修正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开辟通向女工的道路！开辟通向青年的道路！”和“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来！”其主题思想是：“国际上的客观形势处于革命前夜，而革命的主观条件则大大落后于这种客观条件，处于危机中。在这种认识下，文章提出恢复和重建真正的革命指挥部，提出了这个指挥部所应采取的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政策和要求。”^①这个纲领中已为现实所证伪的判断有：（一）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客观形势。实际上，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接二连三的失败势必使革命形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处于低潮期。（二）低估了官僚统治对无产阶级的杀伤力和消极影响，从而也低估了官僚统治的维持能力和维持时间。（三）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经调节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涵容度。实际上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策再次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纲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作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生产力已陷于停滞。新的发明和改进已经不能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平”^②的错误判断。

托洛茨基身后的“第四国际”并未如托洛茨基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发展

^① [日]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53页。

^② [苏] 托洛茨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过渡纲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ia-chinese-fi-19380903.htm>。

壮大，而是陷入了诸多的理论分歧和派别分裂。其中1953年经历了一次大的分裂，分裂为“国际书记处”和“国际委员会”。更确切地说，“国际委员会”和其他“第四国际”派别都是从“国际书记处”分裂出去的，因此后者往往以“第四国际”的正宗自居。1963年6月，召开了重新统一代表大会，“国际书记处”更名为“统一书记处”，以突出它是统一以后“第四国际”的领导机关。“第四国际”共有六个主要派别，除上述“统一书记处”（“国际书记处”）和“国际委员会”外，还有“第四国际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拉丁美洲‘第四国际’书记处”、“争取重建‘第四国际’组织”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即“斯巴达克同盟”）。其中，“统一书记处”是影响最大的“第四国际”组织，如上所说，也是托洛茨基当年所建“第四国际”的主脉，曼德尔就曾长期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领袖。“国际委员会”则仅次于之。据说，2005年左右，这两个最大的“第四国际”组织实现了1953年大分裂以来的首次合并。由于材料所限，我们对当代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枝节尚没有十分具体的了解，但通过对当代最大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最主要理论家曼德尔思想的研讨，便不难把捉当代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及其利弊得失。

第二节 曼德尔与托洛茨基主义

曼德尔是一位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确切地说，他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位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其次才把自己定位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他曾任比利时自由大学教授，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但教授、学者都不是他的主要身份，他的主要身份是与“第四国际”联系在一起。

“第四国际”由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于1938年创建，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已为斯大林背叛，斯大林领导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已名存实亡，因此，有必要重建一个真正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工人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遇刺身亡后，“第四国际”不断分裂，不少流派自称“第四国际”或托派组织，曼德尔所领导的是其中影响最大的那个流派。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至1995年去世，曼德尔曾长期担任“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他继承托洛茨基遗志，把发展“第四国际”、推进世界革命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是他所认为的最值得一过的人生。在为驳斥乔恩·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一书而写的《何以误解马克思》一文中，曼德尔引用了马克思信中的这样一段话：“那末，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①这段引述既体现了曼德尔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理解，其实也是曼德尔自己终其一生身体力行的信念。

曼德尔与托派的关系一直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特殊经历对于这位革命家品质和信念的形成，无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且让我们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

曼德尔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裔家庭。曼德尔的父亲亨利·曼德尔由于不愿在1914年的战争中服役，逃至荷兰。直到1918年，德国发生十一月革命，推翻德皇威廉二世，亨利·曼德尔才回到德国，在布尔什维克政府创办的苏维埃新闻社柏林办事处工作。但没过多久，1919年1月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害的消息传来，使亨利震惊，于是携妻再度离开德国，这次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定居。安特卫普位于比利时西北部斯海尔德河畔，这就是曼德尔自小成长并培育了曼德尔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地方。只是为了生下儿子，曼德尔的父母才从比利时回到了德国的法兰克福。那是1923年4月，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刚刚夭折。

1929—1933年发生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希特勒上台那年曼德尔10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他16岁。由此可见，曼德尔的少年时代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经济危机以及战争的背景度过的。按理，那对于曼德尔应当是一段灰暗的记忆。但曼德尔在塔里克·艾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3—544页。

(Tariq Ali) 对他的采访记中却说：“对于那段时期我根本没有坏印象，而是正相反。记忆中的那时充满了紧张、兴奋和惶恐，但毫不沮丧，绝对没有。这与我们家浓厚的政治氛围不无关系。”^①

曼德尔的父亲对曼德尔影响很大，不仅把每天的新闻解释给曼德尔听，向曼德尔讲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而且还使曼德尔得以从书架上读到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著作，俄国文学作品和当时的革命期刊。

20世纪30年代的安特卫普是个动荡然而工人运动活跃的地方，“生动、积极的工人运动包含了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托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埃内斯特在社会主义革命党内，与最前进的工人，阶级斗争的（时常自学而成的）领导人结交。那时的社会党也是‘第四国际’德国流亡支部核心分子的基地。所有这些都使这个党成为狂热的、国际主义的小天地：热情的讨论，准备一份偷入德国的报纸，安排与在地下向希特勒斗争的同志们接触，与托洛茨基本人的通讯。”^②曼德尔这段时期与工人阶级领导人和政治活跃分子相接触的切身经历更增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也决定了他与托派的结交。据曼德尔自己在塔里克·艾里（Tariq Ali）对他的采访记中所说，他在13岁时就成了托派的“同情者”（sympathizer），15岁正式加入托派。

纳粹占领比利时期间，比利时的托派组织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多人或被捕或被杀。曼德尔当然也积极参与其中，他的主要活动是向占领比利时的纳粹士兵散发反战传单，那时他不到16岁。曼德尔也未能免于被捕的命运。第一次被捕时，在押至营地的途中，曼德尔主动与押送他的狱卒交谈，得知他们原先是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的党员，于是曼德尔向他们讲解这场战争的性质、自己的信念，说服他们放了自己。就这样，曼德尔以其机智和口才，成功地得以逃脱。

但这一次对曼德尔来说仅是一个开始，据曼德尔自己所说，他前后共被捕四次。“第一次被捕时，我成功地逃避了关押。我又被抓了第二次，

^① “Tariq Ali interviews Ernest Mandel—The Luck of a Crazy Youth”,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网，<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index.htm>（以下同一网址不再标出）。

^② [比] 维尔卡曼（Francois Vercaemmen）：《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从关押的营地逃脱了。第三次被抓时，我被带到了德国。”^① 第三次被捕是在1944年3月，他在德国最大的一家工厂里生产供战争用的汽油。这里的狱友来自各个国家，狱卒也参差不齐，有些原先就是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的党员。曼德尔结交志同道合的狱友，在狱卒中寻找政治上的同情者，终于又制订出一套逃跑的计划。在狱友的帮助下，他换下囚服，趁着每日清晨营地周围的电网栅栏断电的片刻翻墙而逃。在逃亡途中，他得到了好心人的帮助，给了他许多食物。但不幸的是，在逃出的第三个晚上，却又被追回。这次曼德尔有被就地处决的危险，但曼德尔仍不失果敢和机智。他对抓他的士兵说：“听着，你没看报纸吗，盟军已在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引者注），很快就要到亚琛（德国一地名，靠近比利时边境——引者注）了。如果你杀了我，你很快就会遇到大麻烦。最好把我抓回监狱就了事。”^② 于是，曼德尔幸免于难，这个士兵甚至还给了曼德尔一大块面包。但曼德尔还留了一招，他谎报了姓名和原来的监狱，这样曼德尔就被送到了另一个监狱去。原来的监狱长知道此事后想处决曼德尔，但由于是在另一个监狱里，他无权处置。当然，他们从没有想到曼德尔会是犹太人。曼德尔虽被戴上铁链，但得以幸存下来，直到1945年4月获释。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到故乡与同志们会合。

曼德尔青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对于他的国际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等革命家品质的锻造和形成，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的。

接下来曼德尔的主要活动就与“第四国际”联系在一起了，把革命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持续关注并在可能的时候把世界各地的革命浪潮推向新的高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革命浪潮是60年代的古巴革命、越南战争。1966年，切·格瓦拉邀曼德尔到古巴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紧接着，著名的1968年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曼德尔以革命家的敏锐投入到这些事变中，一面赶往各地进行演讲、讨论、激辩，一面在理论上进行着新的思考和总结。不久，曼德尔

^① “Tariq Ali interviews Ernest Mandel—The Luck of a Crazy Youth”,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网。

^② “Tariq Ali interviews Ernest Mandel—The Luck of a Crazy Youth”,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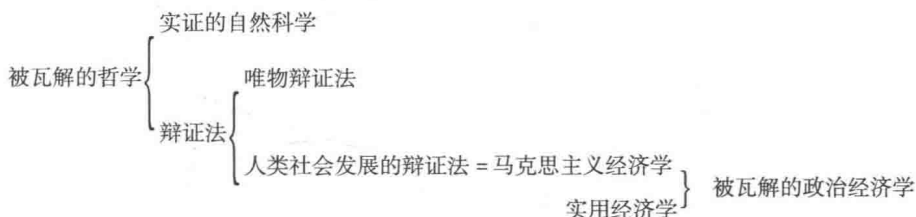
就成了整个激进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而遭到了一系列西方国家的拒绝入境。在这个过程中，曼德尔致力于扩大“第四国际”的影响和队伍，但也毫不含糊地与其他自称“第四国际”或托派组织的流派在原则问题上划清界限并据理力争。在曼德尔的领导下，“第四国际”的规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尽管与托洛茨基当初的预计犹有距离。

然而，这样一个忙于各种革命实践的社会活动家，居然也给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在《曼德尔（1923—1995）思想肖像》一文中说：“这些著作可以容易地集成几十卷”，“列出曼德尔著作的详尽无遗的目录，即使不包括他的浩瀚信件，而只限于出版了的著作、书本、小册子和文章，也是一件博士论文规模的工作。”^①据 Gilbert Achcar 所说，曼德尔的写作才能还表现在，他能以德文、法文、英文、弗莱芒文等多种文字写作，他经常能够做到快乐地写作，他能在参加政治活动的同时进行写作。其实在“第四国际”内，曼德尔并非特例，在《今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教派主义还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这篇长文中，曼德尔以浩大的篇幅列出了“第四国际”以及接近“第四国际”的作家们所写的书目，为的是表明融入现实与写作之间是没有矛盾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做资产阶级式的书斋学者，而应当把学术研究与革命实践融为一体。曼德尔的著述，不管是宣传性的通俗小册子、充满战斗激情的檄文，还是不无晦涩的皇皇巨著，都是直接为他的革命实践服务的，无助于革命事业的书斋式研究是他所不屑一顾的。

曼德尔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以经济学著称，这与他对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特内涵的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认识有关：“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便是一种意识形态。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著作是当时两种重要意识形态超时代的著作。这两种意识形态之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里面；另一个意识形态则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里面。在被马克思瓦解了的哲学里面，产生两条调查研究的道路：一方面是实证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

^① [黎巴嫩] 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曼德尔（1923—1995）思想肖像》，万毓译校订，“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是辩证法。同样，被超过了的政治经济学也留下两笔遗产。其一是实用经济学（工农业生产组织，一般的组织学等等）。其二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① 其间的关系可由下图表示出：



在曼德尔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被瓦解的哲学和被瓦解的政治经济学两方面的遗产相结合的道路，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的枢纽；撇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还是有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的，但一定没有马克思主义。曼德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解直接决定了他的致思路向和实践品格。

曼德尔的著作中译成中文的也已有不少（包括已出版的和能在网上读到的），专著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卷）（1962年^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1964年）、《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其中《论官僚主义》于1967年，《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于1976年）、《晚期资本主义》（1972年）、《新〈资本论〉导言》（三篇分别于1976年、1978年、1981年）、《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1977年）、《论欧洲共产主义》（1978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80年）、《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1986年）、《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1992年）、《以托洛斯基为可供选择的道路》（缺第十一章）（1992年）、《今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1979年）中的若干章节，以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上的50余篇文章。

根据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的提示，未译成中文的曼德尔

^①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4页。

^② 由于曼德尔的同一著作以多种语言在不同的国家多次出版，不同的资料中对于其初版的年份也不尽一致，所以我们此处所标的这些著作初版的年份也未必完全准确，但亦不会相差太多。

的专著主要还有：《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美的竞争》（1968年）、《工人监督、工人委员会、自我管理》（1970年）、《危机》（或《第二次衰退：对1970年代经济衰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978年）、《对阿图塞及艾伦斯坦的回应》（197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1986年）、《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往何处去》（或《超越新思维》）（1989年）、《1917年十月：政变还是社会革命？》（1993年），等等。曼德尔甚至还写过一本《快乐的谋杀：犯罪小说的社会史》（1984年），那是80年代初期革命斗争退潮的那几年曼德尔研读了几十本侦探小说的成果。此外，还有“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国际马克思主义文库）网上的约一百五十篇英文文献。

如果说《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为他在国际学界奠定了初步的地位，《晚期资本主义》一书则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使他的影响大大超出了“第四国际”的范围。他除了主编“第四国际”的刊物外，还经常为《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新时代》（*New Times*）、《国际新闻通讯》（*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等多种刊物供稿，在“第四国际”的立场上对各种重大事件作出回应、表明态度，使他成为国际论坛上的活跃人物。1978年，曼德尔被剑桥大学邀去担任马歇尔讲座的主讲人，他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长波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对此的修改补充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书，成为曼德尔的又一名著。

曼德尔自认为自己的思想底色是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并以托洛茨基为最近的导师，因而，曼德尔更以托洛茨基的直接继承者自居。与托洛茨基的这种渊源关系，无疑使曼德尔思想的各方面深受托洛茨基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也绝不是同质的：他的革命理论和过渡社会理论受托洛茨基的影响较大，其中不少理论甚至就是直接搬自于托洛茨基；但他的经济学理论则直接继承自马克思，而非托洛茨基，其中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和长波理论更是溢出托派固有框架的理论创造。

第三章 “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与方法

第一节 “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

自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提出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时代向资本主义的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是的话，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是何种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还能适用？这个问题在众多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就是对此问题的一个系统回答，曼德尔自己认为这是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基础的一种回答。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成了曼德尔思想中最重要、为研究者们关注最多的一个方面，很多时候曼德尔的名字是与“晚期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美国著名的后现代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表明他的“晚期资本主义”术语源于曼德尔。然而，“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并非曼德尔的首创，在曼德尔之前，维尔纳·桑巴特、纳塔莉·莫斯科斯卡、波洛克、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过“晚期资本主义”一词，几乎与曼德尔同时，哈贝马斯在其《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中也使用了“晚期资本主义”一词。^①那么，曼德尔对这个术语是怎么看的，赋予了它怎样独特的含义？只有到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概念的具体形成过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① 张亮：《晚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晚期资本主义”：一种历史考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9—11页。

一 正题：“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

“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是曼德尔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62年）一书中提出的。两卷本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曼德尔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曼德尔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完成这部著作花了曼德尔十年以上的时间。正是这部著作，首次体现出曼德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上的才华，奠定了曼德尔在国际学界的地位。

此书的写作背景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一）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正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其中的经验和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另外，自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提出以来，资本主义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至少在现象层面上呈现出或多或少的新面貌。这两个方面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及论述的。（二）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经济史、人种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发展，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理论的重新叙述提供了广泛的新素材。（三）自“凯恩斯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继上升时期、分化时期、庸俗时期之后进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第四个时期，即纯实用主义时期，其作用主要不再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理论辩护，而是成为不断修补资本主义经济弊病的实用技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此时受到的挑战主要已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际上的。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态度只能是无视它的科学性和学术性，至多把它作为“苏维埃学”或“马克思学”这种特殊学科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四）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被扭曲来为现实政治服务，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上述这些背景使得曼德尔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理论的重新叙述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显得必要，又成为可能。

在此书中，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理论的重新叙述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接着讲”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以苏联为典型的过渡社会经济的论述；一个是对继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曼德尔把继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或“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曼德尔对这一阶段特点的论述中有不少被包括进了后来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诸如以下这些：国家干预的加强，国家通

过诸种措施保障垄断资本的利润；军火经济能在一定限度内缓解经济危机，但它的代价是会引发战争，也会导致持久的通货膨胀；除军火经济外，私人负债、公债的增长也是通货膨胀的原因，持久的通货膨胀成为缓解经济危机压力的一种手段；服务业的巨大发展；技术的不断革新使自动化得到发展；等等。因此，可以说，在曼德尔对“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论述中已有了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萌芽和元素。但是，也可以见出，对于继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曼德尔此时的认识与后来的认识有所不同。“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集中地反映了曼德尔对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的总体认识，即曼德尔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不变性、陈旧性，在这个阶段上即便有一些新特点，也显得比较次要，至多是资本主义在将死之前的回光返照，构不成一种整体上的新面貌。

二 反题：“新资本主义”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曼德尔也写过不少通俗易懂的小册子，把自己的学术观点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1964年）是其中影响最广的一本，约以12种语言发行了超过200万本。这本小册子的第一、二章论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第三章阐述了他自己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的认识。曼德尔把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这个新阶段称为“新资本主义”。曼德尔对“新资本主义”特点的论述与上述对“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特点的论述，有许多是相一致的，比如：国家干预的加强，军火经济及其对危机的缓解作用，持久的通货膨胀，不断的技术革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仍然存在与危机的不可避免，等等。但是，曼德尔对“新资本主义”的论述以较少的篇幅对资本主义的这个发展阶段作了更明确的界定，因而使它的轮廓更清晰了。比如，曼德尔指出，“新资本主义”在时间上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扩张期，其特征是资本主义世界利润率的长期增长；“新资本主义”的模式起源于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美国对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新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反危机的确起到了实际的作用。总之，曼德尔对“新资本主义”的论述与他后来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更加接近了，可以说，已经勾勒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雏形。上述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把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这个阶段再称为“没落时期的资本主

义”显然已不再合适，曼德尔使用“新资本主义”来取而代之。“新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同样地集中反映了曼德尔此时对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的总体性认识：虽然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基本矛盾没有变，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呈现出的新现象、新特点的确使资本主义的面貌发生了一种整体性的变化，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可以与古典帝国主义时期相区别的新阶段。

三 合题：“晚期资本主义”

在《晚期资本主义》（1972年）一书中，曼德尔使用了“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这是曼德尔最重要的代表作，曼德尔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也最高。

如果说“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在本质层面上的“不变”，而“新资本主义”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在现象层面上的“变”，那么，曼德尔继而使用“晚期资本主义”，是希望表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即把上述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因而，可以把“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这三者的关系恰切地称为正题、反题和合题，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曼德尔使用“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意思。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一方面强调：“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决不是暗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有了变化，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发现成为过时。正如列宁只能在《资本论》的基础上来发展他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以证明控制着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过程的一般规律。因此，我们在今天也只能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基础上来试对晚期资本主义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①；另外又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显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新阶段”^②，即继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古典帝国主义之后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

在这些新特点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资本主义经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

济经历了一个以平均利润率快速增长为特征的长期迅速发展的时期，这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多少是一个挑战。这也是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一开篇就提到的问题。总的说来，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内涵丰富，从各个方面论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以下是其中主要的一些：（一）晚期资本主义远非“后工业化”，而是一种彻底的工业化。（二）越来越多的资本渗透进非生产性领域，使得服务部门的大发展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特点。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从而表现为一种“消费社会”。这种“消费社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了积极与消极两重性的影响。（三）为了克服实现剩余价值的越来越大的困难，广告与市场研究和消费者信贷这两个服务部门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会获得高于一般服务业的发展。（四）持久的军火经济在短期内加速了资本积累，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即便单纯从经济角度看，持久的军火经济对通向危机的矛盾和压力的缓冲作用也会越来越弱。（五）持久的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在“晚期”阶段维持其发展所不得不依赖的手段，因此，持久的通货膨胀对于晚期资本主义不是一种例外，而是一种正常机制。但它终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转变成快速的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六）科技正式成为资本的一个分支部门，专门服务于资本主义这个社会机制，跟其他领域一样，成为资本的投资领域，以此获得平均利润或更高的利润。这意味着科技已彻底陷入了资本的异化格局，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七）智力劳动跟体力劳动一样分工细化，青少年自觉自愿地、自以为自由地走入科技或智力分工的狭隘囚笼中去，而失去了对整体社会与生活的反思。（八）晚期资本主义不仅在物质上积累着解放力量，而且在思想上教育了工人阶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这些特点及其中所蕴含的矛盾，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关系，在第五章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面貌与基本矛盾时还要详加论述。

第二节 “晚期资本主义”的方法

曼德尔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序”中着重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的第一章中也专门论述了此书的方法论，但不难发现这两处对方法论的论述是有所变化的，换言之，

曼德尔这两部书的方法论是有所不同的。这是由于两本书内容上的不同所决定的。《晚期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对《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接着讲，《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到帝国主义时期，《晚期资本主义》则讲帝国主义往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内容上的不同决定了方法论上的不同。以下我们先简略地谈一谈《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的方法论，以便于在一种比较的视域中更好地理解曼德尔方法论上的变化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方法论。

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序”中，曼德尔对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非常重视，认为对这一方法的误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不是一种本体论，而只是一种叙述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1872年第二版跋”中说明过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每一段历史，比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都有无数的历史事实。当我们着手研究人类的历史过程时，需要掌握尽可能丰富的材料，详尽了解每一段历史的方方面面。这是研究过程。直至这种研究进行到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算完成了对至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考察。此时纵观这一过程，才能发现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历史规律 = 逻辑），分辨出起决定作用的那些历史细节。这个研究过程完成之后，才可以回过头来叙述历史。在叙述过程中，要对历史事实有严格的筛选，突出那些起决定作用的历史细节，从而使这种对历史的叙述（其实也是对历史的某种“重构”）能体现出通过研究认识到的历史规律。可见，是这样两个过程：①在研究过程中，从无数历史事实中得出逻辑（或历史规律），②在叙述过程中，以已经得出的逻辑“重构”历史。那么，以逻辑“重构”出来的历史当然是与逻辑相一致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专门论述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① 后来我们把这种方法简化为：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理性具体。

根据我们以上的论述，“第一条道路”相当于研究的过程，“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意味着从无数历史事实中得出逻辑（或历史规律）；“第二条道路”相当于叙述的过程，“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意味着以已经得出的逻辑“重构”历史。研究的起点是“感性具体”，研究的成果或叙述的起点是“理性抽象”，叙述的成果是“理性具体”。

资产阶级经济学停留于“第一条道路”上，停留于抽象的经济范畴，因此，马克思指出：“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而“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②

马克思所写的经济学手稿，是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的记录，但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是不同的，不能把研究成果直接作为叙述成果发表出来。事实上，研究上每前进一个阶段，原有的叙述就要推翻重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留下了如此巨量的经济学手稿，而一部著作的正式发表却显得这么艰难。

马克思只完整地叙述了《资本论》的第1卷，恩格斯据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发表了第2卷和第3卷，考茨基又据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发表了第4卷。但马克思的这些手稿所记录的只是马克思的研究过程，而非叙述过程，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想象，如果由马克思自己把《资本论》叙述完，那么接下来的几卷将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其间的差别也就是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之间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从更好地体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论》是可以重写即重新叙述的。

曼德尔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写作《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的。由于上面提到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的写作背景，曼德尔力图在此书的写作中以经典作家（主要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已有理论为根据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适用于本时代的、富有生命的科学理论。因此，就其观点的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② 同上。

质而言，几乎都不是新的，都可以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原型，这大概就是少有人去研究它的原因。但所使用的材料又是全新的，全书对经典作家的引用不超过十处，而当代主要经济学家、经济史家、人种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论断却随处可见，因此它的面貌又是全新的。因此，这部书的写作，实际上略过了第一步的“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的研究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然主要是马克思，已经对此完成过了，不需再靠他自己的研究过程得出逻辑（或历史规律）；他所要做的只是第二步的“理性抽象→理性具体”的叙述过程，即以马克思已经给定的逻辑“重构”历史，而在这一步上也已有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巨量手稿中提供的光辉范本，曼德尔只需学着重做一番。

逻辑是“旧”的，历史当然也不“新”，但由于经济史、人种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不断更新所提供的材料，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却是不断更新的，因此，曼德尔的此一以逻辑“重构”历史仍可以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有成果的新面貌——曼德尔成功地“以新瓶装了旧酒”——而这恰是曼德尔写作《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要达到的目的。

然而，《晚期资本主义》的情况就不同了，“晚期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它的任务就不再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按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加以重新叙述的问题了。对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不是重新叙述的问题，而是要从对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新的“感性具体”的研究过程入手。但曼德尔的情况却又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是“白手起家”，曼德尔却不是“从零开始”。因为上面说过，在本质层面上的“不变”与在现象层面上的“变”，是“晚期资本主义”概念的两个方面，因此，它的方法论就要处理这个现象层面的“变”与本质层面的“不变”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这个方法论必须解决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本质规律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新现象之间建立桥梁和联系的问题。因此，曼德尔不是可以兀自地去进行“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理性具体”的过程，而是要解决他所研究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新的“感性具体”与马克思已得出的并以“理性具体”的形式叙述出来的“理性抽象”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便是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的开始部分所一再强调的：

“本书的基本目的是要对 20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提供一种解释，以便使‘总的资本’的运动规律能与‘多种资本’的具体的、现象方面的形式相调和”^①；“《晚期资本主义》一书要试图解释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发现的那种就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而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战后历史。换句话说，这部书想说明的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抽象的’运动规律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部开展的‘具体的’历史中，仍然在起作用并可加以证实”^②；“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的一般运动规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一个最为复杂的问题。这种关系一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阐述，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其难度。”^③ 简言之，一方面，是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至今未变的抽象的资本主义本质规律；另一方面，是不断变化的具体的资本主义现实历史，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并用前者来说明后者，这是曼德尔首先要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完成的“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理性具体”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随着现实历史的发展，以“理性具体”的形式叙述出来的“理性抽象”还要摆回新的“感性具体”那一头，从而来回地经历辩证发展。

为了说明这一点，曼德尔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了如下说明——在这种说明中提出了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即中间环节理论：

- “1. 深入地占有经验方面的材料并精通这种材料（外表）在历史上所有的有关细节；
2. 分析这种材料并划分其组成的抽象因素（从具体到抽象的进程）；
3. 探索这些因素之间有决定意义的一般联系，这些联系说明这种材料的抽象的运动规律，换句话说，就是说明其本质；
4. 发现有决定性意义的中间环节，这种中间环节对材料的本质与外表之间的媒介是有影响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进程，或者具体作为多种决定联合体在思维中的再现）；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 页。

② 同上书，第 4 页。

③ 同上书，第 7 页。

5. 在具体历史的发展运动中对分析（上面第2、3、4条）从实践和经验方面的证实；

6. 在无比复杂的现实中，通过对知识以及以知识为基础的实践的运用来发现新的、在经验方面有关的资料和新的联系——甚至往往是新的、抽象的、基本的决定。”^①

从第1点到第2、3点，是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② 从第1点到第2点的过程，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③ 第3点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④ 这些经济学体系仍是抽象的，是“材料的抽象的运动规律”。第4点是通过中间环节由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过程。第5点是在实践中对认识的检验。第6点是指由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过程并非一次性的，而是随着历史中新的感性具体的发展，需要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来回摆动、不断丰富，正如卡莱尔·科西克所说：“如果实在是一个辩证的、有结构的整体，那么，对实在的具体认识就不等于把事实与事实、发现与发现系统地排列起来，而是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即从整体到它的部分、从部分再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现象，从总体到矛盾、从矛盾到总体的演进过程。认识就在这个总体化的螺旋式过程中达到具体。”^⑤

因此，在至今未变的资本主义抽象规律与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具体现实这两者间建立联系，并以前者来说明后者，也就是要完成一次新的由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过程，其关键步骤是找到有决定意义的中间环节。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捷克]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曼德尔所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联结抽象与具体两者的中间环节是以下六个项目：总的资本有机构成、永久资本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分配情况、剩余价值率的发展、积累率的发展、资本周转时间的发展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这六个项目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部分自主变量，它们各自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分别发生变化，它们各自变化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利润率的波动。

中间环节理论也是曼德尔长波理论的方法论，曼德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波扩张期即资本主义世界平均利润率长期增长的解释，就是对中间环节理论的一种运用。不了解曼德尔的中间环节理论，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曼德尔的长波理论；反之，通过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也能更好地理解其中间环节理论。这将在第四章的第二节中进一步论及。

第四章 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与晚期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的长期增长

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平均利润率的长期增长，从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来看，晚期资本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一轮的长波扩张期。由此可见，曼德尔的长波理论并非外在于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而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毋宁说，正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长期增长的特征，才提出长波理论的。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对长波理论已有所论述，后来曼德尔对长波理论的专门论述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80年）一书，成为曼德尔仅次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名著。

第一节 曼德尔长波理论的主要观点

长波理论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更不是曼德尔所独创，对于长波理论的首创者是存在争议的。据曼德尔所说，长波理论的首创者与马克思主义不无关系，如帕尔瓦斯（Parvus）、考茨基、冯·盖尔德伦（Van. Geldere）和托洛斯基等人，而后才为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等理论经济学家所采纳的。^① 据马建堂在《长波理论模型评述》一文中所说，“最早发现长波的是英国的哈莱德·克拉克（Hyde Olarke），后来，俄国的帕尔瓦斯（Parvus）、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冯·盖尔德伦（Van. Geldere）也注意到了长期

^① [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页。

波动。苏联的康德拉季耶夫则赢得了以自己名字命名长波的殊荣。”^① 据许建康在《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一文中所说，长波理论最初是由帕尔瓦斯（Parvus）、冯·盖尔德伦（Van. Geldere）和考茨基提出的。^② 孟捷则认为冯·盖尔德伦第一次探讨了长波问题。^③ 对于研究长波理论的学者来说，虽然年代的划分不尽一致，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 50 年左右的长波，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大家理论立场的不同，对这种长波的解释就各自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了。马建堂文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把长波理论分为货币—价格长波理论、创新—长波理论和投资—长波理论三个大类，而每个大类中又包含着几个亚类。曼德尔的长波理论的特色则在于，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作出解释。

一 长波的关键指标与历史分期

曼德尔指出：“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关键指标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长波理论与当前其他纯学术理论相区别的首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学者拒绝接受经济史学家们在长波的分析中以价格和货币的变动为中心的观点。他们并不否认这些变动与对长波的判断有关，而且他们甚至承认货币现象的相对独立性。但是他们从下列假设开始，这个假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制度运动的基本规律是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源于商品的生产，价值及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它们的最终实现。因此长波的关键指标是有关商品的产量及商品销售的运动趋势。既然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经济波动的真实框架，那么似乎工业产量及世界出口的统计数据显然是两个关键指标。”^④ 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工业产量平均增长率的波动只能说明平均资本积累率和平均利润率的波动，

① 马建堂：《长波理论模型评述》，载《中州学刊》1990年第3期，第24页。

② 许建康：《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载《经济纵横》2009年第11期，第1页。

③ 孟捷：《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第26页。

④ [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9页。

因此，“任何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只能是一个资本积累理论，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思想，它是一个利润率理论。”^①

根据曼德尔对长波的历史分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共经历了四次长波：第一次是1793—1847年，其中1793—1825年为扩张期，1826—1847年为收缩期；第二次是1848—1893年，其中1848—1873年为扩张期，1874—1893年为收缩期；第三次是1894—1939年，其中1894—1913年为扩张期，1914—1939年为收缩期；第四次是1940年以后，其中1940—45^②—1966年为扩张期，1967年起为收缩期。扩张期以利润率的上升为主要特征，收缩期以利润率的停滞或下降为主要特征。

50年左右的长波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说的7—10年的经济周期是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每一次长波中的扩张期和每一次长波中的收缩期都包含着若干个经济周期，这也就意味着，在长波的扩张期中包含着经济周期中的衰退阶段，在长波的收缩期中也包含着经济周期中的繁荣阶段，因此，长波的扩张期和收缩期都不是绝对的。曼德尔指出，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与正常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对于了解经济周期的变动幅度是重要的。“在扩张性的长波中，复苏（upturn）、繁荣和景气阶段持续较长而且更加明显，衰退阶段却较短而且不那么严重。相反，在停滞性的长波中，复苏和繁荣阶段较短，较迟钝，更加不稳定，衰退阶段则持续较长并且较明显。但是在扩张性长波中，的确有衰退（即平均利润率的暂时下降）；同样在停滞性长波里，也有复苏及繁荣阶段（即平均利润率在衰退之后的高涨）。”^③ 沃伊廷斯基为德国经济发展中1874—1894年的收缩性长波和1895—1913年的扩张性长波提供的资料证实了这个关联。

二 长波扩张期发生并得以持续的原因

正如许建康所指出的，长波“第二个拐点”的发生学问题，即长波

^① [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页。

^② 北美自1940年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自1945—1948年起。

^③ [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页。

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的原因，是长波理论研究中各个学派争论的最大焦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要解释长波的收缩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作了详细的论述，但要解释长波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并在扩张期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提供对于平均利润率长期增长现象的现成说明。因此，建构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真正困难就集中在对长波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并得以持续的原因作出解释。

对此，曼德尔持长波两个拐点的“非对称说”：“我们坚持我们的资本主义发展长波中基本不对称节律的观念。在这长波中，走下坡（从扩张性长波进入萧条性长波的阶段）是内生的，而上升则不是，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能够引起平均利润率强大而稳定地上升。”^① 易言之，长波由扩张期转入收缩期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基本规律，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则是由于资本主义各个发展时期特殊的外在原因。在曼德尔对长波的历史分期中，长波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的情况共有三次，分别在1848年以后，1893年以后和1940（48）年以后，曼德尔对这三次转变的原因作了具体的解释。第一次：“1848年的革命和加州金矿区的发掘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突然的质的扩大。中欧与东欧的整个区域，中东和太平洋突然开放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市场。市场的巨大扩展（按比例来说，这可能是自从资本主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对广泛的工业化和新技术革命是很大的刺激。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中详叙的那样：从蒸汽机到蒸汽发动机的转变，从手工业业到固定资本的工业生产。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猛烈提高（即相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同样，资本周转率由于运输和电信革命（蒸汽轮船，电报以及在北美和西欧及中欧的铁路建设的增加）和信用及贸易革命（股份公司，大百货商店等）而剧烈地提高。所有这些变化足以说明利润率的强劲、急剧和持久的提高。”第二次：“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最终瓜分非洲、中东、东亚和中国，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殖民帝国的或者半

^① [比] 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3页。

殖民地的势力范围，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的质的增长，原材料的相对价格的下降）同样地说明了平均利润率在1893年之后（即从1873年持续到1893年的长期萧条的结束）的急剧上升。再次因为技术革命（电力），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的减慢，伴随着剩余价值率的增加，对平均利润率持久地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次：1840（48）年转折点的“关键因素是国际工人阶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遭受的历史性挫折（法西斯主义，战争和冷战以及在北美的麦卡锡时期）。”^①

以上的解释应当说是非常具体了，但曼德尔指出，为了更精确地阐释长波理论，还必须把另外两个因素——国际资本主义竞争的长期趋势和黄金生产的长期波动——引入分析。先来看国际资本主义竞争的长期趋势。根据曼德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霸权地位升降历史的扼要叙述，1848—1873年英国居相对霸权地位，1873—1893年英国的霸权地位下降，1893—1913年英国又居相对霸权地位，1914—1940年英国的霸权地位又下降，1940（48）—20世纪60年代美国居霸权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对下降。不难发现，这六个时间段恰对应于曼德尔对长波的历史分期中后三次长波的扩张期和收缩期，而且，有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居于霸权地位的时间段恰对应于三次长波的扩张期，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霸权地位下降的时间段恰对应于三次长波的收缩期。曼德尔认为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中没有一个居于比较稳固的霸权地位的国家相当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此时国际资本主义领导的总危机就会出现，不利于从国际层面上协力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问题，因此，“在1929—1932年大萧条期间及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试图促成任何形式的解决危机的国际‘方法’（甚至权宜之计）反应迟滞；至于1973年以来，国际资本协调也是同样的无力（虽然开了许多的‘首脑会议’）。”^②再来看黄金生产的长期波动。曼德尔指出，我们必须区分19世纪黄金产量的情况和20世纪黄金产量的情况，在19世纪由于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矿源，黄金价值的下降基本上是由

^① [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7—18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偶然因素所致，“只是在19世纪末期在德兰士瓦的兰德（Rand）金矿的发现之后，黄金矿业才变成资本主义的一个工业，它自己的运动法则是由资本积累的逻辑所决定的。”^①因此，在此之前的、19世纪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和德兰士瓦的矿源的发现所导致的黄金价值的下降→商品价格的上升→利润率的上升，显然不是由资本积累的逻辑所支配，而是偶然的外在原因所致，曼德尔以此进一步解释1848年以后和1893年以后长波两次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的原因。

我们可以发现，在以上我们所引的曼德尔对资本主义经济长波在1848年以后，1893年以后和1940（48）年以后三次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所作的具体分析中，不仅解释了这种转变的动力，而且也解释了转入扩张期后得以持续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技术革命是长波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后得以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主要原因。在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中，四次长波是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四次技术革命的：第一次是工业革命本身的长波；第二次是第一次技术革命的长波；第三次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长波；第四次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长波。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技术革命是长波进入扩张期的原因。其实这是倒因为果，实际上，正是进入扩张期以后利润率的增长才使技术革命的发生成为可能；技术革命不是长波进入扩张期的原因，而只是长波进入扩张期后得以持续的原因。“相对停滞的长波先于技术革命而发生，大规模的创新就不会出现，因为预期利润很低。精确地说由于这个原因，一旦利润率开始急剧地高涨，资本就会发现大量没有应用的或者只是稍有运用的发明，因此就有了物质财富以用于技术创新率的高涨。一项基础技术革命的发生，这本身就已经具有长久的期限。伴随着物质财富的是金融财富，上一时期表示了非生产性投资的新积累的资本巨大地增加（即货币资本储备），这增添了当前生产的和积累的剩余价值的猛烈增长，使得生产性资本积累（即生产性投资）的巨大增加成为可能。”^②每一次7—10年的正常的经济周期中周期性发生的

① [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5—26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投资不足则为长波扩张期中的技术革命创造了必要的储备资金：“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的’条件下，在一次七年或者十年周期的结尾所释放出来的那些价值，肯定地说，是足够用来取得比这次周期开始时所使用的越来越昂贵的机器的。但是，这些价值并不足以用来取得生产技术的基本的更新，特别是在第 I 部类中，在那里，这样一种更新，通常是与彻头彻尾的新的生产设备的创造关联在一起的。只有在几个连续的周期中为购买额外固定资本而释放出来的价值，才能够使积累过程发生这一类在质方面的飞跃。投资不足时期的周期性复发，完成了一种客观功能，就是释放出了为这一类技术革命所必需的资本。”^① 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②，于是一场总体性的技术革命便应运而生了。除此而外，曼德尔还分析了其他两种促使长波的扩张期得以持续的原因，一是长波扩张期的前半阶段，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率通常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工人实际工资缓慢增长的同时剩余价值率仍在不断增加；二是长波的扩张期往往将大批的劳动力从工业边缘区吸引到工业中心区，产业后备军的这种扩大对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造成了非常不利的条件。

根据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每一次的长波就是经历了以下这些过程：①危机，资本贬值；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这样一些特殊条件，在这些条件的联合作用下，平均利润率会有一次突然的显著上升，每一次 7—10 年的正常的经济周期中周期性发生的投资不足所创造出的储备资金便获得了进行大规模投资、系统地更新生产设备的动力；③这就会对生产技术的变革产生需求，而这种需求也确实能够促进技术革新的实现，并且，某些首先发生的技术革新必将产生连锁效应，从而使整体性的技术革命得以发生；④重新出现投资不足和呆滞资本，资本增值困难，平均利润率降低，下一轮的技术革命遇到阻碍；⑤长波的这一收缩期要到促使平均利润率上升的条件重新出现并且这些条件能够联合作用的情况下才发生变化。如此循环往复，形成长波扩张期与收缩期的不断交替。

曼德尔对资本主义经济长波在 1848 年以后，1893 年以后和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21 页。

1940 (48)年以后三次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所作的这种具体分析表明, 50年左右的长波是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后的产物, “‘长波’只有作为这些周期性波动的结果才是可信的, 它决不能作为加在这些波动之上的某种形而上学的附加物。”^①

三 运用中间环节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波扩张期发生原因的补充说明

在曼德尔所确定的六个部分独立的自主变量或中间环节中, 哪一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平均利润率的长期迅速增长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呢? 曼德尔指出, 是剩余价值率的发展。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剩余价值率的发展呢? 曼德尔指出, 是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的下降。^② 曼德尔以翔实的数据论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非正常条件下, 正是以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的下降为代价换来了剩余价值率的发展, 从而促成了利润率的迅速增加的, 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缓慢增长和剩余价值率继续不断发展并存的“繁荣”局面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的下降又是缘何所致呢? 曼德尔指出, 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阶级斗争的失败有关。一方面, “如果没有德国工人阶级在1933年决定性的失败, 那么德国帝国主义就永远不能从事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早期的加速扩张和侵略。”^③ 另一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剩余价值率的发展“首先是在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也就是说, 在工人阶级通过法西斯主义和战争遭受到悲惨失败的那些国家里; 然后是在美国, 在这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会上层官僚不罢工的誓言、战后工业战斗两年后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强加以及劳联—产联领导机器向‘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投向, 这些逐渐腐蚀了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只是在出现了下述情况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② 剩余价值率不是实际工资波动的线性函数,也就是说这两者未必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剩余价值率和实际工资同时增长的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但实际工资下降确实是促使剩余价值率增长的关键因素。

③ [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页。

之后，一个倒转的运动才开始变得明显：这时这个扩大长波的那个动力开始到达了劳动后备军的极限、‘劳动力市场’的条件最后转而对工人阶级有利，实际工资的明显提高开始压低剩余价值率。”^① 综上所述，是这样一种因果关系：阶级斗争失败→实际工资下降→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上升。剩余价值率作为部分独立的自主变量，受到阶级斗争等因素的影响，它作为中介把这种影响传递给利润率。或者说，阶级斗争等因素对利润率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要经过剩余价值这个部分独立自主变量或中间环节的缓冲、折射。其他部分独立自主变量或中间环节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各自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然后它们各自的变化也会相互作用，并最终决定利润率的波动。

第二节 对曼德尔长波理论的主要批评观点评析

一 几种主要的批评观点

曼德尔的研究者们普遍都对他提出的长波两个拐点的“非对称说”提出批评，认为曼德尔用经济以外的因素来解释长波的“第二个拐点”不是一种严格的经济学分析。马建堂在《长波理论模型评述》一文中指出：曼德尔“用内生因素来解释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由涨潮到落潮的转换，用外生因素来解释利润率的上升和由落潮向涨潮的转变……逻辑上的这一差异，实际上潜含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积累理论和利润率下降规律与现代长期波动不甚吻合，故曼德尔不得不借用外部的力量来暂时克服利润率的下降，以便经济活动能从低潮转入高潮。”^② 马建堂文此处不仅指出了曼德尔理论的“缺点”，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提出了质疑。肖磊和赵磊在《长期经济波动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缺乏对于导致利润率突然高涨的各种原因如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内生发生的研究”^③ 是曼德尔长波理论的问题之一。孟捷在《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述评》一文也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

② 马建堂：《长波理论模型评述》，载《中州学刊》1990年第3期，第27—28页。

③ 肖磊、赵磊：《长期经济波动理论研究述评》，载《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第24页。

认为曼德尔用以解释长波“第二个拐点”的那些“带有不同程度偶然性的历史因素，无法解释长波为什么一定具有内在的循环特征”，并在该文中转述了范·杜因对曼德尔的一个批评：“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以纯粹的内在经济机制来解释长波。”^①

以上的批评者一致认为曼德尔没有把分析限制在“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把一些经济以外的因素纳入了分析的视域，也就是嫌曼德尔的视域太宽了。但与此相反，唐正东的批评却是嫌曼德尔的视域太窄了，他认为曼德尔的视域尽管并非绝对地限于经济领域，但还是太窄了：“他太局限于生产过程的视域了。在他所列的‘中间环节’的几大要素中，绝大部分都是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要素，如总的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积累率、资本周转时间等，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书中论及‘经济之外的因素’时，也只是指‘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与收缩，资本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在曼德尔的理论视域中似乎并不存在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②

二 笔者对这些批评观点的看法

首先，长波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即“第二个拐点”）的现象不违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波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这一经济现象违背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不能够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得到说明。因为马克思紧接着论述了对平均利润率下降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马克思指出，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等都是会阻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因素；据此可以推论，如果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这些因素的力量特别强，并且联合作用，那么平均利润率在下降的趋势中出现某种反弹，即由下降转而上升，也是完全可能的，并不违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① 孟捷：《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第28页。

^② 唐正东：《在科学抽象与具体历史之间：方法论的视角》，载《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第145页。

在《晚期资本主义》论长波的一章中，曼德尔指出以下四种因素有可能使平均利润率发生一次突然的上升：一是由于资本进入一些新的地区或领域而使资本的有机构成降低；二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组织涣散或斗争失利而导致的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三是由原料价格的跌落而导致的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四是由于流通、分配等环节的改善而使资本的周转期缩短。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书中曼德尔也就此论述道：“剩余价值率的急剧上升，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率的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的突然加速，或者几个，或者所有这些因素中的某一组合就能够解释平均利润率的急剧上升。另外，马克思指出，阻止利润率下降趋势影响的诸力量中包括有大量剩余价值的增加和资本流入国家（我们应该加上：部门）。在这些国家或部门中，资本平均有机构成比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工业部门的要低得多。因此，人们可以在最抽象的理论层次之上得出一个结论：当几个或所有上面提到的五个因素同步发生作用，进而克服前面所承认的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时，就会出现平均利润率的突然急剧上升。这并不是意味着它们抵消了平均利润率的正常周期的上下波动（即，它们消除了正常的经济周期）。但这的确意味着只要相互抵消的力量比以前更加强烈地和用更同步的方式起作用，它们就可用作对周期性下降的制动器。”^①

其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纯粹的”经济领域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不可能撇开殖民扩张、阶级斗争、革命、战争等因素而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作出科学合理的说明。比如，工资的变化就要受到像阶级斗争这种“纯粹的”经济领域以外的因素的深刻影响，因而，利润率也就一定要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一般来说，产业后备军是工资波动的最主要的调节器，产业后备军膨胀时，工人之间为各自的被雇佣而展开的竞争会比较激烈，从而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于是原子化的工人相对于资方就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然而要注意到在产业后备军的变化与工人工资的变化之间还有一个中介，那就是阶级斗争，要考虑到阶级斗争的相对独立性。曼德尔指出：

^① [比] 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13页。

“如果工人阶级组织的战斗力很强，组织程度很高，那么，即使是由于严重失业而造成实际工资的降低，也只能是暂时的性质，并且会随着在此后工业状况上升中工资的迅速提高而重新又变好起来。……就长期而言，即使是日趋严重的失业或者普遍的失业，也不能自动地降低实际工资或者提高剩余价值率。”^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因此，阶级斗争的情况对于工资的影响是双重性的。在阶级斗争高涨的形势下，一方面，劳动力的价值会提高，也就是说，一些新的需要会列入“生活必需品”之列，这也就是劳动力价值中所包含的历史的和伦理的因素在扩大；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价格会高于其价值。于是，工资便会有双重性的提高。在阶级斗争低迷的形势下，一方面，劳动力的价值会降低，也就是说，资本家阶级可以使“生活必需品”的范畴缩小，使其只反映为工人生理上的界限；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价格会低于其价值。于是，工资便会有双重性的下降。

最后，曼德尔把中间环节限制在经济领域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如果承认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么晚期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率波动就应当能够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得到说明——它正是由一系列的经济项目及其基本规律所构成的。诚然，“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及收缩，资本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乃至唐正东所强调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资本主义经济都会发生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直接发生的，不是绕开那些经济项目及其基本规律而发生的，而是要经过以上所说的六个部分独立自主变量或中间环节的传达、缓冲与联合作用才发生的。

曼德尔的下述两段话最清楚地表明了限制在经济领域的中间环节与其他“外生”因素这两者在利润率决定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虽然（由长波的收缩期转入扩张期的）关键的转折点明显是由外生的非经济因素所引致的，但是它们只是启动了可被资本主义运动方式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说明的动态进程”^②；“一旦新长波开始，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即资本主义制度运动规律）必须而且必然控制事件的长远趋势，否认这一点就等于

^① [比]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② [比] 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9页。

否认这些运动规律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是起作用的。”^①总的说来，曼德尔既强调经济领域中的重要项目在长波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又不排除，且在自己的分析中相当程度上考虑了非经济因素对长波的间接作用。要求把对长波的解释限制在“纯粹的”经济领域之内，不考虑阶级斗争等外部因素的作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无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及其内在规律的基础性地位，对它们与各种外部因素一视同仁，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及其内在规律是理性抽象，曼德尔的部分独立自主变量就属这一层面。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外部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利润率的或者上升或者下降。把这一过程描述出来，就是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过程。曼德尔就是通过这个方法达到晚期资本主义的长波扩张期即利润率的长期增长这一理性具体的。

唐正东批评曼德尔说：“尽管他的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确也包含着对其必然走向社会经济危机的指认，但遗憾的是，这种指认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解释之间并不存在有价值的逻辑相通性。”^②然而，对曼德尔来说，对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解释与其必然走向社会经济危机的指认这两者之间的逻辑相通性就在于其长波理论。根据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长波的自然趋势是下摆，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外部环境下它才会上扬，而晚期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当这些特殊条件消失以后，长波又会遵循其自然趋势而下摆，当然并不排除使长波再次上扬的外部条件的出现。

① [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2页。

② 唐正东：《在科学抽象与具体历史之间：方法论的视角》，载《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第145页。

第五章 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 面貌与基本矛盾

第一节 部分有理性与整体无理性之间 矛盾的激化与国家力量的增强

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技术革新常态化的时代，技术革新加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由技术革新常态化导致的固定资本周转期缩短大大加强了公司计划的必要性。如果固定资本每十年更新一次，那么每年只负担 10% 的价值摊提，即便其中哪一年不能兑现这 10%，问题也不大，只要其他九年的摊提负担各增加 1.1%，即由原来的 10% 增加到 11.1% 便可以了，而这是容易办到的；然而，如果固定资本不是每十年更新一次，而是每五年更新一次，那么每年须负担 20% 的价值摊提，要是哪一年不能兑现这 20%，其余四年的摊提负担将各增加 5%，即增加到 25%，而这在正常情况下是很难办到的；如果固定资本的周转期只有三年的话，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可见，固定资本的周转期愈是缩短，就愈要求按计划兑现当年度的摊提负担，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会产生出一种向计划摊提发展的强制性。此外，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公司更着眼于长期利润，这一点也对计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在一种整体无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公司内部的计划必然要遇到外部的限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早就指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①到了晚期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7 页。

时期，公司内部计划的压力增大了，公司内部的组织性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无理性仍对其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一矛盾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更为激化。曼德尔指出：“部分有理性和整体无理性之间的这一矛盾，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达到了它的极点，这一矛盾是理解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①

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无理性，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必须增强，发挥好“理想的总资本家”的作用。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到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再到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经历了由弱而强的过程。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是弱国家。资产阶级国家虽然是封建的专制主义强国家的直接产物，但却是作为对后者的一种否定而产生出来的。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倾向于将国家的各类开支减至必不可少的程度以内，在他们看来，为建立国家的法律、军队和各种制度所需的花费，是浪费了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因此必须减少至最低限度。

到了古典帝国主义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资产阶级国家由弱而强。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对殖民地的掠夺瓜分和军火经济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国家需要较强。第二，为了对付工人阶级政党大量加入资产阶级议会的状况，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权力也须日益集中。第三，古典帝国主义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社会立法的扩大，“社会立法的扩大倾向对于社会创造价值在公共预算中的有意义的再分配，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公共预算不得不吸收越来越份额越大的社会收入以便扩大了规模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一个适宜的物质基础。”^②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的功能进一步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总生产条件”领域的扩大。“那是晚期资本主义三个主要特征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技术革新的加速以及由于第三次技术革命资本积累主要规划费用的大量增长，以及在所需庞大数量资本的增值中，任何迟延或失败的冒险性的相应的增长。

^① [比]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页。

^② 同上书，第568页。

这些压力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倾向，不但倾向于国家经济计划的增长，而且也倾向于在生产过程数目的稳步增长中国家冒险费用和损失的社会化的增长。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将更多的生产部门或再生产部门联合到国家所资助的‘总生产条件’中。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费用的社会化，那么，这些部门就会根本不能够满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需要。”^① 这既包括“越来越多地应用国家预算来包括研究和发展费用”，也包括以各种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帮助私有部门克服资本增值的困难，向它们提供更多的补助和有保障的利润。第二，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调整货币、信贷、投资、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第三，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越来越倾向于爆炸性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为了对付各方面的危机，资产阶级国家也须更强，处理危机所需的花费也越来越多。第四，持久的军火经济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能在一定限度内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第 I、II 部类的积累也有一定的刺激效果，因而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缓解矛盾的一种方式。

资产阶级国家由弱而强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激化的体现，它对破坏性手段的生产的依赖本身表明了它的病入膏肓。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各种干预企图在资本主义的限度以内超越资本，注定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能使矛盾在不断积累之后在更大的程度上爆发出来。

第二节 科技、脑力劳动的异化与技术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

一 科技的完全异化

曼德尔指出，虽然科技与资本的相互作用早已有之，但是，科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不断地、平稳地拴在一起”、“扎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中”^②，即科学直接地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了特定条件以后的产物，这些条件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开始形成，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才发展而成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69 页。

② 同上书，第 289 页。

的。至此，科学完全为资本服务，科学研究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分支部门，其目的就是使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增加到最大限度。科学研究成了资本的众多投资领域之一，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向科研部门，投资于科研部门同投资于其他部门一样按平均利润率，甚至按更高的利润率获得利润。因而，科技与资本的关系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发生了一种质变，这种质变意味着科技已完全为资本所异化。

二 自动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

虽然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自动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全面的自动化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必然要受阻，使科技的潜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为自动化的发展将导致资本增值的危机：“由于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资本有机组成一天天提高和生产劳动者每人每小时工作总量的开始下降，实际工资最终要想继续大大增长而与此同时又能维持剩余价值额不变，那是不可能的。这两个量之中的一个将会缩减。由于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法西斯主义战争的情况下，实际工资的显著降低是可以排除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资本增值的历史危机，并且，首先是在剩余价值额方面，然后在剩余价值率方面，出现了不可避免的下落，因而接踵而来的是平均利润率的暴跌。”^① 据此，曼德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内在极限既不在于罗莎·卢森堡所说的“资本主义完全深入了世界市场”，也不在于格罗斯曼所说的“已积累资本总额增值的最终不可能”，而在于：“在机械化自动化进程的最后阶段，活的劳动力从生产过程中消除造成的一种结果，是使剩余价值额本身必然要缩减。”^② 也就是说，自动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将越来越威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这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不可能实现普遍自动化的根源。资本家为了避免自动化的进一步发展对自身利益带来的损失，必然采取种种措施对自动化日渐普及的客观趋势进行抵制，包括“在半自动化工业分支部门中使用廉价的劳动力（例如在纺织厂、食品和饮料工业中使用妇女和学徒），这种廉价劳动力会给引进充分自动化的综合企业制造困难；在自动化机械综合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

^② 同上书，第234页。

企业的生产中的不断变化和互相竞争，这种变化和竞争将阻止这些综合企业的廉价化，因而阻止这些综合企业较快地进一步引进工业的其他分支部门；不断地寻求新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最初是在非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的企业中生产出来的，等等。”^①

此外，就已经发展的自动化而言——就如曾经机器的发展一样，也非但没有减轻人的劳动负担，反而加重了劳动的异化性质。曼德尔指出：“一方面，它代表了物质生产力的完善的发展，这种生产力本身就具有把人类从强制操作机械的、重复的、单调的和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潜在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也代表对职业和收入的一种新的威胁，一种新的、强化了了的焦虑、不安全感、回复到长期大规模失业之感、消费和收入周期性丧失之感以及精神上和道德上贫困化之感。资本主义的自动化作为劳动生产力和商品与资本那异化的、有破坏性的力量，就这样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天矛盾的客观化了的精髓。”^②

三 科技日益增大的负面效应

科技施放出何种效应取决于它在何种社会制度下被应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的负面效应不可能得到遏制，因为这是科技服务于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科技施放出的负面效应日益超出其正面效应，越来越将人类的生存置于危险的境地。曼德尔指出，除了全面实现自动化的受阻以外，“晚期资本主义天生带来的最坏的浪费形式，是错误地使用了现有物质和人类的生产力；这些并没有用来发展自由的男子和妇女的福利，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于无用的、有害的事物的生产。”^③这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军火经济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当然，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除了军火经济以外，其他的破坏性手段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科技日益增大的负面效应是一个重要征兆，预示了晚期资本主义在遇到其经济方面的界限以前很可能首先遭遇其他方面的界限。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② 同上书，第243页。

③ 同上。

一方面是科技的潜在解放力量，以及社会和个人对于科技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科技完全为利润所绑架的现实——这两者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一对尖锐矛盾。曼德尔指出，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社会财富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科技领域的特殊表现，只有打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以后，科技的潜在解放力量才能转变为直接的解放力量。

根据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还在增长的事实就得出资本主义潜力未尽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并没有表明过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一定表现为生产力的绝对下降或经济的负增长，相反地，列宁还指出过资本主义“没有绝对无望的处境”。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虽然生产力仍在发展，经济仍在增长，但生产关系却已然成了生产力的桎梏。我们以上所论述的全面实现自动化的受阻，生产力的巨大潜能被束缚，科技施放出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于其正面效应，晚期资本主义在遇到其经济方面的界限以前将首先遭遇其他方面的界限，等等，都表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关系已然成了生产力的桎梏。

四 脑力劳动和高等教育的异化

与科技异化紧密关联的，是脑力劳动以及致力于培养脑力劳动者的高等教育的异化。它们都是为资本的增值服务的，都是资本逻辑中的一个环节，与科技一样不可能逃脱为资本所异化的命运。“资本所需要的，并不是大量的高级智力劳动者。资本所需要的是越来越多但数量又有限的智力生产者，这些智力生产者具有特殊的资历，并在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中有特殊的任务来完成。科学的积累性发展越大，研究和发展工作加速的程度越快，那么，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劳动分工的增长过程、私人利益的合理化和特殊化——换句话说，劳动的持续不断的分裂——也就越是深入到智力劳动和科学教育中去。”^① 随着资本统治的扩大，智力活动被日益卷入为了资本利益的劳动社会分工，异化劳动的范围从体力劳动扩展至脑力劳动。高等教育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大学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培养‘受过教育的’有判断能力和有产者——这一理想是适应自由竞争时期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

资本主义的需要的——而是为了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而培养智力方面有技术的靠工资维持生活的那种人。”^① 晚期资本主义还设法制造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景，使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自以为自由地走入科技分工的狭隘囚笼中去，以为自己可以自由创造、自由思考而“高人一等”，其实不过与其他的众多劳动者一样从事着异化劳动之一种罢了。

五 专家治国论与技术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

与科技、脑力劳动的异化相对应的，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专家治国论和技术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各种问题是孤立的，而非与社会基本矛盾有关，因而问题的解决也就应诉诸各领域的技术和作为技术之载体的专家，而非社会制度的改变；技术和专家具有独立于任何阶级和价值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他们的发展将使一切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从而使我们进入一个理想的社会。一言以蔽之，“深信技术的无限威力，这是晚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形式。”^② 然而，技术理性的局限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四点。第一，如上文所述，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科技的负面效应日益增大，明眼人越来越不难发现技术和专家正在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灾难。第二，与技术理性的胜利相伴而来的是“非理性主义的传播和向迷信、神秘主义和厌世思想等方面的倒退现象”和“粗糙的新达尔文主义”、“深刻的文化和文明的悲观主义”。^③ 的确，这是一个有史以来科学最为昌明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神秘主义沉渣泛起、封建迷信谬种流传、邪教组织甚嚣尘上、伪大师伪专家大行其道、物欲横流、人欲泛滥的时代。这本身表明了这种理性的异化性质，就好比一个硬币之两面，一面理性得如同机器，另一面非理性得如同禽兽，唯独找不到人性。第三，技术理性在经济领域表现为部分有理性与整体无理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军火经济中得到了最显著的体现，在军火经济中，精确计算的手段只是为了服务于对人类的群体性屠杀这样一个极端非理性的目的。第四，对技术的盲崇导致了人们批判意识的削弱，曼德尔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

② 同上书，第592页。

③ 同上书，第596页。

指出，这造就了广大群众对于法西斯主义唯命是从的心理沃土。

除此之外，还有为曼德尔所低估的一点，这就是技术理性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负面作用。曼德尔认为，科技的发展有利于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解放出来，从而成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来源，这是科技的潜在的解放力量的表现之一。然而，技术理性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负面作用大概是要远大于其正面作用的，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早就深刻地论述过科技会削弱人们的批判意识，使人适应于生活现状从而阻碍生活发生质变，刘英杰的《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一文进而指出，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相比，“科技意识形态已经内化到人们的性格、本能结构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这种控制是潜移默化的、隐藏的，然而又是最彻底的、无孔不入的”^①。这一点也在近几十年的现实中得到了印证。

第三节 消费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所谓的消费社会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另外两个矛盾，其一，是前文中论述过的部分有理性与整体无理性之间的矛盾；其二，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这两个矛盾也就不能根除。所谓的消费社会就与这两个矛盾中的后者有关。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很长时间内是通过地域上的拓展，即不断开辟新的消费市场来缓解这一矛盾的。——当然，也仅仅是“缓解”而已，因为正如曼德尔所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发展成为“在国际范围内劳动客观的社会主义化的日益严重”与“在资本越来越国际集中的条件下的私人占有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坚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即

^① 刘英杰：《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第54页。

“劳动的国际社会主义化与国内财产竞争和资本的国家体系之间的矛盾”。^①除了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开辟新的消费市场以外，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的增加，从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范围的扩展，也部分地缓解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相对不足这对矛盾。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认为，工资不仅包括生理的因素，也包括历史的和伦理的因素，而后者具有较大的变化幅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资本逐渐遇到其空间扩展的界限，即不再能通过新的消费地域的开辟来缓解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时，所谓的消费社会愈来愈成为缓解这一矛盾的主要机制。

曼德尔指出要看到这种消费社会的两面性：一方面，工人阶级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范围的扩展，是资本文明面的结果和表现，为人的真正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因而具有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不能不是异化的，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对人的需求体系的全面扭曲，消费社会对于工人阶级的腐蚀、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异化，越来越超出其积极意义。

同资本的地域扩展一样，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部分地缓解，但不能解决上述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做不到的是，使这种消费以与劳动生产力相同的速率来增长。使资本增值和积累资本的强制力——换句话说就是竞争和生产手段的私有——迫使它作不到这一点。”^②于是，同样的困难便又会呈现：“如果在长期中，消费在价值方面的发展较在生产力方面为缓慢……那么，包含在消费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③为了突破这个限制，广告和市场营销，以及消费者信贷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得到了特别的发展。

消费者信贷与资本主义公司的生产信贷构成了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与军火经济等原因一起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持久性的通货膨胀。持久性通货膨胀成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缓和矛盾的常态化机制，但不消说它终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7页。

② 同上书，第462页。

③ 同上书，第462—463页。

要遇到不可逾越的限制，其结果就是经济或金融危机。此外，广告和市场研究所服务的欲望再生产使人动物化、欲望化，导致了人性的危机。

除《晚期资本主义》一书外，曼德尔在诸多论文中不厌其详地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表现出的毁灭性力量，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灾难和威胁正在不断危及人类生存的底线。在《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一文（1992年）中，除了核设施、生化武器、环境危机等威胁外，曼德尔所举出的饥荒、失业、暴政方面的数据也是触目惊心的：“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第三世界每年有1600万儿童死于饥饿和可医治的疾病。这就是说，每五年的死亡人数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死亡人数一样多。（相当于）每五年（发生）一次针对第三世界儿童的世界大战。这就是某些社会主义者所极力赞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际运行的结果。在最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里，50%的男女居民食物摄入量下降到了这样的水准：自经济萧条开始以来每天大约1700大卡热量。这是1940年以前，即真正的灭绝集中营出现以前，纳粹集中营的令人营养不良的水准。第四种威胁在一部分大城市的居民看来已是明显的事实。……在美国的年轻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中失业率已高达40%以上，与这种社会倒退相伴随的贫困、绝望、堕落等一系列伴生现象已经在发展。此外我们还要想到，民主的自由权利在帝国主义宗主国逐渐被剥夺，与其在第三世界不断受到损害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据大赦国际^①统计，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存在着程序化的，甚至是由官方进行的刑讯拷打。”^②

因此，寄希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解决上述问题，无异于白日做梦，“这种信念指向毁灭。”也不要指望资本主义会在经济危机中自动地“寿终正寝”，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温床。资本主义经济也许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终于走向崩溃，但社会主义却不会自动到来，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后自动到来的只能是野蛮主义，社会主义要靠人类主动去争取。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在资本主义触及经济上的界限以前，早已触及了其他方

^① 大赦国际1961年5月28日成立于伦敦，其宗旨是“动员公众舆论，促使国际机构保障人权宣言中提出的言论和宗教自由”，“致力于为释放由于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以及给他们的家庭发放救济等方面的工作。”——百度百科

^② [比]曼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王学东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面的界限，此时所面临的可能是野蛮主义，也可能是比野蛮主义更糟的人类灭亡。因此，曼德尔指出，“昨天的抉择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而今天的抉择简直就是‘社会主义还是死亡’”；^①这绝非耸人听闻之语。唯一的活路就是把资本主义不留余地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推翻，而这只有革命，而非任何温情脉脉的方式，才能达到。因而，问题不是要不要革命，而只是革命的时机问题。敢不敢于承认这一点，恐怕是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对曼德尔来说，离开了革命实践的理论研究是不值一顾的，忘却了革命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嘲讽。

^① [比] 曼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王学东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第六章 晚期资本主义与新殖民主义

本章的内容是对上一章内容即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面貌与基本矛盾的延续，区别仅在于本章是从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节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经济结构

一 资本积累两种形式的关系的演变

马克思论述过资本积累的两种形式：“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作资本积累”^①，——这是在已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成的资本积累；“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②，——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倾向于把这两种资本积累的形式看作一种历时性的发展过程，而曼德尔则侧重于强调它们也是一种共时性的结构关系。曼德尔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在整个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积累，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连续状态，而且（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发生的事。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一直到现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总是与通过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的那种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同时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② 同上书，第260页。

存的。”^① 因为从整个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已确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着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成的资本积累，有的国家则仍处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而这两者又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结在一个整体中。因此，对一个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考察不能把视域局限在一国之内，而是要注意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接合起来的一种体系，这些生产关系是被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把它们互相连接在一起，并受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控制”^② 的，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考察要注意到其他已确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资本积累对它所造成的影响。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成的资本积累只限于西欧和北美少数的几个国家，同时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此时，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在大不列颠、法国和比利时的资本积累的规模，不足以使这种资本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一些工厂”；“第二个障碍是运输手段的不足”^③，即便在欧洲也还未能形成统一的市场。于是，大不列颠、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把资本集中地投于外国的铁路建设，但是从投资铁路建设到铁路的建成、世界范围交通网的发展乃至统一市场的形成之间也还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对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那些国家而言是一段“黄金时期”，“它们是处在本乡本土资本原始积累的毫无限制的状态中”，“正是当地的资本使得其内部市场稳步发展，原始积累顺利进行”^④，而过了这段“黄金时期”才开始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国家显然就不会再有这种幸运了。

到了古典帝国主义时期，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些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要受制于已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资本积累了，这就决定了此时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不再能以一种正常的方式完成，而是要经受扭曲以服从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需要，因此，这些国家将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② 同上书，第49页。

③ 同上书，第50—51页。

④ 同上书，第51—52页。

长久地沦为后来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而难有出头之日。究其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家之间的“连接关系”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是轰击不发达国家的那种廉价商品的‘轻型炮弹’，而是控制资本资源的‘重型炮弹’了。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与当地寡头政治之间出现了一种长期的、社会的、政治的联合，这种联合……阻碍了这个国家的渐趋工业化”。^①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是通过以下三点扭曲了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它借日趋严重的‘资金外流’之机，把该地现有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源给吸收了。……这很明显地使得有利于民族资本积累的资源大大地缩减了；第二，它使这样一些部门发展起来：对外贸易、帝国主义的经办机构、土地和不动产建造的投机、高利贷、流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服务’机构”等等，而这些属于“不发达的发展”或“依赖性发展”；第三点，它限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方法是加强旧统治阶级在乡村的地位、使乡村人口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保持在实际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的领域之外。”^②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如果说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还只是量的差异，那么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则转变成质的差异了，这些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输在起跑线上，而且又失去了正常的成长机会，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世界经济结构又经历了一次质变。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造反运动增加了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投资的风险，而且，帝国主义国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工业分支部门，因此，与古典帝国主义时期相比，这时帝国主义的投资主要已不是投向第三世界国家，而是投向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二，帝国主义国家宁可以先进的工业方法生产原料而不再愿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来生产原料了，同时，在这些落后的国家生产制成品却可以获得垄断利润。第三，1929—1933年危机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由原来的消费品方面转到了生产设备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也由于使用帝国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56页。

② 同上书，第54—55页。

主义国家售出的机器而进行着初步的工业化。世界经济结构的这种改变是不是意味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压制有所缓和了呢？“完全不是。它只不过是意味着发达和不发达这种并列形式的一种变化，更确切地说就是：新的、不同水平的资本积累、生产力和剩余压榨正在出现，这些尽管并不属于同样的性质，但与‘古典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那些相比，它们是更为明显的；”^①“它再现了甚至加强了帝国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生产力、收入和繁荣等方面的区别。”^②从曼德尔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三方面的表现：第一，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已不是源于本国的资本输出，而是源于在第三世界国家已获的投资利润，以此循环往复，吸收第三世界国家农业中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价格较帝国主义国家低得多，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较高的世界平均利润率水平；第三，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原料的需求越来越大，但这些原料的价值和价格却相对走低。

至此，我们可以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资本积累对其他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影响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古典帝国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这三个阶段所经历的演变作一个简要的概括。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前者尚没有能力对后者施加显著的影响，因此首先确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几个国家并不能阻止随后一批国家的资本主义进程且后来居上，相反地，那几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古典帝国主义之后却或多或少地“没落”了。从古典帝国主义时期起前者对后者发生严重的影响以至于第三世界国家不再能或至少很难跻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它们由于错失了原始积累的“黄金时期”而长久地成为“落后”与“苦难”的代名词。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影响仍在扩大、加深，第三世界国家虽或迟或快地步入了工业化的进程，但这却是以从一开始就扭曲其工业化体系以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为代价的，加上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剥削机制和剥削手段，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可谓旧病未除又添新愁。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66页。

二 资本国际集中的发展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际结构的三种可能模式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国际资本相对稳定。除了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此时已确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资本积累规模尚不足以对外输出和统一的市场尚未形成外，也因为，“在那时国内市场对资本积累的扩大，还没有实际的限制，而且，在前帝国主义时期，国内资本投资的安全性，较之在国外投资要大得多，以致在国外任何利润率的差异，都被周围环境的没把握性所抵消掉了。”^①

到了古典帝国主义时期，资本积聚越来越国际化。这是由资本主义矛盾的日益发展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本国之内无法克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剧了这一矛盾，因此，只能在国际范围内才能使这一矛盾有所缓和。但是，“资本的国际积聚主要没有采用资本的国际集中的形式，而是采取了有裂纹的、国家的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的形式，这些垄断集团在商品、原料和资本的国际市场上作为互相反对的敌手而斗争着。只是在极为稀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真正的国际资本融合在一起。古典的垄断只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进行合并，而在国际范围内，它就满足于暂时的协议（国际卡特尔等等）”，而且这种协议还时有遭到破坏，“因为这种协议最终顶不住国际方面的经济危机、工商业衰退和战争，或顶不住由不平衡发展规律所确定的资本主义各种势力之间关系的改变。”^②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国际积聚开始发展成为资本的国际集中……多国公司成了大资本有决定意义的组织形式。”^③促成这一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第三次技术革命所释放出来的那些生产力的新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种高度，在这一程度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利可图的生产，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已经是不可能的了”^④，——也就是说，只有面向世界市场，才能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第二，“既然垄断资本消灭价格竞争是很典型的，那么，销售和产量的增长，在国内就变得越来越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页。

② 同上书，第366页。

③ 同上书，第368页。

④ 同上。

受限制了。其结果也是急需一个大的公司扩大到国内市场之外，以便为它们的产品取得出路。”^① 这清楚地表明，跨国公司的发展为的是缓解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因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加剧的资本主义国内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第三，由技术革新而获得的超额利润或技术租金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超额利润的最主要形式，对这种由技术革新而获得的超额利润或技术租金的追求导致对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过程的追求，而“这种新产品和新生产过程包括固有的对资本扩大的冒险，因为研究和发展需要大量的费用，而且，新产品和新生产过程还要求对新制造出来的商品有最大限度的产和销。”^② 这一情况也促进了资本国际集中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浪潮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输出有所阻碍，这些被阻挡、从而徘徊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过剩资本也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第五，跨国公司可以有效地克服或避免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所设置的各种限制。第六，对资本的专业化控制的要求，鼓励资本的国际集中，因为“资本的国际集中就意味着对原属不同国家来源和不同国家控制的资本的集中指挥。”^③

以上的论述表明，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到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由局限在本国之内到资本的国际积聚，由资本的国际积聚到资本的国际集中；到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国际集中臻于极致。

曼德尔认为，资本的国际集中可以采用两种形式：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有主的大公司和大企业，可以在单一的帝国主义阶级的控制之下”，②“有不同国家所有主的大公司大企业，可以互相交织在一个国际公司内部，而控制权不必落入任何单一势力所有主的手里”。^④

在此基础上，曼德尔分析了资本的国际集中可能导致的三种发展趋势。①“资本的国际集中也许会伴之以一个单一国家势力在国际方面的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9页。

② 同上书，第370页。

③ 同上书，第374页。

④ 同上。

扩大。”^① 这种情况对应于以上所说的资本的国际集中可以采用的两种形式中的前者。^② “资本的国际集中也可以伴随着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力量的逐渐解除，并伴随着一种新的、联合的、超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势力的兴起。”^② 这种情况对应于以上所说的资本的国际集中可以采用的两种形式中的后者。^③ “国际资本集中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可能的变体是前者相对地说无视后者。”^③ 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对其民族国家的利益有所漠视。这种情况是以上两种情况的“居中体”。

进而，曼德尔推导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际结构的三种可能模式，这三种可能模式与以上所说的资本的国际集中可能导致的三种发展趋势一一对应。第一种是超帝国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单一的帝国主义势力具有这样一种霸主地位，以致其他各种帝国主义势力都丧失了其真正的独立性，并且落到了半殖民地小股势力的地位。”这对应于以上所说的资本的国际集中可能导致的三种发展趋势之①。第二种是持续的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尽管资本的国际融合已经发展到足以用较少数目的帝国主义超级势力以取代较大数目的、独立的、大的帝国主义势力，但是，资本不平衡发展的反作用阻止而不能形成一个资本利益的真正的、全球性的共同体。”^④ 这对应于以上所说的资本的国际集中可能导致的三种发展趋势之②。第三种模式是极端帝国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国际资本融合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不同国籍的资本所有主之间的一切经济利益的实际差别，都消失了。所有主要的资本家都已经将他们的资本所有、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实现和资本积累（新的投资）加以扩大，非常平稳地扩大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致他们对于任何国家的特殊局面、阶级斗争的特殊情况、政治发展的‘民族’特点等等，一概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对应于以上所说的资本的国际集中可能导致的三种发展趋势之③。

考茨基曾预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会达成一种“极端帝国主义的谅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79页。

④ 同上书，第381—383页。

解”，帝国主义的矛盾会逐渐削弱。曼德尔所提出的第三种可能模式，即极端帝国主义模式，似乎与此有所相似。然而，这种相似纯粹是表面的，因为曼德尔对帝国主义矛盾的判断与考茨基刚好相反，曼德尔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都加强了”，正由于此，“一定会在某些帝国主义势力的觉醒中，给它带来一种合并的倾向。这些帝国主义势力已经不再能继续进行竞争性的斗争了。”^①对帝国主义矛盾发展的趋势判断不同，决定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态度的区别：考茨基的分析导向改良，曼德尔的分析则导向革命。

曼德尔在作出这些分析之后，指出现实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模式，即持续的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模式，表现为世界由单极向多极的发展趋势，以及几大强国或国家联盟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曼德尔的这一预计已为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国际格局的发展态势所证实。

第二节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超额利润与不等价交换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非资本主义国家尚不构成首先确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超额利润的主要源泉，原因包括：①首先确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资本积累规模尚不足以对外输出，②统一的市场尚未形成，③在资本主义国内投资更具安全性，④非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尚不存在显著的利润率差异，等等。

然而，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阻止利润率发生国际性差异或者将这种差异限制在最低限度内的、“导使资本趋向于国际基本稳定（或者使资本的运动主要局限于欧洲）的那些同样的因素，从19世纪70年代起（即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起——引者注），开始有了相反的影响……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以大规模形式出现的向不发达国家的迅速资本输出，就成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②帝国主义时期，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利润率差异的原因包括：①殖民地国家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②殖民地国家绝对剩余价值率高、劳动力价值低、平均剩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页。

② 同上书，第86—87页。

余价值率高，③殖民地国家劳动力价格低于其价值，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社会功能中有一部分直接费用必须由宗主国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中加以资助，因而也就相应地降低了生产性资本的平均利润，殖民主义制度将这一部分直接费用转换成了殖民地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的剩余生产（本地各社会阶级的收入，比如大的土地所有主、农民、工匠和商人等）。例如地方赋税就包括了殖民地行政管理费用和某些基础工程的费用。这就使得生产性投资资本的纯利润率有可能常有相当的增长。”①

马克思在论述“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时指出：“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实现这种平均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的各种条件也发展了，它使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全部社会前提从属于它的特殊性质和它的内在规律。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会进行得更快：1. 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 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产生的垄断；其次，信用制度的发展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而不再留在各个资本家手里；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最后这一点，在我们假定一切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数量众多的非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间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种平等化本身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② 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表明，在一国范围内利润率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平均化，取决于资本主义在该国的发展程度。曼德尔进而把这一原理推广到国际范围内，指出：“阻碍了利润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均等化的那些障碍，在国际范围内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化结合，所有这些都是从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以来使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446页。

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利润水平能够发生差异的因素，都是使得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本投资成为剩余利润的永久性源泉的因素。”^①然而，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这种发展水平的差异又是如何造成的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把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给普遍化了，但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给普遍化。更加抽象一点说：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各种表现可以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共性的缺乏来加以解释。”^②再追根究底地问一步，这种所谓“共性的缺乏”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源出于资本积累本身的不平衡的运动。……即使是在同样开端这样的‘理想情势’之下，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扩大的再生产以及资本积累仍然与发达和不发达的并列和永远结合是同义的。资本积累本身就产生发达和不发达，作为资本那不平衡结合运动的一些互相决定的因素。资本主义经济之缺乏共性，是资本主义本身运动规律发展的必然产物。”^③至此，曼德尔已揭明问题的实质：只要有资本存在，就会产生出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从而导致利润率的非平均化，这便是超额利润的根源。

然而，既然只要有资本存在，就会产生出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导致利润率的非平均化，形成超额利润的根源，那么这种情况也就不会仅限于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而是会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国家中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工业分支之间。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和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情况作一个相对的区分的话就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其重心是放在发达和不发达在地区方面的并存上。在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其重心放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与不发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方面的并存上。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其重心放在发达部门和不发达部门在工业方面的并存上”^④；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不发达的地区，也就不可能有剩余转化到工业化地区去，因而那里也就没有资本积累的加速。如果没有不发达国家的存在，在整个这个历史时期之中，就决不可能有剩余转化到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有资本积累的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89—90页。

③ 同上书，第90页。

④ 同上书，第106页。

加速。如果没有不发达的工业分枝的存在的话，也不会有剩余转化到所谓发达的部门中去，而且在过去这二十五年中，也不会有相应的资本积累的加速。”^①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落后的地区和国家已不构成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的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取而代之的，是落后的部门和企业构成了先进的部门 and 企业的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正如前文中所说的，由技术革新而获得的超额利润或技术租金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超额利润的最主要形式。曼德尔指出：“在资本有机组成不断增长和新工艺新技术不停发展的‘纯粹的’情势下——这是马克思早已预见到但直到今日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才以充分发展了的形式出现——利润水平的差异，源出于资本的竞争和对所有的公司、分枝机构和地区的无情的谴责，这些公司、分枝机构和地区在这次竞赛中落后了，因而不得不把它们‘自己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输送给那些领先者。”^② 从此也可见，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远非仅仅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而是同时存在于发达国家的内部和统治阶级的内部，哪里有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哪里就有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发生，而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在资本主义所涉足之处是总会存在并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至此，资本主义的不可改易的剥削和掠夺本性已发展至于极致并暴露无遗。

以下我们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和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三个阶段超额利润的来源情况作一简要的梳理和小结，以使线索更加清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指出利润率的平均化只是一种趋势，即便在发展得最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的平均化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相反地，客观存在的是利润率的非平均化，它存在于较不发达的地区与较发达的地区之间，较不发达的国家与较发达的国家之间，较不发达的工业分支与较发达的工业分支之间，等等，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会把各领域中发达程度的这种差异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便是超额利润的根源。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利润率差异总的来说并不显著，而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② 同上书，第90页。

且此时已确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尚不能够把较多的剩余资本投向其他国家——这一点可结合我们在上一节中论述过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对其他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影响的有限性来理解，因此，此时非资本主义国家尚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而到了帝国主义时期，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质的变化，超额利润的来源情况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普遍而显著地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超额利润的来源。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落后的部门和企业向先进的部门和企业转移的超额利润，取代了落后的地区和国家向发达的地区和国家转移的超额利润，构成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超额利润的情况就不存在了，事实上，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超额利润的来源渠道是更加多元化了，而且这些多元化的渠道是相互交织缠绕在一起的，因此曼德尔结论性地指出：“对农业地区的剥削、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和对技术不发达的生产分支的剥削，并不仅仅是互相连续作为剩余利润的主要来源的，而且，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个方面中的每个方面也都肩并肩地共存着。阐明这些结合，对了解晚期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①

除了超额利润以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一种剥削机制，那就是不等价交换。相对而言，在古典帝国主义时期，超额利润是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的剥削形式，不等价交换则是次要的剥削形式；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不等价交换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的剥削形式，超额利润则成了次要的形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剥削机制的变化，需结合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考察，曼德尔认为，这一变化是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输出的主流已不再是从宗主国家输往殖民地去，而是在宗主国本身之间了。在不发达的国家，外国投资的重点已经从纯粹的原料生产变为消费品的制造。当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已经使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引进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专门设计来使利润和股息向宗主国转移更加困难的。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企图提高这些工人和贫苦农民所生产出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

来的剩余价值的比例，这种剩余价值的增长完全是为他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帝国主义的公司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这种企图并不是没有取得成功。……多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帝国主义内部重点的转向机器、设备和车辆的输出，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①。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机制的这种变化，决不意味着剥削的减轻，而是意味着剥削手段的多样化。

不等价交换的实质是什么呢？曼德尔指出：“不等价交换存在于3亿工作小时的产品与12亿工作小时的产品交换中”^②，也就是说，不等价交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较少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与第三世界国家较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相交换；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劳动强度下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能比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较多的报酬。凭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在世界市场上，发达国家的工作小时较之落后国家的工作小时更为集中并具有更大的生产能力”^③；因为，“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被认为优于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而其生产的价值也就较多一些。或者换个说法也一样，在一个国家市场内的情况是这样，不太强和生产能力较差的劳动力得到正常的报酬，因此，较强的和生产能力较高的劳动力就获得较高的报酬）。”^④ 不等价交换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量和经济资源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转移，由此实现了后者对前者的剥削。

第三节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新殖民主义

曼德尔的上述理论详尽地描绘了新殖民主义在经济领域中的图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亚、非、拉地区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旧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命运，相反地，不仅旧殖民主义时期留给

①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7—408页。

② 同上书，第41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411页。

第三世界国家的负面影响至今仍在发生作用，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不断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新的殖民主义策略。因此，与其说进入了所谓的“后殖民主义”时期，不如说殖民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新殖民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在其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的发展特点，决定了殖民主义在不同阶段上的特点，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相对应的即是新殖民主义时期。新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的不同点在于：（一）不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而是承认其政治独立；（二）一般不亲自诉诸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比较隐蔽的方式（包括挑起“代理人战争”）。当然，当隐蔽方式不能得逞时，也会采取赤裸裸的武装入侵的手段，此时，殖民主义的实质就毕露无遗了，新旧殖民主义的界限又模糊了。总的来说，新殖民主义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承认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和人民权利的基础上，以种种隐蔽方式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生态等各方面的控制和掠夺，从而最大程度地为本国，尤其是本国的资产阶级牟取各方面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稳定的政治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政策与法规的出台，都使外资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长。外资并购规模在1999—2008年间增长迅猛：“外资并购金额从1999年的23.95亿美元迅猛增长至2008年的129.6亿美元，增幅达4倍；外资并购金额占同期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也从1999年的5.94%增至2008年的14.03%。”^①而且，外资在并购本土企业的过程中，纷纷把目光瞄准我国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和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许多国人耳熟能详的民族品牌也入外资囊中。此后，外资对我国经济股权的收购规模更是有增无减。2009—2011年间，青岛啤酒、云南山泉、重庆啤酒、福达、水井坊、银鹭、小肥羊、徐福记这8个国内食品饮料品牌先后获批以不同的权益比重为外资所收购。通过对外资并购的结果分析可知，“借助对行业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的大肆收购，外资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在众多行业快速形成市场垄断态势。……这无疑使外资方在我国市场上的话语权、控制权不断增大。更严峻的后果是，外资方进一步借助

^① 张金清、吴有红：《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分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4页。

市场垄断地位以及掌控的话语权、控制权对本土企业乃至国家的自主创新基础及持续创新能力形成打压态势。……大量事实已经表明，寄希望于在外资方的主导下展开自主创新活动、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只是一厢情愿；相反，为牢牢掌控对本土企业的技术优势，几乎所有的外方控股企业都对自主创新采取种种限制。……如果任由外资并购的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国自主创新的基础无疑将更加脆弱”，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及其持续性将进一步削弱，“最终将影响甚至威胁经济主权的独立行使、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和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能力。”^①因此，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外资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所造成的日益增长的威胁，警惕外资的大规模收购，推动法制化建设，建立健全相关的游戏规则，防止不公平收购的发生。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领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重心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资本、虚拟经济方面。经济虚拟化、金融化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日益脱离，金融部门急剧膨胀，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恩格斯于1890年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对金融市场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恩格斯指出，金融贸易虽是从商品贸易中衍生出来的，但是“金融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此外，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时而应当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应当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②金融市场的危机可以来自于实体经济领域，此外，“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③恩格

^① 张金清、吴有红：《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分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0页。

^③ 同上书，第699页。

斯在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对金融市场所作的论述，在根本道理上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仍然完全适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创新”改变不了这一点，充其量只是掩盖了这一点。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不仅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而且由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又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因此，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一旦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会以强制的形式向我们表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像一颗随时待爆的炸雷一样埋藏在繁荣深处。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来势汹汹的虚拟经济面前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金融掠夺甚至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主要剥削手段。“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将以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由于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国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外围国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前者通过‘合法’的金融手段就可以轻易地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而后者不仅透支了国内资源，压制了国内需求，最终整个经济还被牢牢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这是一种典型的‘静悄悄的掠夺’，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剥削的最主要手段”。^①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金融安全就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须首先保障金融安全。我国也不例外，在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的金融体系尚存在漏洞，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为确保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健运行，需要做到：①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监控制度；②我国的金融开放必须量力而行，渐进推行，否则，就意味着撤销了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对我国的经济成果肆意侵吞；③加快推进本国金融领域的法制化建设，完善相关的游戏规则；④在认清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本质的前提下，加强国际间的协调合作，力争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此外，新殖民主义又决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甚至也不限于传统的政治、军事、思想等领域，它把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人民健康等也明确地纳入控制和掠夺的目标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消耗发展中国家的

^① 王莉娟：《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初探》，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3期，第158页。

不可再生资源，同时又把污染源大肆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近些年在我国推广的转基因食物品种更是充分表明了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不可改良的邪恶本性。转基因食物品种在我国的推广不仅是一场经济掠夺，因为这涉及几十项的技术专利，我国对此是没有独立的自主产权的，因此要付不菲的专利费^①，而且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更是难以估量，几乎是灭绝式的一招，对此不可不察。

总之，新殖民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是旧殖民主义的简单延续，而是具有各种新的特点，它们与资本主义在晚期阶段上的发展特点是紧相关联的，因此，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总体背景中、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特点，才能深入认识新殖民主义的本质。反过来说，当我们这样做时，也加深了对资本本身的认识，因为资本的一系列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本就是其固有本质的不断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剖析，不仅为了使我们认识与时俱进，而且为了使我们与资本的斗争与世俱进，只有这样，从近处说才能实现我们民族的自立，从远处说才能实现从资本奴役下的解放——这是整个人类的必由之路，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使命。

^① “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在最近的研究报告里面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他们在这篇报告里面说：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和研究的8个转基因水稻里面，没有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产权。8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系列，至少牵涉到了28项国外的专利。而这些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和美国杜邦……《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调查的结果是按照江夏区的种子价格，非转基因稻种每斤5块钱左右，转基因稻种至少每斤15块钱，最高价时可以卖到40多块。”载郎咸平：《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第七章 曼德尔对马克思异化论的理解与阐发

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曼德尔有两处集中的论述，一处是在题为《异化的原因》（1970年）的论文中，一处是在《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年）一书的第十一章《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逐渐消除异化还是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异化？》中。前者主要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四种异化形式及其经济根源，后者主要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论述了马克思异化观的发展、对这一发展的各种误读，以及这些误读背后所掩盖的异化现实。通过对这两者的分析和梳理我们可以较完整地勾勒出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观，曼德尔的异化理论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当然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的一部分，同样是服务于他的革命理论的，因而是他整个批判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一节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四种异化形式及其根源

在《异化的原因》这篇论文中，曼德尔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初步呈现了曼德尔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解及其与曼德尔革命理论的关系。一、曼德尔指出马克思论异化的原初点：人与国家关系的异化；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理解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性；三、马克思对黑格尔异化劳动论的批驳；四、曼德尔就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关系的争论，特别是成熟马克思是否放弃了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争论，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五、异化的四种形式；六、异化的扬弃。由此构成了曼德尔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系统阐述，其中，重点阐发了异化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的四种表现形式。

曼德尔论述的第一种异化形式是经济异化。经济异化虽然“仅是阶级社会中覆盖了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的更广泛得多的（异化）现象的一部分。但它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①从曼德尔对经济异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经济异化的六种表现：①劳动者失去生产、生活资料，②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力，③产品不归劳动者所有，④劳动产品反过来反对劳动者，⑤生产过剩的危机，⑥劳动的非创造性。就劳动的非创造性，曼德尔举了一个例子：“天主教牧师和新教牧师——即所谓的‘劳动者—牧师’——就他们在西欧工厂中工作的经历写成了书，他们在以上这点上的结论与马克思完全一致。他们说，工资劳动者把他们在工厂或办公室里上班的时间视为一部分生命的丢失。他们为了在工作之外获得自由和发展，不得不在那里上班。”^②时间本是生命的组成要素，然而对劳动者来说却成了生命的敌对物，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死亡；然而即便如此，由于经济异化决定了生活中其他一切领域的异化，这就决定了在工作之外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发展，如曼德尔对消费异化的论述就表明了这一点。

曼德尔论述的第二种异化形式是消费异化。它是资本经济的必然后果，因为资本经济有一种持续拓展人们需求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将拓展人们的合理需求范围，使人的发展较为全面化，这也是资本文明面的体现。但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后就会引起人的需求体系的扭曲，“这种异化不再是纯粹经济领域的，而实际上成了社会上和心理上的。一种机制持续地将需求拓展至合理的范围以外，其动机是什么？它是故意要在人类中制造出永久性的但毫无意义的匮乏感。如果人们的需求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全面地得到了满足，那么资本主义就不再能存在下去。这种机制必须持续地激发出人为的匮乏感，否则，那些越来越脱离人的真正需求的商品的出售就不能增加。”^③有的资产阶级理论家认为，随着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的不断提高，人的劳动时间会不断减少，自由时间会不断增

① 本文的英文文章“The Causes of Alienation”源于“‘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网址为<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index.htm>，原文刊于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31号，1970年第3期，第19—23、49—5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加，从而就能实现人的自由。然而，根据曼德尔的论述，情况却绝非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种寄望于在休息时间获得某种自我实现的想法，其实不过是幻想罢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些身受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理念影响的、人道主义和乐善好施的改良论者，以为只要人们的休闲时间逐渐增加，人们就会变得自由。他们不理解，休闲的性质是由工资劳动的性质决定的，是由建基于商品生产和工资劳动之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随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休闲也会被商业化。在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消费社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使人们的休闲融入到经济整体之中，这种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剥削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之上的。”^① 这些貌似自由的休息时间也以消费、娱乐等形式被资本控制起来，曼德尔在这里指出了休闲异化或消费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劳动异化。因而如果回避了社会制度及由之所决定的经济异化，那么对异化的一切指责和批判都将是隔靴搔痒。并且曼德尔也指出了正是这种消费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借口让无产者‘散散心’，或‘娱乐’一下，实际上或则是使他们的批判能力萎缩，或则经常是不健康的刺激，终于使他们人格败坏，并部分地破坏了他们的个性。”^② 有意思的是，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一书中指出，消费主义不仅是资本经济所鼓励的，而且也是苏联的官僚集团所鼓励的。对工人来说，这是劳动异化之后的避难所；对官僚来说，这是阻止工人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继续革命的一种手段。消费异化的存在反过来表明了此社会制度下经济关系和劳动过程的异化性质。

曼德尔论述的第三种异化形式，曼德尔名之曰“人的活动的异化”；其实，从其具体内容来看，曼德尔讲的是社会关系的物化。曼德尔就此论述道：“异化概念拓展至人们的普遍活动中，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过分专门化的社会中。结果，为了谋生而从事某

^① 本文的英文文章“The Causes of Alienation”源于“‘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网址为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index.htm>，原文刊于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31号，1970年第3期，第19—23、49—50页。

^②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3页。

种特殊工作的人们，眼界退化得相当狭隘。他们成了他们所干工作的囚徒，考虑问题受到特殊专业的限制。由于这种局限性，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敏锐度也在下降。这种眼界的狭隘性会导致某些更坏的情况，即倾向于把人的关系转变为物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物化’，社会关系成了物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过论述。看待事物的这种方式，是这一异化理论的进一步延伸。……这种将人‘物化’的习惯……是由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所致。这种社会关系建基于商品生产和极端的劳动分工。人们在自己的职业眼光中把别人只看成自己的顾客，或者说，透过特定经济关系的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人。”^①曼德尔在这段话中揭示了资本条件下的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物化”，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解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中。曼德尔指出，现代知识分子脱离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深陷专业化分工的桎梏，也是这种异化的表现。为此，曼德尔领导的“第四国际”的成员们有意地反抗这种异化，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同时，也是出版过小有名气的专著的作家，曼德尔鼓励他们把写作与革命、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因为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本无专业可言的。

曼德尔论述的第四种异化形式是交流能力的异化，对此曼德尔又分成三个层次。曼德尔通过对小孩子语言能力的形成过程的论述，指出了交流能力异化的第一种表现。“很长时间以来，玩洋娃娃是小孩子经历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主要方式。小孩子在玩洋娃娃的时候，他们把自我投射出去，有了另一个自我，并且和这另一个自我相对话。他们说着两种语言，他们自己的和洋娃娃的，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着一种假装的交流。由于这种对话的自发性质，促进了小孩子语言和智力的发育”；然而“最近，厂家生产出了会说话的洋娃娃。这应当说标志着一种进步。但是，会说话的洋娃娃会使对话受限。小孩子不再讲两种语言了，或者说不再有那种自发性了。部分的对话是由洋娃娃引起了，而这又是由资本家厂商所设定的……与较落后的时期洋娃娃本身不会讲话，要小孩子赋予她们一种语言的情况相

^① 本文的英文文章“The Causes of Alienation”源于“‘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网址为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index.htm>，原文刊于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31号，1970年第3期，第19—23、49—50页。

比,小孩子对话能力、交流能力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相应地,智力的形成也受到了阻碍。”^①曼德尔以这个有趣的例子揭示了,与物的“人化”(人性化)过程相伴随的是人的“物化”,即上述人的创造能力和交流能力的衰退。而这显然又是与资本在不断想方设法牟取利润的过程中对人的需求的误导有关的。

曼德尔所论述的交流能力异化的第二种表现是,不同阶级的人由于受自身所处阶级特殊物质利益的左右,彼此不能理解,难以沟通。“在任何—一个基于不同的社会物质利益划分成对立阶级的社会中,不同阶级营垒中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能力受到—定程度的压抑。这不是因为缺乏智力、理解或诚实,问题不在于个人。这仅仅是由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现实物质利益支配着其中的个人……因此,确切地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非局限于受压迫阶级身上。压迫者的部分能力也异化了,他们不能与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正常交流。只要阶级社会继续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深刻差别继续存在,这种分离就不可避免。”^②曼德尔指出的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思想差异固然是事实,但也应看到以现代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正在赋予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同—种语言,比如“娱乐至死和肉体狂欢”,因此各阶级、阶层、群体中人不是囿于自身所处集团的偏见难以交流,而是大家的价值观、审美观在大众文化赋予的同—种语言中达成了交集和同—。这意味着强势阶级不仅控制了物质上的主导权,而且控制了意识上的主导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失陷了。曼德尔似乎低估了这方面的影响,这使他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总是持过于乐观的估计。而且,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差异和交流障碍与其说发生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不如说发生在不同的专业之间。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愈来愈精细化的专业化分工导致了愈来愈严重的交流能力的异化。

曼德尔所论述的交流能力异化的第三种表现,是巨大的孤独感。“心理学家带着录音机到处转悠,到商场或街头去听人们之间的各种对话。当他们播放这些对话的时候,却发现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交流。两个人各自

^① 本文的英文文章“The Causes of Alienation”源于“‘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网址为<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index.htm>,原文刊于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31号,1970年第3期,第19—23、49—50页。

^② 同上。

的言说好似两条平行线，并无交集。每个人都想在这场对话中释放自我，走出孤独，但彼此却不能理解。”^① 如所周知，不少哲学家都曾赞许过孤独，认为孤独是人的存在的本真态。曼德尔批判了这种观点的非历史性，指出原始社会只有各种各样的集体生活，根本不知“孤独”为何物；孤独感无非是商品化生产和劳动分工下的产物，并且随着这一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发展而愈来愈超出人的承受限度，从而形成交流能力的异化。人之所以把孤独视为人的存在的本真态，是因为人的一切社会关系是异化的，人之所以选择孤独，是为了摆脱异化的社会现实，因此，这本身就表明了异化，反映了异化已扩展到人的全部生活，人逃到最后一个“避难”的狭隘天地——孤独，人已无处可逃；然而，对异化现实的逃避行为，本身就构成了总体异化的一个环节，因此它挥之不去异化的烙印，注定了在孤独中也不能诗意地栖居。曼德尔并不反对正常的独处需求，他指出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应重视满足人的这一需求，但这与作为对现实生活之逃避和交流异化之表现的美化孤独毕竟有质的不同。在现代心理学家看来是性格问题和心理问题的，在曼德尔看来是社会问题和资本问题。

然而，曼德尔终归是一个乐观的革命家，在描绘了一幅异化无所不在的惨淡图景后，在《异化的原因》这篇论文的末尾，曼德尔依然满怀乐观地寄望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创造出以下这些使异化消亡的先决条件：“商品生产的消失，经济匮乏的消除，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消除劳动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差别的消失”^②，最终使一切形式的异化彻底地退出人类的历史舞台。

总之，曼德尔对异化问题的论述特点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他形式的异化归结为经济异化，而经济异化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相关的，或者说经济异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要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就不能不从推翻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入手。不能说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就能

^① 本文的英文文章“The Causes of Alienation”源于“‘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网址为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index.htm>，原文刊于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31号，1970年第3期，第19—23、49—50页。

^② 同上。

使一切异化立即消除，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却是使这些异化逐渐消亡的先决条件。因此，曼德尔的异化理论也是为他的革命理论服务的。

第二节 矛盾与误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如果说曼德尔在《异化的原因》文中初步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那么，在《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一书的第十一章“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逐渐消除异化还是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异化？”中，曼德尔深入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分析了马克思异化观点之发展与转变的内在理路，澄清了对马克思异化观的几种主要误读及其社会根源，更深刻地批判了对异化的误读背后所掩盖的异化的社会现实。

一 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异化论的矛盾性及其发展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首次得到集中的表述，但它却不是一个完善的理论，这种不完善根源于它的矛盾性，正如曼德尔所说：“我们在此处所看到的，是青年马克思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向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从过去带来的因素不可避免地属于未来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由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社会事实以他自己的方式——即通过彻底改变它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非一致的；它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体系’，一种新的‘思想’。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些分散的碎片，这些碎片中包含着许多矛盾。我们也不应忘记这是一部‘不仅没有完成而且部分毁坏的’手稿。正是由于异化劳动这个观点，《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包含的矛盾才能被最为明确地揭示出来。”^①

一方面，马克思尚未摆脱来自黑格尔的对于异化的人类学理解。黑格尔对于劳动异化的双重定义是：“劳动是一种异化，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人

^①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 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年版, 第 158—159 页。

类能力的一种外化，这意味着人类失去了某些原本属于他的东西；劳动是异化的，因为生产总是赶不上需求，生产不能充分地满足需求。”^① 曼德尔指出，黑格尔“异化劳动”这一观点的人类学性质并非由于他对由资产阶级社会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一无所知，因为在他的《法哲学》尤其《美学》中可以见到对贫富差异及由此导致的所有社会阶级普遍异化的描述^②；而是由于以下事实：“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异化植根于人的天性——如果不是植根于整个自然的话，另一方面，他没有看到，只要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经由社会结构的转变，由财富与贫穷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能导致这种异化的消除。”^③

另一方面，马克思并非单纯地继承黑格尔，马克思是要通过比较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人类学来质疑前者，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声明其批判的立场关乎政治经济学的程度并不亚于关乎哲学的程度。在这一批判中他的出发点绝非“异化劳动”这个概念，而是他对如下情况的实际观察：与工人痛苦的增加同时发生的，是由这些工人所生产的财富的增加。他的结论并非在思想、观点和智力工作的平面上得出的哲学结论，相反地，对由无产阶级来实施的革命行动的号召已然代替了对“劳动哲学”的顺从。

这两个方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矛盾地存在着，从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在伟大发现边缘的踌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个片段中，马克思卓越地解释了异化劳动是特定社会形式的产物，明确地不让自己把问题推回到过去的迷雾中。他说：“国民

①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 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年版, 第155—156页。

② “在这种工业文化里，人与人互相利用，互相排挤，这就一方面产生最酷毒状态的贫穷，一方面就产生一批富人，不受穷困的威胁，无须为自己的需要而工作，可以致力于比较高尚的旨趣。在这种富裕境况中，当然就不再有无穷尽的对其他人物的依存性时常反映出来，人也就日渐免于谋生中的一切偶然事故，用不着沾染牟利的肮脏。但是他也就因此在他的最近的环境里也不能觉得自由自在，因为身旁事物并不是他自己工作的产品。凡是拿来摆在自己周围的东西都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由旁人生产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1页）

③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 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年版, 第156—157页。

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他（即国民经济学家——引者注）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的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① 接下来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论述了异化劳动的表现，无须再引述了，异化劳动在此处被明确地归结为社会被划分为阶级、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有财产，甚至被归结为劳动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端。然而，手稿中止了，马克思的这个思路并没有一以贯之下去，“我们看到在一段话中异化劳动的根源不再到人类社会的特殊形式中去寻找，而是到人性本身中去寻找，或更确切地说到普遍的自然中去寻找。异化劳动被拿来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类本质相对比，从而异化在初看之下即使不被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外化，那至少也被理解为那种从未存在过的‘理想的人类’的否定。”^② 但即便在这里，马克思也已超越了黑格尔，因为他找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是他超出黑格尔的地方。然而尽管如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哲学的和思辨的，它缺乏经验的基础。这是马克思思想中矛盾性的表现。

但随后马克思就扬弃了对于异化的人类学理解，对于异化的历史性理解的视域不断巩固和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劳动的原因被归结为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在《资本论》中，对经济范畴的拜物教被归结为商品关系，即私有财产和竞争，它们在资本主义到来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90页。

^②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1971年版，第161页。

前，当小商品生产出现的时候，就使个体生产者和财产所有者相互隔离；等等。

由此可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构成了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即由对异化的人类学理解向对异化的历史性理解的转变，这种转变充满矛盾，亦不乏深刻。其时马克思对异化的论述虽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已标志着对黑格尔的较大超越，表现有三：（1）它不再建立在需求和劳动的辩证法之上——需求和劳动的辩证法导致不可能得出一个解决办法；（2）它得出了一种解决办法，提出了由无产阶级来实施革命行动的号召；（3）他不再以绝对观念或哲学概念进行推理，而是力图以实际观察到的社会矛盾来批判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二 对马克思异化论的主要误解及其根源

1. 三种主要误解

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在德国首次出版以来，围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尤其凸显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关系问题。曼德尔对讨论中的不同看法加以归类后概括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同质论，认为《资本论》的论点的基本要素已存在于前者中；（2）异质论，以前期否定后期，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赋予异化劳动理论一种道德的、人类学的甚至哲学的维度，以一种更为“整体的”和“全面的”方式阐述了异化劳动的问题；（3）异质论，以后期否定前期，认为异化理论是青年马克思接受劳动价值论的绊脚石，它与《资本论》中的经济分析是相矛盾的。曼德尔花了较大的篇幅对这三个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进行驳斥。

第一，同质论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历史唯物主义都尚未形成，谈何“同质”？第二，以前期否定后期的异质论更是不值一驳，因为这等于完全否认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历史意义。第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驳斥以后期否定前期的异质论提供了重要论据，因为其中有着大量与异化有关的段落，据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异化观点是马克思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完全成熟后所使用的理

论工具的一部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货币章中，马克思是以如下方式提出异化劳动的问题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① 以下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及物化与异化之区别的一段话：“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作为活劳动的异己的财产和敌对的力量，才能产生出来；换句话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要素。”^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如下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来：“但是，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物化劳动。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还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物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极度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③ 无须再引了，结论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3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0页。

清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异化理论既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关内容的发展，也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辩证超越，这种发展和超越无疑有赖于其间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深入。

2. 误解的三大根源

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以及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关系的这三种误解不是偶然的，不是纯粹的理论争论，而是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此，可分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就资产阶级而言，通过把马克思整个地归结为黑格尔来“整合”马克思是他们的一个议题，他们力图“熔化”马克思的教导中具有爆炸性的革命理论，把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融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中。

第二，就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派而言，在磨钝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锋芒这一点上他们与资产阶级是一致的。很长时间以来他们把推翻资本主义的任务交付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非工人阶级的实际行动。“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向每个人表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社会主义的到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此时社会民主派的思想必然要改变其方法。在经过了对青年马克思著作的长期蔑视后，社会民主派突然从中寻到了灵感，得以使一种‘道德使命’与无望的资本主义现实对立起来，与他们对之毫无热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与斯大林时期苏联革命的蜕化对立起来——它提供了一种受欢迎的陪衬。因此，在最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社会民主派的圈子中，《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尊为时尚，与之相伴随的是这样一种处心积虑的企图，即磨钝《手稿》中所包含的革命信息。”^①

第三，就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和思想家不愿承认马克思所描述的异化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但事实上它们又的确存在着，为了回避这两者的吻合，他们尽可能降低异化观点的重要性或干脆称它为“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甚至避免在一

^①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1971年版，第185页。

个单一的版本中完整地重印它们，通过诸如此类的对青年马克思著作的“肢解”达到使这个观点消失的目的。“至于那些既认识到这种企图的混淆视听的性质但又力求在官方的正统观念内保持其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通过‘发现’整个成熟马克思已然存在于青年马克思之中而走出困境的，所以他们得出的结果往往与那些资产阶级的伪批判所得出的结果相类似。”^①当然，当这种种心态通过理论形式反映出来时，便显得复杂和晦涩多了。

3. 补充与结语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从一种不成熟的“异化”理论发展至成熟的“物化”理论，这是不正确的。“的确，马克思在本质上把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人类异化归结为由商品关系所导致的人类和社会关系的物化。但是，首先，他所作的这种归结只是就问题的本质而言，而并非就所有的异化方面而言；因为即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异化概念也涵盖着比‘物化’或‘商品拜物教’概念更广阔的领域（例如，消费层面的异化，个人能力发展的异化，在社会层面上所获知识的异化，等等）。此外，正如从以上所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话可见，马克思继续谈着原始社会中的异化，尽管在那种社会中既没有商品生产，更没有商品拜物教。”^②由此可见，“异化”是一个比“物化”更宽泛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异化”是一个比“物化”较不成熟的概念，它们都是马克思异化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社会的物质贫困，人类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助，是异化的根源。因而异化古已有之，包括在私有制尚未产生的原始社会中，但此时的异化主要不是经济异化，而是社会、宗教和思想异化。“如今，在社会、宗教和思想异化的基础上增加的这种经济异化，实质上是社会劳动分工、商品生产和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产物。随着国家的产生，随着人与人的关系中具有典型性的暴力和压迫现象的产生，从经济异化中产生出政治异化。这种多重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达于极点……经

^①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1971年版，第186页。

^② 同上书，第184页。

济异化在技术异化中获得了一种额外的表现……”^① 只要商品生产、货币经济、劳动的社会分工仍然存在，异化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异化就必然存在，不管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是在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苏联为首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有其一般和特殊原因。一般原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充分，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所需的经济基础存在着天渊之别。特殊原因是，这些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往往官僚主义膨胀、政治层面上缺乏社会主义民主、经济层面上缺乏工人自我管理、文化层面上缺乏自由创造，这等于在上述特殊原因的基础上雪上加霜，使异化变本加厉。

曼德尔强调，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必然包含如何使异化消除的理论。曼德尔指出，异化将逐渐地消亡，正如它逐渐地出现，它不会由一个单独的事件而被“废除”，正如它不是突然出现的。曼德尔一方面反对认为异化不可消除的悲观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又反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就能消除的乐观主义观点。经济匮乏、商品生产、劳动分工、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消亡是异化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先决条件。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扩展，在工作日大幅削减的基础上创造性活动的增加，世界范围内消费习惯的日益渗透，以及由所有这些而带来的心理革命，等等，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后的过渡社会中逐渐消除异化的具体驱动力。

^①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1971年版，第181页。

第八章 曼德尔的革命战略理论

曼德尔的革命战略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欧洲共产主义》（1978年）一书中，这本书由曼德尔相对独立的十篇文章衔接而成，它们运用马克思—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从多种角度对斯大林主义、欧洲共产主义以及此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析。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前者批判了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后者批判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

第一节 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批判

“一国社会主义”论，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之内胜利，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在一国之内建成的观点。与此相反的是世界革命论，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可以在一国首先开始，但必得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完成的观点。批判“一国社会主义”论、主张世界革命论，是托洛茨基的代表性观点之一，曼德尔完全继承了这个观点，并用它来分析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世界革命论虽然被贴上了托派的标签，但曼德尔指出，这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贯观点，托洛茨基不过是坚持了这一观点并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对此作了更为系统的阐述罢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列宁是“一国社会主义”论的首创者，但曼德尔指出，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国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就此完成，而必须要在世界范围内继续推进；至于在像俄国这样落后的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更是无

稽之谈了。曼德尔指出，是斯大林在1924年以后修正了列宁的理论，成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始作俑者，并把真正符合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论贴上托派的标签加以反对。

托洛茨基和曼德尔指出：生产力发展的越来越国际化使得在一国之内不可能达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在资本主义较早的发展阶段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样认为，而到了生产力发展愈加国际化的帝国主义时代，情况就更是如此了。托洛茨基的下述这段话集中论述了“一国社会主义”论何以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到帝国主义时期，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正是这个论点先天就把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一种反动理论而排斥、拒绝和抛到一边去了，因为这种理论不仅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和这一发展已经取得的物质成果是互相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出、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1914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国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生产力赶回到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猛烈企图冲破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中去呢？”^①托洛茨基认为，除非生产力倒退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水平去，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独善其身。

曼德尔指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形成主要不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

^① [苏]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5年版，第46页。

偏差，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即它是符合官僚层的既得利益的。从根本上说，苏联官僚层的发展壮大，与世界革命的夭折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孤立落在落后的一国内，是有着深刻的关联的。它是革命夭折或不彻底的产物。假定社会主义革命按世界革命论的逻辑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它也势必会使苏联本国的革命继续深化，使由于革命的不彻底而产生的官僚阶层瓦解掉。这当然是官僚阶层所害怕和反对的，因此，他们必须把革命的这种夭折或不彻底性巩固下来，唯恐革命的继续发展和深化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这反映在思想上，就是“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提出。

曼德尔指出，“一国社会主义”论所导致的，远不止是理论上的混乱，而是极其巨大的现实危害。它使那些已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扭曲蜕变、难以为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但现实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却孤立在一些经济上极端落后、远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中，这些国家非但不能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继承过来，反而遭到了后者的封锁围攻。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组织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根本上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不能不产生一系列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料未及的矛盾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一种生产力高度发展，且打破了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而设想的生产关系难免发生一系列的蜕变和扭曲。官僚主义成为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到不可遏制的程度，就是这种蜕变和扭曲的集中体现，而且根据托洛茨基的论述，向资本主义的倒退正是官僚阶层的大势所趋。除苏联外的其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出现了与此相似的情况。因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一直可以追溯到“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个源头。可以说，从官僚层提出“一国社会主义”论并把它付诸实践的时候起，社会主义的失败就已经开始了，苏东剧变不过是为这个延续已久的失败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现实危害的另一表现是工人国际的瓦解和民族共产主义的泛滥。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苏共对各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各国共产党对苏共的盲目服从；第二个阶段是“一国社会主义”论本身的逻辑使这种局面分崩离析。

“一国社会主义”论认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是可以在一国之内

实现的，而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已经在这一进程的途中。因此，“一国社会主义”论认为，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堡垒”，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须首先保卫这个“堡垒”；对其他成果的争取，必须要以保卫苏联这个既有成果为前提。这样，在保卫苏联政权与推进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就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修正：世界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已不是推进世界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纵深，而是保卫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堡垒”。进而得出的结论就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活动须要首先听命于、服务于苏联，实际上也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利益需要。“一国社会主义”论使克里姆林宫成了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主宰。

然而，“一国社会主义”论的逻辑并未就此终结：社会主义既然可以在苏联的一国之内实现，也就可以在其他的一国之内实现。从苏联中心论到民族共产主义的转变只是一个时机问题，当苏联自身的危机开始暴露时，这个过程就开始了。它一方面表现为已经执政的共产党对苏共的疏离和抗衡；另一方面表现为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中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此即欧洲共产主义的滥觞。托洛茨基就后者论述道：“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人们不仅在夺取政权以后，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可以相信这个理论。如果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范围以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着手鼓吹这个理论。纲领草案使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再隔一天，法国的党也会起而效之。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崩离析的开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果认定它自己的这个特殊国家具有独立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而且足够的’条件，这个共产党就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了。社会民主党也并不是因为有了有一个诺斯克才开始的；早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它正是在这个同样的问题上栽了一个决定性的跟头。”^①

托洛茨基和曼德尔认为，民族共产主义不仅使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的基本趋势是与资产阶级融为一体，而且使已经执政的共产党由于建设

^① [苏]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5年版，第63—64页。

社会主义的难以为继，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大危险。

以上就是“一国社会主义”论所导致的巨大现实危害，因此，曼德尔认为，为了扭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颓势，必须批判“一国社会主义”论，回到世界革命论，摒弃民族共产主义，重建“一个中心”。这个中心绝对不同于为斯大林在“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指导”之下所扭曲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是依靠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中心’。它不会无视各国大多数党员的成熟程度和理解能力，随意指派或废除他们国家或党的领导。它肯定不会不顾不同国家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发展，强行颁布带有强迫性质的‘策略’……而最主要的是，这个中心绝对不会迫使任何一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从属于另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或服从于另一国的外交策略。我们要的是这样一个中心：它能将一切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经验、实践以及从中得出的教训集中起来。它要以这种集中为基础，用公开讨论以及以理服人的方法，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向所有共产党人提出一个一般的方针。它还要以无产阶级采取的越来越多的共同行动来取代现在那种口头上的‘团结一致’和枯燥无味的‘经验交流’。因此，这个‘中心’将用不断发展的国际革命力量的集中来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国际性集中。”^①曼德尔把发展由托洛茨基所缔造的“第四国际”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便是这个“一个中心”论在现实中的付诸实施。“一个中心”论重申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原则，它要求摒弃狭隘的民族心理和盲目的爱国主义，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国家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两者是一致的）时，谈爱国主义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爱国主义将成为使无产阶级在与本国资产阶级或执政的工人官僚一体化的过程中各自堕落、使国际工人组织分崩离散的诱因和幌子，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和反动。

第二节 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批判

上一节中已经指出，欧洲共产主义是“一国社会主义”论的逻辑结

^① [比]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齐春子、胡尔湖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4—35页。

果，它的基本趋势是步社会民主党的后尘，与资产阶级社会融为一体。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总括地说就是，避免与资产阶级的正面冲突，企图通过议会斗争和体制改革渐进地使资本主义发生质变。曼德尔指出，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根本不是什么新发明，其实就是考茨基的“消耗战略”，而考茨基的这一战略早已在历史上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惨败。

考茨基的“消耗战略”把资产阶级的统治设想成一个堡垒，而工人运动则处在这个堡垒之外，在这个前提之下，认为工人运动的正确做法是不要与堡垒发生正面的冲突，而应当包围它、消耗它，待它筋疲力尽之时再一举拿下它。曼德尔指出，考茨基的这个战略之所以错误，因为它所设想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实际上，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根本不是如考茨基所设想的那样是异体的、分离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包括对无产阶级经济上的控制、镇压工具和思想控制工具，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本不只是一个“堡垒”的问题。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那样一种处在“堡垒”之外、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的自由之地，供反资本主义的力量来集结和包围。曼德尔指出，这些密布于整个社会的资产阶级的防御设施只有在资产阶级对它们失去了控制的“革命危机”时期才可能被拆除，而这也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正面对抗。“任何解除资产阶级防御的企图，都会使社会和经济的职能机构解体，并引起局势的极度紧张。这样，非但远远不能进行平静、安稳的包围，而且恰恰招致了欧洲共产主义战略首先要力图避免的事，即阶级力量之间无情的正面较量。只有不去碰那些机枪掩体，这种力量较量才能避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进行包围，甚至谈不上集结起包围所需要的主要力量。”^①

欧洲共产主义者放弃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观点，并自称是葛兰西思想的继承者，曼德尔指出这是欺人之谈，因为葛兰西的思想虽前后有所变化，但从未放弃过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信念。曼德尔指出，必须区分国家的社会职能与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欧洲共产主义者正是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以前者抹杀后者，得出了不必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观点。正确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必须被完全打碎，因为

^① [比] 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齐春子、胡尔湖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95页。

它与无产阶级的使命是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大部分社会职能虽可结合进无产阶级的政权之中，但其中的阶梯式等级结构必须被根本改变。对于葛兰西的国家理论，曼德尔认为，它的贡献在于强调了资产阶级统治中思想领导与暴力强迫的互为补充，但是，葛兰西指望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首先夺取思想上的领导权，则是不现实的。这一点与夺取政权以前的资产阶级有着根本的不同，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可首先获得某种实际上的领导权，因为他们在夺取政权以前已是经济上的实际主人，凭着他们的经济实力已可控制几乎所有的通信手段，而无产阶级则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曼德尔明确地指出：“除非直接进攻资产阶级统治的两个基础，即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否则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发展便无法越雷池一步。”^①

欧洲共产主义者推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只是少数，因此必须注重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结盟问题。曼德尔指出，这一谬说完全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错误定义之上。凡拿工资，其工资数额不足以转变为资本者，皆属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未必意味着绝对贫困，但一定意味着相对贫困，成熟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就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而非绝对贫困之上。根据这个定义，西方社会中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属于无产阶级，根本不存在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问题。据此，曼德尔认为，无产阶级的内部团结问题，比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结盟问题更重要。曼德尔指出，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真实意图是以与中间阶层结盟为名，行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之实，这完全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曼德尔也批判了以其他社会集团来取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的观点，指出只有信任无产阶级、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至于中国、越南的农民以及古巴的激进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曼德尔认为，这的确表明在某些特殊的社会条件下，以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分作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也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这种革命毕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社会主义只能由无产阶级去建立，因此，上述情况会给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带来额外的阻碍和困难。中国的托派理论家王凡西也就中国革命

^① [比]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齐春子、胡尔湖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06页。

中革命主体的特殊性（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作出过详细的探讨，他的基本结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如果长期离开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虽然也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但极易发生严重的官僚主义蜕变。

回到欧洲共产主义的问题上来，总之，曼德尔认为，不管欧洲共产主义者如何在理论上遮遮掩掩，都不能掩盖他们正在走一条社会民主党化的堕落之路，尽管一方面由于与苏共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更多的激进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还须与社会民主党保持一点距离。有人美化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认为它们已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然而，在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连续执政四十余年之后，仍由十五个家族把持着该国的经济，这一事实已足以表明社会民主党并未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实质。

曼德尔所主张的显然是暴力革命论，曼德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观点。曼德尔通过详细的摘录表明，所谓晚年恩格斯弱化暴力革命作用、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乃是建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恩格斯原文进行压缩和删改的基础之上，并且这种压缩和删改是受到了恩格斯的强烈抗议的，因而，流传甚广的所谓晚年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论的观点完全是欺人之谈。事实上，“年迈的恩格斯在他逝世的前夕，也决没有排除诉诸暴力，而且也根本没有为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的、合法的、渐进的和选举的道路辩护。他仍然一如既往，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①

但是，曼德尔也指出，真正的暴力革命只是整个革命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步骤，在此之前，要经历一个双重政权的过渡时期，即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逐渐瓦解、无产阶级的组织机构普遍建立的时期。“从资产阶级的‘正式’的国家权力一下子过渡到新的工人的国家权力，是难以想象的。从一种权力过渡到另一种权力需要时间……群众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学习新的、更高形式的民主。要他们懂得他们正在创建之中的新的国家机构的意义和价值，这也需要时间。同时，资产阶级政权的机构——尤其是武装机构——必须经历一个解体和逐步瘫痪的过程，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工人的权力机构要普遍地建立起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

^① [比] 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齐春子、胡尔湖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82页。

段上，资产阶级制度的解体和工人权力的建立，交织出现在一个过程之中；这个时期就叫做双重权力阶段。这是介于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真正的‘过渡时期’……双重权力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是对抗着的国家（或前国家）机器之间在特定领土上争夺实际的权力和大多数公民支持的斗争。”^①即便在真正的暴力革命之前的过渡阶段上，曼德尔与欧洲共产主义者观点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欧洲共产主义者设法“利用”资产阶级的现有机构，而曼德尔则主张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机构，以与资产阶级的机构相抗衡，并最终瓦解它。

曼德尔指出，如果力量对比有利于无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武装机构首先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被瓦解；工人和人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得到包括士兵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承认”^②，那么，连最终的暴动也可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例如，曼德尔所提出的“积极罢工”策略就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使总罢工委员会掌握对国家的控制权：“如果地铁、公共汽车和列车虽然运行，但却免费乘坐，乘客坐车不必买票；如果医院画夜（照样？——引者注）开诊，但也同样分文不取而且不必填写任何事务性的表格；如果孩子们照常上学，但教师让他们去做游戏或偏离正式的教学计划给他们上课，那么‘雇佣劳动者公众’就会保护罢工者。如果罢工者不再断电，而只是干脆拒绝查电表，那么‘公众’将会高兴地鼓掌叫好……如果这些倾向在一场包括所有行业、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或48小时的总罢工中同时出现，那么最终将导致形成国家中事实上的对抗性权力，即导致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的任何一场革命危机都将遵循这样的模式。”^③由此，曼德尔从战略到策略，从准备阶段到暴动阶段，描绘了一幅适用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图景。

托洛茨基—曼德尔的世界革命论及其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对解释苏东剧变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它说明了：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官僚层在“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指导下，把世界革命的夭折巩固下来

① [比]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齐春子、胡尔湖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74—175页。

② 同上书，第173—174页。

③ [比]曼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王学东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的时候起，社会主义就已经开始失败了，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创不会比后来的苏东剧变更小，因为苏东剧变不过是为这个失败画上了一个句号。以世界革命论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不是实现后又失败了，而是由于实现过程中的夭折而根本就不曾实现。因此，所谓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非但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而且恰恰是社会主义失败的结果和表现。戈尔巴乔夫背叛论（即把苏联解体归因于戈尔巴乔夫的背叛）的错误就在于，其前提是默认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苏联已经是社会主义。然而，那远不够格社会主义。也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舞台上，十月革命的意义才能得到确认，否则，很容易得出十月革命是历史的早产儿的结论。因为从俄国一国的范围内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的确还未成熟，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仅早已成熟而且开始腐烂了。这对于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啻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独到反思，因为从历史上看，十月革命之后欧洲革命迟迟没有爆发确实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并为其日后的蜕化、倒退埋下伏笔，对于其他那些孤立落后一国之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亦然。如果说世界革命论在解释历史时有其合理性，但把它搬用于现实则失之简单片面，因为归根结底，时代不同了。不顾条件地把世界革命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是一种极端化和简单化的思维，世界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新的世界局势下各自探索着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若仍一味拘执于世界革命，否定除此以外的其他发展道路，就显得教条和狭隘，而表现出托派的理论局限性了。曼德尔没有一个着眼于近期的改革方案，不顾条件地把革命置于议程之上，否认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以及在缓和矛盾、延缓革命上所确实起到的作用，这就使他的理论带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质。

曼德尔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批判，作为对“一国社会主义”批判之延续，具有揭示本质、入木三分的优点，但也有其片面性，它忽视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正面意义，而且由于时代局限，未能看到它们最新的积极变化。例如，刘淑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共产党的新变化》一文就指出了这些积极方面：“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共产党积极应对新的客观形势，及时调整战略和策略，呈现出新的发展变化。这

主要表现在：争取社会主义的信心得到提升，替代资本主义的目标更加明确；历史使命感增强，社会基础和影响力有所扩大；工作手段更趋现代化，队伍不断更新和扩大；国际协调更加频繁，思想交锋更加尖锐。”^①此外，余维海在《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探索与斗争》一文指出，2010年各国共产党在《茨瓦尼宣言》中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人民权利受侵害的情况作了一致的揭示，各国共产党也已形成了一定的国际交流机制和联合机制。但这种联合显然还远未形成新的工人国际。的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欧洲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解放任务的实现作出新的探索，而不应拘执于陈旧的框框。但在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中心，以分散、独立的运动为主的基础上，能否有效撬动资本的逻辑、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不管如何，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同路人，只有在对欧洲共产党的既批判又联合中，才能有助于全球左翼思潮的相互对话与促进，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①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现状与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84页。

第九章 曼德尔的革命主体理论

除了革命战略理论以外，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分析也是曼德尔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先锋党》（1983年）一文和题为《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及其在今日的意义》（1970年）的小册子中曼德尔以阶级意识为中心论述了先锋党、先进工人与工人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作出了阐释和发展。在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理论的探讨中，不可否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于是就有一种带普遍性的观点认为，摆脱了绝对贫困状况的无产阶级是否还能成为革命的主体？离开了无产阶级绝对贫困这一前提条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还能成立吗？针对此一问题，曼德尔在《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年）一书中通过对马克思工资理论之发展的系统梳理表明，成熟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立足点不是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而是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而后者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是呈加大而非减弱的趋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并未改变马克思的理论前提。曼德尔对这两个问题的论述构成了他的革命主体理论。

第一节 先锋党与工人群众的辩证关系 ——以阶级意识为中心

与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对工人阶级主体能动性的抹杀相反，曼德尔的“第四国际”特别强调革命主体的能动作用。恩格斯早已指出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则进一步指出，革命的客观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开始腐烂了。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没有绝对无望的处境，它总可以给自己搞出一条活路来；曼德尔则进一步指出，

即便资本主义在不断的危机中走向覆灭，社会主义也不会自动到来，人类面临的将是野蛮主义甚至整体灭绝。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指向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否足够成熟、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能否适时（比如在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大危机时期）起来推翻资本主义。

一 革命先锋组织的必要性

那么，光凭工人群众的自发斗争能否实现这一点？曼德尔说，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支配工人阶级的是一种初级的阶级意识，即工会意识，它表现在工人阶级为日常经济问题——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所进行的斗争中。这种初级的阶级意识对于反抗资本主义虽是绝对必需的，但却不足以促使他们去挑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的确会周期性地催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甚至革命，并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周期性的高涨，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某种集中的领导，也还是不能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更别说是项世界性的使命了，而且当阶级斗争退潮后，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也会趋于低落，回到资本统治下的经济生活中为养家糊口而奋斗。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一样，具有波浪式发展的特点——尽管这两者的发展也未必是完全吻合的。因此，“作为革命主体的革命工人阶级只是潜在的和周期性的”，“如此界定的主体只能是矛盾的主体。一方面，它身受工资奴役、异化劳动、所有人际关系的物化，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周期性地迈入激进化的阶级斗争，甚至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公开革命战争之中。”^①（粗体为原有）为此，一个革命的先锋组织就是必需的，这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说。

从“纵向”来说，先锋组织与工人群众的区别在于可以保持阶级意识的连续性，不会随阶级斗争的起伏而断续，“它所充当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持久性记忆，这种持久性记忆总会以某种方式编入纲领之中，新一代可以从中接受教育，从而他们在实际介入阶级斗争时就不必从头

^①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103.

开始。”^①从“横向”来说，先锋组织可以起到使分散的阶级意识集中起来的作用。曼德尔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拥护民主集中制，但对于‘集中’这个词，首先不是从组织的维度来理解，实质上也丝毫不是在行政的意义上使用它。它是政治意义上的。‘集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经验的集中、知识的集中、从实际斗争中得出的结论的集中。”^②它既包括把不同运动——如青年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的经验加以集中，也包括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革命经验加以集中，把它们融会到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认识中。曼德尔认为，必须把上述列举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视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部性反抗，把它们引向问题的总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并把它们联合在推翻这一根本制度的努力中，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真正解决上述问题。

二 一般先锋组织与先锋党的区别

曼德尔特别提出了一般的“先锋组织”与“先锋党”的区别。只有当先锋组织得到大部分工人群众的追随，特别是与各部门的先进工人相融合时，才能上升为先锋党。曼德尔指出，先锋党的相对独立性与对工人群众组织的参与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但先锋党应做到以下两点：其一，“你不能哄骗或‘领导’工人阶级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你得使工人阶级信服。你得帮助工人阶级共同地和普遍地理解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③；其二，“你必须非常彻底地摒弃宗派主义的理论根基，尊重工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或大众委员会的民主。”^④总之，先锋党只能使工人群众信服，而没有任何凌驾于工人群众组织之上的特权。先锋党与工人群众之间是辩证互动的关系。

一方面，如上所说，先锋党可以使工人群众的断续、分散的经验连续化、集中化，向工人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先锋党也必须扎根

①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62.

② *Ibid.*, p. 63.

③ *Ibid.*, p. 69.

④ *Ibid.*, p. 67.

于工人阶级，把正确的理论和原则与现实的经验和斗争相结合，否则就会流于浅尝辄止或走向宗派主义；如果先锋党的主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其他成分，也容易走上歧途。借用托洛茨基的“活塞”和“蒸汽”的比喻来说，在革命中，先锋党是活塞，工人群众是蒸汽，两者必须相互配合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曼德尔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机会主义把“日常的工人”视为革命的主体，因而即使在工人表现出落后的方面时也唯工人是从；而宗派主义眼中只有“理想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一旦偏离了他们的理想标准，在他们看来就不再是革命的主体，甚至成了“资产阶级”。它们虽然各持一个极端，但在阻碍革命上却起着相辅相成的效果。这两种错误观点都没有理解上述工人群众作为革命主体的矛盾性质以及工人群众与先锋党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 群众、先进工人与革命核心在形成阶级意识上的辩证关系

如上所述，工人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能且仅能获得初级的阶级意识即工会意识，那么，如何使这种初级意识、工会意识上升为政治意识、革命意识呢？曼德尔认为，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对它的吸收以对如下内容的理解为先决条件：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现代革命和现代工人运动的重要历史。”^①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一样，这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需要个体独立完成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以外的成员也可以获得这种较高的阶级意识，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工人阶级的成员却未必都能达到之。

实际上，由于资本主义下现实生活对工人阶级的逼迫和限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能靠自身达到之。这就需要先锋党和作为先锋党和工人群众之中介的先进工人的宣传和教育，换言之，需要靠外部的灌输。曼德尔认为，这不仅是列宁组织理论的基本观点，它源于恩格斯，甚至可追溯至马克思。马克思在1870年1月1日由第一国际执行委员会寄至罗马瑞士的联邦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写道：“英国人具有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他们所缺乏的是将问题一般化的精神和革命的激情。单凭

^①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84.

执行委员会可以矫正这一点，并以此加速这个国家内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加速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所已取得的巨大成功，正为统治阶级最聪明和卓著的报纸所证实……更甬提下议院和上议院中那些所谓的激进分子了，他们在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有着相当的影响。他们正在公开地指责我们毒害了、甚至窒息了工人阶级的英国精神，把它导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① 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所突出的执行委员会对英国工人阶级的作用非常接近于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经典教义的阶级意识灌输论。通过这种灌输使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使工人阶级由为日常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导向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

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也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宣传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不能离开革命斗争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只有在革命斗争的实际中才能巩固和发展，才能避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对工人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也只有与实际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才能使工人群众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充分发展。这里所说的“革命斗争”应当具有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而不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能够实现其目标的选举斗争、经济罢工等，从后者中并不能发展出政治意识、革命意识。

因而，要使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达到较高的水平需要两个条件的配合，一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一是先锋党以及作为先锋党与工人群众之中介的先进工人的宣传和教育。由于工人阶级以外的知识分子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获得较高的阶级意识，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先锋党成员，因而他们在走向工人群众的过程中要有信心，“不是怀着最谦虚的、民粹主义的受虐倾向‘走向人民’”，“而是要给工人阶级中那些觉醒的、批判的阶层带去由于其碎片化的意识状态而不能靠其自身力量实现的东西：科学的知识和意识，这将使他们能够认识到隐蔽的剥削的耻辱，

^① 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16卷 [柏林：Dietz-Verlag出版社，1964]，第386—387页。转引自：*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116.

以及变相的压迫的本质。”^① 这才是革命的知识阶层的价值所在，而不是始终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种贬低知识阶层的民粹主义观点也是没有正确理解作为革命主体的群众的矛盾性和局限性以及先锋党与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

曼德尔以下述图表表示工人群众、先进工人和先锋党三者在此阶级意识产生上的不同：

群众： 行动→经验→意识



先进工人：经验→意识→行动



革命核心：意识→行动→经验^②

其中的“革命核心”可以理解为就是先锋党。此图表的第一行表示，工人群众是从行动开始，在行动中学习，在行动中产生经验，再从经验中发展出阶级意识。此图表的第二行表示，“先进工人的革命阶级意识却来源于通常的生活、工作及斗争经验。这些经验并非一定要是革命经验。先进工人从阶级冲突的日常经验中就会得出关于阶级团结、阶级行动和阶级组织之必要性的结论……先进工人的生活、工作和斗争经验使他们开始明白，如果行动仅仅停留在改革既存社会，而非推翻既存社会，那是不够的。”^③ 此图表的第三行表示，先锋党则可以直接从理论层面获得较高的阶级意识，用以指导行动，然后把在行动中产生的经验反过来提升至理论层面，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修改和扩充。两个自下而上的斜箭头表示革命意识的传递过程是从先锋党到先进工人再到工人群众。由于先进工人本身就是工人群众的一部分，在工人群众中有深厚根基，因而在革命意识的传递中能作为先锋党和工人群众的中介，能比先锋党更广泛和更自然地实现对工人群众的宣传和教育。但三者间不存在一者比另一者高明的问题，它们仍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它们的协调和互动，才能实现革命理论与

^①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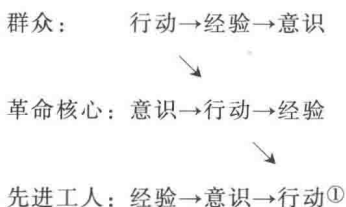
^② *Ibid.*, p. 86.

^③ *Ibid.*, p. 112.

革命实践的结合和统一。

四 群众、先进工人与革命核心在阶级行动上的辩证关系

在此基础上，曼德尔通过对上述图表的重置得出了如下图表：



这张图表将上述图表的第二行和第三行互换，用两个向下的箭头从群众的行动指向革命核心（可理解为就是先锋党）的行动，再指向先进工人的行动。这表示先进工人要达成一致的行动最困难，“因为它既不能通过纯粹的信念（就像革命核心那样）被激发起来，也不能通过纯粹的自发暴动（就像广大群众那样）被激发起来。正是斗争的经验——这是先进工人行动中重要的激发因素——使他们在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之前更为小心和谨慎得多。他们已领会了过去行动的教训，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一次暴动根本不足以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对敌人的力量（更别提敌人的‘宽容’了）和对群众运动的持久性更少抱有幻想。经济主义（即政治组织战略仅仅聚焦于工资、工作条件，等等）的最大‘诱惑’，就可以溯源至此。”^② 这确是曼德尔对实际革命运动作大量具体考察后的经验之谈。先进工人一方面是传播革命意识的有效中介，另一方面却也可以是一致革命行动的阻碍。这就需要先锋党更好地与各地区、各部门的先进工人相融合，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在工人群众自发暴动、先锋党凭信念集体行动时，能得到先进工人一致行动的支持。

曼德尔特别批判了群众行动“自发论”的错误，强调了先锋党的主动轮作用。第一，纯粹的群众自发的革命行动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抓去表面上的‘自发运动’这件蓝色外衣，你会发现亮红色镶饰的显著残余。

^①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86.

^② *Ibid.* .

这里，一位‘先锋’小组的成员发起了一场‘自发的’罢工。那里，一位‘左倾’组织的前成员，虽然早已离开了组织，但由于受到过充分的精神训练，因而在突发情况下，当普通群众仍在犹豫时，他就能以闪电般的速度作出反应。”^①也就是说，在貌似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背后仍有革命先锋的某种干预，只不过这种干预尚是断续的、零散的、偶然的。第二，单凭群众的自发行动甚至连眼前的任务也不能完成，更别提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否认这一点的人，不是对群众的局限性缺乏理解，就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缺乏理解。关于前者上文已多有论述，关于后者曼德尔指出：“资本主义本身和资产阶级国家对现代社会施加了强有力的集中化影响，因此反过来说，要想把这种集中化的国家政权逐渐地拆卸下来，就像——比如说一块砖一块砖地把一堵墙拆卸下来一样，这是十足的幻想。”^②资产阶级国家的集中性要求致力于推翻它的革命行动也具有集中性，即先锋党的领导。曼德尔指出，托洛茨基在早年曾责备列宁搞“替代主义”，以党的主动性代替群众的主动性，托洛茨基的这一指责是错误的。其实列宁并非低估群众的自发性，列宁像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样热情欢迎自发群众运动的大规模爆发，只是列宁同时正确地估价了自发群众运动的局限性。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认识到这个错误，在组织理论上向列宁靠拢，正如列宁在革命理论上向托洛茨基靠拢一样。

曼德尔指出，随着群众阶级斗争的发展程度的不同，阶级的自我组织也会经历不同的形式：由工会到各种群众政治党派（如资产阶级工党、独立工党、革命工人党），再到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苏维埃（即工人委员会、大众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由于在苏维埃中组织起了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因此成为最高的阶级组织形式。但一个真正的先锋党与苏维埃之间是毫不矛盾的，它应当保证而不是阻碍苏维埃作用的真正发挥。反过来说，苏维埃的存在也不会使先锋党成为多余，因为工人阶级之间不是均质化的，存在着思想和利益的分歧，不会“自动地和自发地”“对于革

①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92.

② *Ibid.*, pp. 89–90.

命中的一切战略和策略问题得出一个‘革命的解决方案’”^①，因此仍然需要先锋党的引领。

五 先锋党可能产生的问题：官僚化

然而，虽然先锋党与群众的分别是必要的，但先锋党的相对独立性也会导致另一问题，即官僚化。正如本书在对官僚主义问题的专题论述中将要指出的，官僚主义是劳动社会分工的产物，由于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劳动分工，因而官僚主义的起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扼制官僚主义的相反趋势能否对之作出有效的斗争，这些相反的趋势包括：“革命组织融入国际运动，这种国际运动独立于‘国家’组织并对‘国家’组织持续地进行理论监督（不是通过机构，而是通过政治批评）；对实际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密切参与，这使在实践中持续的筛选干部成为可能；通过确保人员在工厂、大学、党的全职官员之间的持续轮转，力图系统地消灭劳动分工；制度保障（诸如限制全职人员的收入、保卫内部民主的组织规范、形成流派和宗派的自由）。”^② 如果不能，工人运动的领导组织就会发生官僚主义蜕变，这个党就不再是先锋党，而是官僚党了。官僚党会阻挠甚至不择手段地镇压群众的革命活动，因此革命群众应当抛弃它们，如果它们已在工人国家建立了统治，就应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它们。

六 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不同影响与相应的对策

在《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及其在今日的意义》这一小册子中，曼德尔除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及其阶级意识作了深入的分析外，还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其他社会成分及其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影响。曼德尔区分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以下六个社会阶层：

“1. 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真正的中间人，即从属于资本的官

^①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102.

^② *Ibid.*, p. 99.

员：工头、计时员、工厂中的其他干部人员，他们的任务是出于资本的利
益维持工厂内的劳动纪律。

2. 科学与技术之间，或技术与生产之间的中间人：实验室助理、科
研人员、发明家、技术专家、规划者、项目工程师、绘图员。与第1类人
不同，这类人不参与对生产者剩余价值的提取过程。他们参加物质生产过
程本身，因而他们不是剥削者，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

3. 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中间人：广告经理和部门、市场研
究机构、销售部门的干部和科学家、营销专家。

4. 劳动力商品的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中间人：首先是工会官员，更广
泛地说来则包括工人运动中官僚化的群众机构中的所有官员。

5. 资本和劳动之间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中间人、意识形态生产者（那
些专心于生产意识形态的人）：部分资产阶级政治家（‘公共意见制定
者’）、所谓人文学科的资产阶级教授、记者、某些艺术家。

6. 科学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人，那些在职业上没有被并入统治阶
级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生产者，由于他们在物质上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生
产，所以他们相对来说能够对资产阶级关系进行批判。”^①

曼德尔认为，第1阶层无疑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但由于与工人组织
保持着距离，反而不至于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过大的消极影响；第
3、4、5阶层则具有或中立、或倾向于工人阶级的假象，因此更容易对无
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消极影响；而第2、6阶层则不但不会对无产阶级
的阶级意识产生消极影响，反而有助于无产阶级，他们是无产阶级在推翻
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知识阶层。因此，无产阶
级应当联合第2、6阶层，反抗第1、3、4、5阶层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
消极影响。为使无产阶级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
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占领无产阶级的思想，否则，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不
去占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会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数缝隙向他们的思
想渗透。而这当然有赖于先锋党的作用。

^①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p. 105.

第二节 “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 ——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立足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所描述的那种一穷二白的赤贫无产阶级在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不存在，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前提已有所动摇，所以他们的理论结论当然就未必正确了。然而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发展表明马克思后来明确摒弃了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理论前提，但与此同时，相对贫困却是工人阶级挥之不去的阴影，因而，不是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而是他们的相对贫困才是马克思理论的立足点。

一 马、恩早期观点：侧重于绝对贫困

上述那种误解的理论依据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而不是他们成熟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些早期著作中，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社会中这一阶级的否定性质推论出来的。它表现为黑格尔三段论的终点，真正是‘否定之否定’。正因为无产阶级所戴的锁链是彻底的，所以他们只有通过一种彻底的革命才能挣脱它们。这导致当代的批评家们得出结论说，因为在今天无产阶级所戴的锁链已远不那么彻底了，所以希望由这一阶级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也就基本上成了空想。”^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无产阶级革命角色的发现仍然限制在哲学的界域之内，且受着费尔巴哈感性人本学的影响，马克思尚未理解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力量之基主要不在于他们所承受的痛苦，而在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因此而获得的在行动中的组织性和凝聚力，马克思也尚未理解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实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不管对马克思还是对恩格斯来说

^①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1971年版，第22—23页。

都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这个“天才的大纲”中所提出的工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大体上一直保持到第二次流亡英国的时候。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进行激烈的论战，但恩格斯却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以下结论，即认为劳动者所得到的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因为恩格斯认为，在普遍存在的竞争中工人弱于资本家，并且由于机器对工人的代替，工人只会越来越弱。这个论点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边缘性的，但在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资理论中却占据着首要地位，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观点就受其影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工资的分析建立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典理论的基础之上，也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马克思对于工资的基本观点是，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和机器与工人之间的竞争，工资倾向于下降至仅够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周期相继阶段中工资运动的分析指证了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然而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不同的是，马克思指出这不是某种“人口增长规律”的必然结果，而是由工人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所产生的，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在本质上不是源于人口的运动，而是源于资本积累的运动。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对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论述中也蕴含着工人阶级相对贫困理论的因素，比如马克思声称：即使在经济加速的关键时期，“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①曼德尔就此指出，“这里的用词仍是笨拙的和晦涩的，但马克思凭直觉所要表达的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用工资所买的那些商品的价值会迅速下降；或者换言之也一样，工资的‘相对价值’能以工作日的一个越来越小的部分生产出来”^②，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在相对意义上（就工资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变化而言）变得贫困。但这些远未明确提出和得到发展。

在《哲学的贫困》、“工资”（《Arbeitslohn》）手稿、《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工资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②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1971年版，第32页。

上述著作中的观点，把工资仅仅视为一个生理概念，仍然持工资绝对下降、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理论。当然，并非没有突破的因素，其中有些论述就溢出了绝对贫困的理论。比如在1847年的“工资”笔记中，马克思就认为所谓的最低限度不是一个绝对的生理概念；能把不同的因素加入其中，也能把它们从其中扣除；资产阶级将“一些朗姆酒、茶、糖和肉”包括于其中，工人们则将他们的工会会员费包括于其中。《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那个关于房子的比喻^①也喻示了对相对贫困的谴责。但它们仍是次要的方面，这一点要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发生变化。

二 马、恩成熟观点：侧重于相对贫困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论述说唯一能将工人与奴隶区别开来的就是，工人在经济繁荣时期能扩展其享受范围，他能‘参与高级形式的甚至精神形式的享受，鼓吹个人利益，买报纸，听讲座，教育小孩，发展爱好’，简言之，在仍然向他敞开的唯一道路上通过增加其需求‘参与文明’。”^②这实际上已明确地否定了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理论，马克思此时对工资的理解已突破了生理概念的局限。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马克思在此处所说的言外之意就是，消费的增加、需求的扩展至少在经济加速的关键时期对工人来说是可能的，劳动力价值因而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基本上稳定的生理性的部分；另一个是被视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可变部分，它与工人获得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相一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面的部分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倾向于驱使工人以‘历史形成的’需求取代其‘自然的〔即生理的〕需求’。”^③这是马克思工资理论的重要发展，在此基础上，曼德尔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批

^① “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服，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②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1971年版，第145页。

^③ 同上。

判大纲》“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中也发展了这一观点，在那里资本积累对劳动力价值和工资变化两个方面的矛盾性影响得到了解释。一方面，资本的积累，以机器取代活劳动，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倾向于降低名义工资（相同数量的食物，或总的说来相同数量的商品，如今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生产出来），甚至实际工资（在失业人数不断增多的压力下）。然而，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意味着创造出新的工业部门——因而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以及创造出新的需求和这些需求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的散布。它这么做时倾向于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因为现在这一价值包括了为满足这些新需求而购买的新商品的价格）和价格（当失业下降时）。因此，工资的实际运动就不再取决于机械和简单的规律，而是取决于资本积累对劳动力价值的这种双重影响的辩证的相互作用。”^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工资问题上的这些理解标志着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成熟和完善，它们实际上直到写作《资本论》也没有变化。

此后，马克思在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作的演讲（即《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充分阐明了其工资理论，尤其在下面这段话中概括了这一理论：“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有某些特点而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中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变化的量，即使假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变，它也是变化的。”^②此处的工资

^①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1971年版，第145—1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94页。

理论表明：工资的最低限度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因而是基本确定的，在最低限度的基础上工资有较大的上涨空间，直至其最高限度，即那个能使利润维持在一个足够的水平上——低于这一水平资本将不再有兴趣雇佣工人——的工资水平，在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之间的具体工资水平取决于“斗争者各自的力量”或者说阶级斗争状况。马克思所强调的是工会活动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但“斗争者各自的力量”或阶级斗争状况并非完全独立的，它们至少部分地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在这些客观因素中，马克思首先提到的是劳动的供求的波动。由于在那些已经很大程度上工业化的国家里，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提高，不断地以机器代替工人是一个基本趋势，因而，马克思认为长期的趋势是一种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的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在同一篇演讲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①但这又不能从绝对意义上，而应从相对意义上去理解，因为马克思在同一篇演讲中指出：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能与实际工资水平的保持相一致：“虽然工人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对这种相对工资的降低，不过是想要在他的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不过是想要维持他以前在社会阶梯上的相对地位。”^②可见马克思此处所表明的是工人阶级相对贫困而非绝对贫困的理论。

以上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梳理表明，在马克思成熟的著作中，他并没有阐述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规律”，他只是认为他们的相对贫困是不可避免的。值得分析的还有《资本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③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成熟的著作中存在着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论述，但如果把语境考虑在内——即导致这段话的那些话——那么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7页。

^② 同上书，第87—88页。

^③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744页。

一阐述并不是想适用于雇佣工人的，而只是想适用于“工人阶级中的贫苦阶层”，即组成产业后备军的大量失业者。在之前的一段话中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马克思在其中解释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①因而就工资的变化而言，并不能从这段话中推论出什么，尤其是后面（即以上所引的两段话之间）几乎立即出现了这样一个评论：“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②，这个评论所表明的显然是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而非绝对贫困。

此外，恩格斯在对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中，对于“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这句话，恩格斯以如下的方式评论道：“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的无保障。我以为要将这一点写进去。”^③恩格斯的这一评论也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持有任何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假说。

三 结论：相对贫困理论才是马、恩成熟革命理论的立足点

由此可见，本文一开始所说的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前提已有所动摇，所以其结论也就未必正确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如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虽已改善，但他们的相对贫困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一方面，工人的实际工资倾向于上涨，但与此同时，他们从新创造的价值中得到的相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2页。

② 同上书，第7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0页。

对份额却减少了，或者说即便工资增长了，它们也比资本的财富增长得少得多；另一方面，相对于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激发出来的新需求而言，工资的匮乏。工人的相对贫困或者说相对社会地位的下降意味着虽然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但活得却更没尊严了。根据马克思的相对贫困理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

以上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人阶级相对贫困的一般情况和马克思理论中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之辨，但具体地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例如，它完全可以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平均工资上涨的趋势和工人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这使他们离绝对贫困越来越远，但这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中广大工人（包括农民）在贫困线上挣扎，甚至绝对贫困的大规模存在为代价的。当然，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使然，它一定要产生出贫富差异，不管是在不同的人群间，还是在不同的地区间。

不能因为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改善就否认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可靠性，因为成熟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本非建立在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预设之上，曼德尔以此再次表明了他对于革命的矢志不渝的信念。

曼德尔的革命主体理论或曰阶级意识理论这部分已溢出托派的标签，是曼德尔在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深入考察基础上对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包含了曼德尔对自身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它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党如何正确发挥自身的领导作用，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行有效的传递、整合与提升，颇具启发性和建设性。综上所述，埃内斯特·曼德尔的革命理论尽管有其局限与不足，但对于苏东剧变后重新确立对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于全球左翼思潮的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的借鉴，当然也值得我们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社会主义学者的研究和关注。

第十章 过渡社会的经济特点与主要矛盾

这一章主要由两部分的内容组成。一部分论述过渡社会的经济特点，或更确切地说，过渡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这部分内容主要参考《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中论苏联经济和论过渡社会经济的两章。另一部分论述过渡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官僚主义问题，官僚理论是曼德尔过渡社会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他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曼德尔对官僚理论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论述，一次是在《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一书的《论官僚主义》（1976年）部分中；另一次是在《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1992年）一书中，这两者之间有承接，也有变化。

第一节 过渡社会理论小引

过渡社会的概念是与社会形态的概念相对而言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稳定的统一体。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形态包括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其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些社会形态在时间上并不是紧密相连的，而是在相邻的两个社会形态之间，往往会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过渡社会的含义。因此，存在着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过渡社会，比如4—7世纪期间的西欧和南欧就是。也存在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比如15世纪至17世纪期间的荷兰、意大利北部城市和英格兰就是。而以苏联为典型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曼德尔认为就是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因为从它们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

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意义上讲，它们超越了资本主义，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的界定相比，它们又相去甚远。

每一种过渡社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不同于前一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也不同于后一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甚至也不是它们两者的简单结合。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① 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这段论述显然没有把过渡社会排除在外，曼德尔据此认为，每一种过渡社会都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的生产关系，而不独上述六种社会形态如此。过渡社会与上述六种社会形态的区别仅在于，过渡社会生产关系的稳定程度较差，它有待于前进至一种新的较为稳固的生产关系，也可能后退至某种旧的、当然也是较为稳固的生产关系。

曼德尔对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过渡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特点作了简要的论述。对于前者，曼德尔指出：“例如从戴克里先^②改革到曾经自由的德意志移民和殖民者终于在罗马统治地区的西部被征服……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被打碎了。在生产过程里，奴隶劳动正在衰落。但在奴隶劳动占优势和农奴劳动占优势之间，有一个中间阶段，这个阶段是联系着奴隶解放的半自由和自由农民劳动的阶段。这个阶段存在于奴隶生产正在解体，使封建主义的充分发展成为可能的时候。”^③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过渡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既非奴隶劳动，也非农奴劳动，而是自由和半自由的农民劳动。对于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生产关系，曼德尔指出：“构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特征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而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关系：简单商品生产的关系。组成生产者大众的，不是农奴或雇佣劳动者，而是自由农民和自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② 戴克里先（Diocletianus）从公元284—305年统治罗马帝国，他在统治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正式确立君主制。——中译者注

^③ [比]曼德尔：《过渡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规律十点提纲》，何虹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体力工人，以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生产。”^①曼德尔以上述两个例子表明了过渡社会生产关系的独特性，并且指出，对每一种过渡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认识，必须经过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非理论的推演。

当然，曼德尔的过渡社会理论所主要论述的、曼德尔的过渡社会概念主要所指的，是以苏联为典型的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曼德尔指出，与之前的过渡社会相比，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中，意识具有大得多的能动性，因此，在正确认识它的生产关系与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以苏联为典型的过渡社会，其特殊性在于，它们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被推翻的基础之上，而是孤立在一些未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中。因此，它们不是正常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而是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这是正确理解这些国家中一切问题的前提。

第二节 过渡社会的经济特点

一 过渡社会的基本矛盾

曼德尔指出：“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经济的基本矛盾，也是任何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②

曼德尔此处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在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对此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在这里（即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

^① [比]曼德尔：《过渡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规律十点提纲》，何虹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②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0页。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①按马克思的论述，“资产阶级权利”是指在形式上平等，但在内容上尚不平等的权利，这种“资产阶级权利”或“资产阶级分配标准”是直到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的。因此，不难理解，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分配标准之间的矛盾会成为正常的过渡社会的基本矛盾。

但事实上，苏联社会却还够不上这一基本矛盾。因为在苏联，权利在形式上就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别说是内容上。这就意味着苏联社会不仅根本不曾实现过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或“资产阶级分配标准”，而且还差得远，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在苏联所存在的恰恰不是马克思在使用‘资产阶级权利’一词时所说的在消费品分配方面的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形式上的不平等。如果说，一个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者用8小时劳动能够交换到的消费品数量是X，那么一个高级官僚在同样工作8小时之后，则不仅得到他的薪金，而且还能得到以实物形式提供的特殊的奢侈品和服务，相当于10X或者20X。”^②

因此，曼德尔此处对苏联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恐怕是把苏联社会与正常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混为一谈了。相反地，曼德尔在另一处关于苏联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应是更为正确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孤立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之内——引者注），一种新社会的产生就用新的矛盾取代了原有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被发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305页。

^②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取代，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还不适应进步的经济基础的需要。”^①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孤立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之内的情况下，落后的生产力与按正常的过渡社会所确立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成了苏联等国过渡社会的基本矛盾。

二 过渡社会的生产关系

在过渡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残存于消费品领域。商品货币关系在消费品领域的残存，是由生产力的不够发达、消费品的相对缺乏所决定的。商品货币关系在消费品领域的残存不可强行取消，否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

商品货币关系在消费品领域的完全消除，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又有赖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新经济政策把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当纵容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因为它们毕竟是资本主义的残余，与社会主义在性质和方向上是完全相悖的。纵容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也许可以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产生令人惊叹的效果，但由此导致的生产力的发达不会自动地产生社会主义，而只会使社会主义渐行渐远。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对残存于消费品领域的商品货币关系采取既利用又压制的态度，正如曼德尔所说的：“只要有必要，就持续地保留市场范畴；只要有可能，就有意识地削弱它。”^② 在这个过程中，把握一个合理的“度”非常重要。

至于在生产领域，商品货币关系应当在基本上被消灭，这是非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界所在。曼德尔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商品生产的残余——局部的或全面的——是这一个时期所固有的特点。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一残余只关系到消费品部门（最多关系到生产资料部门的农业和手工业外围）。随着社会掌握了工业、银行、交通工具、主要的分配中心，这些国有化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和

^① [比] 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高德平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交换资料便丧失了商品的性质而只有使用价值的性质。即使这些使用价值形式上由一家国营企业‘卖给’了另一家国营企业，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和对于每个经济单位来说，这纯粹是结算和一般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的手续而已。在货币形式上，也显出差别来。生活资料是用银行钞票来买的，而生产资料的流通则仅靠账本货币，纯粹是记账而已。除小工具外，用现金购买生产资料是受到禁止的。”^①

商品货币关系在消费品领域中的残存和在生产资料领域中的消灭，造成了在过渡社会中有市场、而无资本的局面。一方面，价值规律的影响仍局部地存在着，局部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也存在着；另一方面，在资源配置中起支配作用的已非市场，而是计划。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过计划与市场是人类社会中两种主要的配置资源的方式及其区别：“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恰如其分地说过的那样……”^② 曼德尔认为，计划与市场这两种逻辑之间存在着带根本性的矛盾，它们的结合只能是过渡时期生产关系的特点，而不能带进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如社会主义——中。

由此，曼德尔得出了过渡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经济秩序，是受两个对抗性的经济逻辑所统治的：计划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因而，过渡社会的特有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非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与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分配关系产生的商品生产因素（带有朝向私人占有和私人致富的动力）的混杂结合。这个结合是……在社会主义未能充分成熟之前资本主义被压制的结果。”^③ 简而言之，占主导地位的计划逻辑与残存的市场逻辑之间的矛盾的结合，是过

① [比] 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

③ [比] 曼德尔：《过渡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规律十点提纲》，何虹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渡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上，总的原则是：“计划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而决不能消极地在市场面前屈服。如果可能的话，计划应当用刺激的办法去领导市场；必要时，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劳动人民自由确定的优先指标而必须那样做的时候，也可以用命令的办法去管制市场。”^① 具体的方法是：“通过一种稳定的通货和消费品（不包括那些免费发放的消费品）价格体系，对生产成本进行准确的计算，这种计算同时受到供求规律的校正。这样一种制度与普遍化的市场经济（不论生产资料私有与否）之间的差异，在于经济和社会作为总体的长期发展上面——占总资源譬如50%或75%的主要稀缺资源的配置，将由广大群众预先以民主方式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市场的任意波动。”^② 其结果就是：“价值规律则通过计划的分光镜而发生作用。物价成为计划化的工具，成为国民收入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之间进行分配的工具，成为在经济各部分之间分配投资等等的工具。”^③

上述计划应当是真正民主集中的计划，这要求广泛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决定资源在消费与积累，以及不同的积累项目之间的配置。这是工人自治在经济领域的初步实现。经济领域中工人自治的实现，要达到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官僚统治被推翻，彻底改变工人被统治的地位；二是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使劳动者享有充分的闲暇，否则，劳动者即便被赋予了自治的权利，自治还是会因闲暇的缺乏而流于形式；三是劳动者达到较高的文化水平。

而现实中存在的苏联等国的计划完全是顺应其官僚主义的需要，经过了官僚主义的系统扭曲的，远非建立在生产者自治的基础上。官僚主义的弊端化身为计划经济的弊端。从短期看，这使苏联原本充满矛盾的经济雪上加霜，从更长远看，这败坏了社会主义计划的声誉，转而助长了对市场

①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3页。

②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③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7页。

的迷信。

第三节 过渡社会中官僚问题的根源

曼德尔指出：“由于苏联经济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管理，苏联经济的计划性和被看作完成计划的主要动力的官僚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苏联经济的主要矛盾。”^① 简言之，官僚主义是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

官僚主义不仅是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以苏联为典型的过渡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以至于曼德尔把它们称为官僚变态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工人官僚国家。可以说，过渡社会的其他问题都与它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由于这个缘故，在曼德尔对过渡社会的论述中，在官僚问题上着墨最多，官僚理论构成了曼德尔过渡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曼德尔官僚理论的优点在于，从客观的经济根源上说明官僚主义，从而使这一理论建立在深刻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一 工人运动中官僚主义的起源

曼德尔指出，早在工人运动中，官僚主义就已初见端倪。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形成一定的机构，由一些具有专门才能的人担任某些特殊的职位和工作，从而形成所谓的官吏和干部，否则，工人运动的磅礴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这就是工人官僚的起源，当然，此时的官僚主义还是潜在的。可见，工人官僚的起源在于工人运动中的专业化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僚主义的起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人运动中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部分成果辩证法（或称局部胜利辩证法）使潜在的官僚主义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巩固下来。所谓部分成果辩证法，简单地说就是，由于获得了一部分成果，就产生了保守性，不再以原来的目标为目标，而是以保护已取得的成果为主要目标。它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就是：“建立机构，这最初只是被视为一种手段，但很快却被视为目的。特别是那些自认

^① [比] 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16页。

为与这些组织具有最为直接的关系、并把自己与这些组织等同起来的人，以及经常参与组织活动、体现机构、扮演主要官吏和未来官僚角色的人，更是把它视为目标。”^① 一句话，由于部分成果辩证法，产生了组织拜物教，把保卫组织视为头等任务。

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化倾向虽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由以下原因和措施而得到克服：官员的民主选举与随时撤换、干部轮换、内部民主、普通成员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对自身权利的坚持、工人组织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忠诚、工人运动领袖对官僚化倾向的自觉斗争，等等。

二 工人国家中官僚主义的客观根源：“一国社会主义”

与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化倾向相比，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由于是与一个社会中特定的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因此，有着更深刻的客观根源。

由生产力的不够发达所导致的劳动的社会分工，是官僚主义的客观基础。劳动的社会分工与劳动的职业分工不同，劳动的社会分工所涉及的，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分。马克思所设想的，正是劳动的社会分工，而非劳动的职业分工的消亡。官僚主义的本质，是本属于工人阶级中每个成员的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被一小部分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人褫夺。这种情况，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的结果，而劳动的社会分工又与广大劳动者自由时间的缺乏，从而没有时间参与社会管理有关。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② 这将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参与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而不再需要一些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行使这种管理权。这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当然也意味着官僚主义的消亡。

由生产力的不够发达所导致的物质的匮乏，也是官僚主义的客观基础。托洛茨基对此作了最清楚的说明：“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费品，因此便引起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如果商店里的货物充足，购买者就可

^① [比] 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高德平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以随时去买。如果货物很少，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而在队排得很长的时候，就必须指派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①

工人阶级文化上的不发达是官僚主义的一个相对次要的客观根源。由于生产力的不够发达、已经形成的官僚阶层对工人阶级思想和文化的钳制等原因，这一点在长期内得不到改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孤立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之内，决定了这些国家中官僚主义的客观基础。因为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条件下，一小部分人对社会管理权的僭取和重新成为统治者、国家机器的强大等陈腐现象必然又会死灰复燃。

比起在工人运动中，部分成果辩证法和组织拜物教在工人官僚国家中得到了新的发展，集中体现为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即把保卫苏联这个“堡垒”，而非继续革命，说成是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首要任务。它使官僚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际上巩固下来。

曼德尔承认，在社会主义革命孤立落后一国的情况下，官僚主义的恶化将是不可避免的。在《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一书的《论官僚主义》（1976年）部分中，和在《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1992年）一书中，曼德尔两次提到考茨基的一本著作和一个比喻。这就是《基督教的起源》，在前言中，考茨基“曾经提出工人阶级的运动和工人的国家也许会与天主教会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成为国教以后一样经历一个官僚化的过程”，但考茨基又指出了两者情况的不同：“如果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时的历史条件与天主教会取得胜利时的历史条件——一个生产力停滞和衰落的时代——相类似的话，那么这个比喻就完全能够成立。但是，实际上，工人阶级在今天夺取政权的条件恰恰不是这样。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为劳动分工的消亡和大众文化水平的革命性发展准备条件。因此，官僚集团的胜利从历史的观点看是不可想象的。”^② 曼德尔一边赞同着考茨基的见解，一边立即提出了一连串的

^① [苏]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编印，第80页。

^② [比]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0页。

反问：“如果工人阶级被迫在生产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比如在俄国，那会怎么样？如果革命没有传播到其他国家，而是孤立地存在于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那会怎么样？……”^① 在《论官僚主义》中，曼德尔不得不承认，在上述条件下，官僚主义会在一段时期内取得胜利；在《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曼德尔没有答案，终止于一连串的问候。身为革命家的曼德尔虽不愿给出明确的令人气馁的回答，但这些反问本身已指向了问题的实质。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更明确地指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夭折就是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没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官僚主义的发展就是无可避免的。托洛茨基说：“归根到底，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世界革命的推迟……苏维埃民主虽然是被全能的官僚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是被法西斯主义所消灭，两者却出于同一原因，即世界无产阶级解决历史为它提出的问题太慢了……如果欧洲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那就会不仅使法西斯主义而且使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立即动摇。”^②

总之，苏联官僚层及适合于它的利益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本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夭折或不彻底的产物，然后，官僚层为了保住和扩大既得利益，又转而在“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指导”下，把革命的这种夭折或不彻底性巩固下来，从而形成了世界革命夭折与官僚层坐大两者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斯大林是这个官僚层的总代表，所谓“斯大林主义现象”，归根到底迎合的是苏联官僚层的利益，因此，只有从苏联官僚层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他们。斯大林与以他为代表的官僚层一样，也是世界革命夭折的产物，因此，不能把斯大林个人的性格、错误作为说明革命夭折的原因，相反地，斯大林个人的性格、错误之所以能得逞，还须到革命的失利中寻求解释。是革命失利把斯大林与他的官僚层推上历史的前台，他们则不遗余力地把这一点巩固下来，从而使两者互为因果。

斯大林主义模式在政治上的特点是高度集权的一党专制：党在国上，

^① [比]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② [苏]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编印，第204页。

党的各级领导人在各级党组织之上，党的最高领袖凌驾于一切之上，他代表党、国家和人民，这为对某个领袖的疯狂的崇拜奠定了权力基础。20世纪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都遵循了这种斯大林主义模式，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权之实现形式的探索以及列宁对官僚主义的严加防范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应当引以为戒。

三 官僚主义的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的关系

对于官僚主义成为苏联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曼德尔除了分析其客观根源，还详细地论述了其主观原因，主观原因主要指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党和国家的领袖对官僚主义认识和策略上的失误。

虽然曼德尔对官僚主义的客观根源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但在曼德尔的诸多论述中，还是倾向于把主观原因视为苏联社会中官僚主义恶化的决定性原因。曼德尔的下面这段话就是这个观点的集中体现：“如果党的工人干部，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政治上正确地回击，就可能引起国际、国内社会和政治力量结构上发生防止斯大林主义的变化。在1923年、1924年和1925年，无论是世界革命的失败，或是苏联工人阶级不问政治的倾向、苏维埃民主的最终窒息、工业化速度的延缓，剩余农产品被富农掌握，这一切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不可逆转的。官僚集团的强化和专政也是如此。党的干部正确的回击可能为相反方向的发展开辟道路，从而使这种倾向日趋减弱。那些干部低估了热月政变和官僚化的危险，而当他们认识到这种危险时已为时过晚，而且又处于极为分散的状态，这些情况对官僚集团日趋强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那么，该如何理解上述官僚主义的客观根源与此处主观因素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性影响”之间的关系呢？可以这样来理解：由“一国社会主义”所导致的生产力落后等客观根源也并非不可改变的，世界革命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领导层的态度，曼德尔相信，在那些官僚主义尚未发展到完全不可动摇的年份里，苏联领导层中的反对派是有能力与它作斗争，有可能打破革命夭折与官僚坐大这个恶性循环的。但是，当官僚

^① [比]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齐春子、胡尔湖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16页。

主义被斯大林发展到根深蒂固、毫无转机的时候，曼德尔也不再相信苏联领导层能改变这一点，相反地，曼德尔诉诸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①来推翻官僚层的统治。然而，工人官僚国家中的政治革命要成功，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革命，换言之，还是要回到世界革命论的观点。

当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或至少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被推翻后，过渡社会由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会得到改变，官僚主义的客观根源会趋于消失。此时，官僚主义仍会因各种主观原因而存在，但由于其根深蒂固的经济根源正趋于消失，官僚主义会变得容易克服得多。这个时候来谈论克服官僚主义的主观措施，才是真正有效的。这些主观措施包括：官员的民主选举与随时撤换、干部轮换、限制官员收入、党和国家的民主、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发展文化革命，等等。

第四节 过渡社会中官僚的性质与趋势

托洛茨基已指出，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曼德尔坚持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官僚不是一个阶级，因为它在各个方面都不符合一个阶级的基本特点。曼德尔指出：“官僚不可能创建一种新的在质的方面不同于过渡时期的生产方式，因为他们不能完全脱离产生他们的那种生产方式。”^② 因此，官僚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寄生的阶层。官僚不是一个阶级还表现在，它没有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只能把阉割过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

曼德尔认为，官僚阶层具有两面性，但曼德尔对官僚阶层两面性的论述前后有一些变化。在《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一书的《论官僚主义》（1976年）部分中，曼德尔认为官僚阶层的两面性表现在，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继续革命。曼德尔指出：一方面，“它们是**非资本主义的，而**

^① 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在一场社会革命中，要改变生产方式，政权从一个社会阶级手中转入另外一个社会阶级的手中；——在一场政治革命中，原则上不要改变生产方式，政权是从一个社会阶层的手中转入同一个阶级的另外一个阶层的手中。”[比]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高德平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82页。

^② [比]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高德平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且从历史上看是与资本主义极端对立的。……他们的特权是在彻底摧毁旧的统治阶级之后、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特权与私有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他们普遍具有“社会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特征就是希望在国际范围内维持现状并制止或反对世界革命的发展。事实上，世界革命的发展在历史上将意味着工人国家里的官僚非法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结束。”^①

一方面，如果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在本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就不会成为统治阶层，享有统治阶层的一切好处，因此，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官僚阶层必须保住本国革命的成果、维持过渡社会的生产方式、反对在本国范围内复辟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如果革命继续发展，他们从工人阶级那里僭取的权力必然又将被工人阶级夺回，丧失既得利益，因此，为了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官僚阶层必须阻止革命的继续发展。因此，曼德尔认为，官僚阶层所要做的，就是维持现状。

从反对资本主义方面讲，官僚阶层是革命的；从反对继续革命方面讲，官僚阶层又是反革命的。因此，官僚阶层具有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性。以上，就是曼德尔前期关于官僚阶层两面性和矛盾性的观点。

然而，在《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一书（1992年）中，曼德尔关于官僚阶层两面性和矛盾性的论述有所变化，这无疑与苏东剧变的拉开帷幕不无关系。在该书中，曼德尔指出：“工人官僚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最清楚地表现在行政权力和货币财富的关系中。官僚集团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掌握货币财富，而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和货币财富的影响。而这个集团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则是体现于如下的事实，即它无法将自己从权力垄断和货币权力相交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法建立起全新的统治机制。”^②在此处，官僚阶层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所指的——正如该书的书名——是“权力与货币”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曼德尔指出，官僚阶层的

^① [比]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高德平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80页。

^②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这种“权力与货币”的两面性和矛盾性也反映在它的意识形态中：“在官僚制的意识形态中，国家拜物教是与经典的商品拜物教结合在一起的——后者是任何显著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的特征……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国家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混合体采取了一种特殊形式对官僚制的作用和职能作辩护。”^①

曼德尔后期对官僚阶层两面性和矛盾性的论述，指出了官僚阶层与货币权力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意味着官僚阶层向资产阶级蜕变的可能性。曼德尔在某处甚至直接地指出：“它（即苏联社会中的官僚阶层——引者注）无法使自己演化为一种新型的统治阶级，而只能蜕变成旧的资本家阶级。”^② 这是与曼德尔前期官僚理论的不同之处，因为在前期的论述中，曼德尔对于官僚阶层在本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是坚决否认的。

其实，托洛茨基早就明确地指出了官僚阶层复辟资本主义的趋势。托洛茨基在1933年10月的《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一文中写道：“官僚主义继续无阻碍的发展，必定会导致经济、文化发展的停顿，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整个社会的向下滑落。但是这就不但会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而且意味着官僚统治的结束。代替工人国家的，将不会是‘社会官僚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③ 曼德尔在《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1992年）一书中转述托洛茨基的观点时也指出：“托洛茨基认为，官僚层的专政是一个历史过渡现象。这种现象，至少在长期中，会无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如果在这种复辟发生以前它不被工人权力、苏维埃民主的恢复所取代的话。”^④（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前期的官僚理论中，也许是革命家的乐观心态使然，曼德尔低估了官僚阶层的反动性，从而对官僚国家的前途也有所错估。曼德尔认为，官

①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② 同上书，第36页。

③ 转引自：[比]曼德尔：《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兆立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第三章，注释[38]。

④ [比]曼德尔：《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兆立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第三章。

僚阶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三角斗争会长久维持下去，使过渡社会的既有革命成果得以保存，直至工人阶级的继续革命改变这一现状。曼德尔没有看到的是，革命夭折与官僚坐大的恶性循环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在把过渡社会往倒退的路上推。现实中苏东剧变的风雨欲来使曼德尔对官僚问题的认识有所变化，曼德尔后期的官僚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回到托洛茨基，即指出了官僚阶层在其性质和意识形态上与资本主义的关联，及其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可能。

曼德尔秉持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官僚阶层要在本国成功地复辟资本主义，必须击退本国工人阶级的反抗。但事实上，官僚阶层几乎无须对付工人阶级的反抗，就复辟了资本主义。曼德尔显然对以下这一点估计不足：长期的官僚主义反革命压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增长一起，互为补充地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长期内难以复苏。

实际上，在不能把革命从少数经济落后国家引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市场（资本）经济的生长、过渡社会经济的枯萎也是那些落后的过渡社会国家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大多数过渡社会国家或激进或渐进地实现了这一点，经济规律使然。

不难发现，曼德尔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在于侧重于对官僚主义之客观根源特别是经济根源的分析，而非仅仅从思想觉悟、工作方法、制度设计等主观层面说明官僚主义，从而使这一理论建立在深刻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它使我们认识到对于官僚主义仅从主观方面采取措施是难以奏效的，还应通过发展生产力消除它的客观根源。只有主客两方面的配合才能根治官僚主义，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一国社会主义”、官僚主义和苏联解体这三者的联结中，曼德尔实际上对苏联解体提出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解释逻辑：“一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落后→官僚主义蜕变→苏联解体。这一逻辑进一步论证和强化了我们在第八章文末所提到的对于苏东剧变的那个基本论点：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官僚层在“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指导下，把世界革命的夭折巩固下来的时候起，社会主义就已经开始失败了，苏东剧变不过是为这个失败画上了一个句号。社会主义不是实现后又失败了，而是由于实现过程中

的夭折而根本就不曾实现。因此，所谓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非但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而且恰恰是社会主义失败的结果和表现。应当说，托洛茨基—曼德尔的这种解释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它不是建立在对苏式传统社会主义的美化这种多少自欺欺人的想法之上，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切实地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的困境及其发生官僚主义蜕变的根源所在，这就是由“一国社会主义”所导致的生产力的落后，使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正常基础之上。

特别是，曼德尔的这些理论早在苏东剧变之前很久就已提出，托洛茨基对苏联历史命运的预见更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而竟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苏东剧变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印证，这就更应引起我们的深思了。托洛茨基—曼德尔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表明了倒退到传统社会主义不是出路，同时也表明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相反地，我们应当从主客两方面创造条件消除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之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实现创造条件。当然，曼德尔的这一官僚理论也并非没有弊端，照他的理论，只能以世界革命为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方案。但正如我们在第八章末所指出，这在当代条件下失之简单和极端。但我们择其善者而从之，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曼德尔官僚理论给我们的借鉴和启示主要应包括：曼德尔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主义主客观原因及其关系的探讨，曼德尔对官僚之性质与趋势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创造使官僚主义趋于消亡的主客观条件，防止在官僚与资本的勾结中走上一条苏东式的资本主义倒退之路。

第十一章 过渡社会的对策与前景

这一章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论述过渡社会中所应注意的问题或采取的措施，或简言之，过渡社会的对策，这部分内容主要参考《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一书中《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1976年）部分；另一部分论述对过渡社会的前景即社会主义的预期，这部分内容主要参考《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中论社会主义经济的章节。

第一节 过渡社会中所应注意的问题或采取的措施

一 最优积累率 \neq 最高积累率

苏联官方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依赖于积累率的增加、生产者消费的压缩，曼德尔指出，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

因为，首先，国民收入并不仅仅分为生产者个人消费和积累两部分，而是分为生产者个人消费、积累和非生产性消费三部分，其中，非生产性消费“包括军火生产，对于在使用价值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没有贡献”^①。如果以 a 表示生产者个人消费， b 表示积累， c 表示非生产性消费，那么，在国民收入 $=a+b+c$ 中， c 的降低，可以使 a 与 b 同时提高；反之， c 的提高，可以使 a 与 b 同时降低。

其次， a 的下降、 b 的上升未必会导致经济增长，这又可以分两种情况来看：

①在 $a+b=K$ 一定的条件下， a 的下降，固然导致 b 的上升，但未必

^①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导致经济的增长。因为 a 的下降，除了通过投资额即 b 的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正面效应外，还有相反的一种效应，即因为对生产者积极性的挫伤而导致阻碍经济增长的效应。因此，当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大于阻碍经济增长的效应时，最终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当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抵不过阻碍经济增长的效应时，最终对经济增长则是不利的。曼德尔指出：“通过相对或绝对降低生产者的消费而获得的额外投资能够带来的最终产出的增加率趋于递减。25% 的积累率最初可以带来 7% 的经济增长，后来就只有 5%、4%，甚至只有 3%。”^① 如果 a 再下降下去，那么经济出现负增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样一个函数中，必然存在这样一个点，使经济获得最高的增长率，在这个点上 b 的数值就是最优积累率，它与最高积累率是不同的。因此，曼德尔指出：“最高积累率永远不会是最合宜的积累率，就是说永远不会使经济能最快地增长。”^②

② a 的下降，会导致生产者蓄意怠工，对生产不负责任，因而不得不依靠“强迫劳动”。所谓的“强迫劳动”是指：“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市场、工资变动、工作无保障和周期性的大规模失业等，都是实施强迫劳动的手段，但是在苏联，这些机制很少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强制的手段，不是市场规律，而是行政控制、压制和镇压——即官僚专制主义。”^③ 这就意味着在国民收入 $= a + b + c$ 中， c 的支出的增加，从而 $a + b$ 减少，用于 b 的部分也相应减少，对经济增长带来阻碍作用。

苏联经济中的实际数据^④也证实了这一点。 a 的下降，导致 c 的增长，

① [比]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2 页。

② [比] 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61 页。

③ [比]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2 页。

④ 同上书，第 43 页：

	a	b	c
初始情况 (%)	55	15	30
官僚主义初期情况 (%)	35	30	35
长期结果 (%)	35	20	45

而且增长的幅度是递增的，因此在短期和长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在短期内， a 的下降尽管导致 c 开始上升，但 b 也还是上升的；但在长期内，由于 a 的下降使 c 的增长幅度递增，于是 b 就趋于下降了。

总的来说，最优积累率有赖于实践中的不断摸索和经济中的民主决策，不仅仅是个计算的问题，要使它真正反映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

二 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曼德尔指出，适当的物质鼓励是必要的，但要注意以下几点：①通过对个人的物质鼓励来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整顿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要比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会取得更好的效果。”① ②物质鼓励最好“通过集体奖金或参与分享企业取得的超额成果”②来进行，因为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③对完成好的工作给予质量奖应被认为是合理的。④必须限制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工资差别，严格杜绝党政工作人员的工资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

曼德尔指出，精神鼓励可以比物质鼓励有更明显的作用，但是，只有当给人们以精神鼓励的国家机关是受群众支持的，精神鼓励才能是有效的。

三 农业集体化的方法

曼德尔指出，在过渡社会，不可强行地实行农业集体化，苏联农业的强迫集体化和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就是这方面的教训。另外，对私人农业任其发展，又会威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产生富农的私人资本积累和对城市供应的垄断。从曼德尔对 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苏联经济史的叙述可知，苏联的经济政策常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为了保持过渡社会的生产方式，强行实行集体化，遭到大多数农民的反抗，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发展经济，允许私人农业的发展，又被富农卡住

① [比] 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高德平译，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0 页。

② 同上。

了咽喉。

曼德尔指出，正确的做法是：“工人国家必须优先考虑成立主要是雇农和贫农参加的农业合作社或集体组织。这些组织在初期必须接受国家的投资和贷款，使他们能够以比私人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进行生产。这些组织必须能够给它的成员提供比中农，甚至一部分富农还要高的生活水平。”^① 这些部门可以实行机械化，以其较高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将大部分中农吸引进来。这样，既不存在强迫集体化的问题，也不会使过渡社会的生产方式受到威胁。

四 发展政治民主与文化革命

曼德尔指出，应在社会主义宪法的范围内允许广阔的政治自由，包括结社、示威、罢工的自由，也包括组织不同的政党，任何派别都能办自己的刊物并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曼德尔指出，社会主义应当实行多党制，因为工人阶级内部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也会形成不同的阶层和派别，也会有不同的主张和诉求。曼德尔在对苏联官僚主义主观原因的分析中认为，禁止其他党派和党内不同派别的存在，是使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抵制官僚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曼德尔指出，党政应当严格分离，党不能在任何程度上代替群众行使权力，党的领导是通过以正确的理论和纲领使群众信服来实现的。曼德尔还指出，应当发展直接民主，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实行生产者自治，这也是国家消亡的开始。

文化革命指在道德、意识、心理等方面的破旧立新，这主要是要克服在长期的私有制经济中形成的个人主义情结。这当然要依靠广泛的宣传和教育，但主要应是社会变革后的自然结果，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个人主义是与特定的经济条件相联系的，为个人利益而努力还是为集体利益而努力，只不过是特定的社会制度下个人自我实现的特定方式而已，与思想觉悟的高低只有很次要的关系。劳动者物质生活的相对稳定和有保障、对社会事务的真正决定权，这些无疑会带来道德观念、心理习惯等方面的变革。因此，不应当在高压下强迫性地使群众进行主观改造，而应首先创造

^① [比] 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高德平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6页。

使心理变革得以发生的客观条件。不顾生产力的条件而要求文化革命，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五 过渡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

曼德尔指出，过渡社会国家之间完全独立发展当然会造成浪费，但全面的一体化目前也要不得。因为各过渡社会国家还远没有发展到摆脱了狭隘的民族情绪、心悦诚服地接受一体化的程度。而强行的一体化会使相对的弱国遭到相对的强国的剥削和压制，大国沙文主义在过渡社会国家之间的死灰复燃无疑是社会主义的悲剧。曼德尔指出，正确的做法应是：逐渐地一体化，逐渐地发展必要的联合，尊重相对不发达国家的意愿，平衡各过渡社会国家之间的差距。相对发达的国家尤其要主动作出帮助和牺牲，以此作出表率，消除狭隘的民族情绪，使各过渡社会国家感受到一体化的好处。在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可以首先成立货币联盟。

六 过渡社会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

曼德尔指出，只要过渡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为低，过渡社会中的贸易保护措施就无疑是必须的，但是，在过渡社会的阵营范围内自给自足也行不通，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曼德尔指出，正确的做法应是：“主动地估计到在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贸易往来中存在的利弊，同时，一定要确定优先发展项目……宁可出售带有一定‘损失’的商品，以便能进口具有‘国际市场价格’的其他商品，如果这种损失小于由于建立注定要长期亏损的工厂而造成的损失。”^① 过渡社会的这种“损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非资本主义范围的扩大和过渡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际贸易中天平的有利一端会逐渐倾向于过渡社会这一边。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愿景

一 社会主义的限度

曼德尔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能解决所有问题，社会主义的主要

^① [比] 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高德平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目的聚焦在解决由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屈指可数的几个问题上：“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百万个以上。我们未必有能力去解决其中一半。我们的企图是很谦虚的。我们不想解决所有问题，或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堂。解决了6个至7个问题便足够了：要消除阶级社会、铲除人与人的剥削和压迫、根除社会不平等，容许社会所有人发展他们的独特潜能、消除战争和群体暴力。”^①而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几个问题的解决，已足以消除目前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危机和痛苦。

二 按需分配的逐渐实现及其影响

“大型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基础已经不是社会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了”^②，与这种新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应当是按需分配这种新的分配方式，但是，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关论述^③，按需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还不能完全实现，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应当是向按需分配的不断过渡和接近。

实际上，按需分配的雏形一直可以追溯到社会工资这种工资形式。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时起，个人工资就不再是劳动报酬的唯一形式，与个人工资并存的，还有社会工资，即社会支付某些福利事业的费用，以满足全体公民的某些需要。曼德尔指出：“这种‘社会工资’预示着，至少是潜在地，未来的分配方式，即朝向满足全体个人需要的经济。以需要为基础的经济是反对商品经济的，因为它优先满足这些需要，因为它不管个人所提供的确切计量过的等价品（交换！）而进行分配。”^④

① [比]曼德尔：《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②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0页。

③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这就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按需分配是不完全的。

④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3—294页。

但是，在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中，经济始终是物资半缺乏的经济，或即便是有了充裕的物资，也首先要供统治阶级挥霍，而不会用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需要，因此，这种社会工资或按需分配的雏形，只包括十分有限的内容，正如曼德尔所说：“放弃的只是工资的商品货币形式，而其斤斤计较的可怜的内容则始终存在。”^①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则要极大地扩充这种社会工资或按需分配的内容，使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由原来的通过交换而分配转为按需分配。“社会可以首先把满足需要的某些费用社会化，其条件是这样的社会化不至于引起费用的大量增长。如果对某一产品的需求，并不因其价格降低或收入增加而有所变化，那么把这一产品的生产费用社会化，对于社会就其整体来说，不会增加任何额外的负担。”^② 因此，可以首先转为按需分配的，是具有以下特点的物资或服务：“1. 性质很相似的；2. 无论价格下降，无论收入增加，其需求仍然不变的；3. 很难用以代替其他按商品经济交换办法进行分配的物资或服务的。”^③ 满足这些特点的物资或服务比如有：基本粮食、城市公交、教育、医疗，等等。

正如曼德尔所正确地指出的：“只有实现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产生新的生活方式。问题不在于宣传社会主义道德，而是要创造社会的和心理的物质条件，使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实行这种社会主义道德。”^④ 社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行按需分配所必将引起的心理革命，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物质生活不稳定和无保障状态，第一次消失了，恐惧和绝望的心情也随之消失了。无保障状态曾使一切个人，其中还间接地包括属于统治阶级的个人在内，产生这种恐惧和绝望。”^⑤ 社会物资的丰裕和接近于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可靠的物质基础——“由于物资丰富，而且又可以自由取得这些物资，人们热衷于占有的心情，也会衰亡的。为‘新的人’，社会

①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4页。

② 同上书，第29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292页。

⑤ 同上书，第305页。

主义的人创造基础的，正是人对于这种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性。对于这些新人来说，团结合作将会同现在损人利己的那种努力，一样地‘自然’。人类博爱不再是虔诚的愿望或虚伪的口头禅，而成了日常的自然的现实。一切社会关系将日益以博爱为基础。”^①

除了使人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按需分配的逐渐实现带来的另一影响，是促使商品货币经济的消亡。

三 商品货币经济的衰亡

商品货币经济的存在归根结底是由于生产的不够发达，要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人为地取缔商品货币范畴，是办不到的，因此，直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商品货币范畴也仍然要在消费品领域残存。然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确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曼德尔指出有三个原因将促使商品货币经济的衰亡。第一，就是上面提到的按需分配的逐渐实现，它会使货币的流通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越来越多的需要既然无须消费者支出货币就能得到满足，那么与货币开支有关的经济生活的范围自然就日益缩小了……实际上，生产者领的‘工资’越来越高，但其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事前就被扣住了，其余的部分则用于更偶然的、更次要的开支。因此，由于基本需要和正常需要都已满足了，金钱在主要经济周转中的地位总是更加缩小，而退居到经济生活的边缘（虚荣性的开支、游戏、奢侈性开支，对于这类开支，社会主义社会将从道义上加以取缔或者用惩处性的课税来施加压力）。”^② 第二，自动化的不断发展使生产中所需的直接劳动不断减少，从而使工资的范围不断缩小。“生产丰富的物资和服务，同时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快地消灭直接的人力劳动，甚至分配过程中也是这样……但是，从生产中取消人力劳动，也就是从成本中取消工资！因此，构成成本的就逐渐只限于企业和企业之间买卖的‘价钱’（购买原料及固定设备的折旧）。这些企业

^① [比] 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6页。

^② 同上书，第303页。

一旦社会化了，需要计算的，很少是真正的钱，更多的是计算单位（即‘理想中的货币’）。由于服务事业在较长时期内还是非自动化的，货币经济还可以在服务事业同服务事业之间的交换中、服务事业同消费者的交换中及国营企业同服务事业的交换中找到藏身之处。但是，随着大型服务事业也自动化……货币经济就会逐渐只限于为‘个人服务’的事业，而其中最重要的（医药和教育）将由于社会上需要迫切而首先彻底取消货币关系。”^① 第三，在分配领域开始的商品货币经济的衰亡向生产领域发展。在过渡社会中，在国有部门之间，生产资料的流通不再需要信用货币，而代之以账本货币，即所谓的“买卖”是通过记账的方式进行的，只有支付工资和向私营企业或合作企业购买原料才需要信用货币。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是降低、而不是增加个人工资，那么企业的周转金也就开始衰亡了。由于‘农业的工业化’，随着农业和分配中先是私营企业，然后是合作企业的衰亡，生产企业和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而衰亡。”^② 因此，商品货币经济不仅在分配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也衰亡了。

四 闲暇的价值化和劳动的消亡

商品货币经济的衰亡只是阶级和国家衰亡的杠杆之一，阶级和国家衰亡的另一杠杆是闲暇的价值化。

在阶级社会中，很长时间以来，闲暇是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的特权，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确实也可以享有较多的闲暇，但由于闲暇的商业化，这种闲暇是被资本所异化的。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创造出了能真正享有闲暇的条件——“公民有了丰富的物资和服务，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在多一点财富还是多一点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再不像从前那样为了满足迫切的需要而受经济必然性的支配，所以这种选择才是真正的选择。经济上剩下来的要求，只不过是机器设备的更新（净投资、折旧）以及保证社会产品能同

^①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3—304页。

^② 同上书，第305页。

人口一样快的增长。但由于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里，同实行计划经济一样，人口增长也将是有计划的，所以人民就完全有了选择的自由。”^① 另一方面，闲暇的价值化也将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闲暇时间的进一步增加及其合理利用，关乎“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即生产者 and 全体公民的自我管理”^② 的实现。曼德尔指出，在现有的工作制度下，劳动者由于不能享有充分的闲暇，即便被赋予自治的权利，自治还是难免会流于形式。因此，曼德尔在列宁提出的“6小时工作+4小时管理活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设想“4小时工作+4小时自我管理”（每周工作5天，则每周工作的总时数为 $4 \times 5 = 20$ 小时）。

正是在拥有充分的闲暇，并且对闲暇最合适的利用中，人的各方面潜能将得以全面地发展起来，“闲暇的价值化就越来越使人民从被动的对象变为各种文化活动（运动、艺术、科学、文学、技术、教育、探险等等）的有意识的参加者……参加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领导工作也将变成积极的、有创造性的，而不再是消极的了……”^③ 自由的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这将取代劳动时间，取代经济效益，成为新社会财富的准则，马克思就此论述道：“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④ 因此，经济增长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像乔恩·埃尔斯特那样认为要求实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由在于它的“生产关系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⑤是不正确的，曼德尔正确地指出，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为生产而生产，并反问道：“为什么要把整个人类男男女女个性的实现和物质目的的巨大积累必然联

①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7—318页。

② 同上书，第313页。

③ 同上书，第314—31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222页。

⑤ 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28.

系起来？为什么废除资本主义的动机不能仅仅为了例如拯救人类脱离核威胁、环境破坏，或者仅仅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竞争对人类健康破坏的压力……为什么所有这些相关因素的有效性毫无例外地要依赖于一种制度是否能够生产得更多？”^①

于是，劳动消亡了，让位给创造的习惯。在文化的起源上，长期以来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劳动的实践是文化的起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事劳动的游戏才是文化的起源。曼德尔根据现代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成果得出结论说，人类在起源时期恰是既劳动又玩耍的，这两者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分离、两相对立的，而劳动的消亡也就意味着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在“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②基础上的重新合二为一，从而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全程。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之基

一 由人类学上的特点所决定的人类需要的稳定性

曼德尔指出，人类具有某些生理上和人类学上的“一成不变”的特点，这是必须要承认的；由这些“一成不变”的特点所决定的人类的基本需要大体上是不变的，也是有限的，而非不断增长的。“稍为严肃的研究一下人类学和历史，就能证明：这些需要恰恰是异常稳定的。食物、衣着、住处（由于某些气候条件的关系，还有取暖）、防止野兽侵袭和躲避风雨、装饰和锻炼筋骨的愿望、传宗接代，这六种基本需要似乎从猿人到真人以来还未变过，现在也仍然占消费开支的绝大部分。加上医药卫生方面的需要（不过是表现了某种自觉程度的保护自己的本能而已）和消遣的需要（不过是扩大了装饰、锻炼筋骨、求知等和人类同样古老的需要而已），少数基本需要几乎就占了甚至是最富裕国家的全部消费开支；这少数基本需要，与其说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毋宁说是人类学上的特点。”^③ 特里·伊格尔顿对于人类基本特点的不变性也持相似的观点。他

① [比] 曼德尔：《何以误解马克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③ [比] 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7页。

不同意那种“坚持认为人性中并没有什么核心的内容是我们无法改变的”^①观点，也就是说，他认为人性中的确有某些不变的东西。他说：“马克思曾谈到所谓的人类‘物种存在性’，而这正是关于人性的唯物主义认识。我们物质机体的性质使我们成为了现在这样有各种需要、会劳动、爱好社交、有性欲、渴望沟通和自我表达的动物。”^②伊格尔顿在此处所说的“人性”中“无法改变的”那部分“物种存在性”，实际上也就是曼德尔所说的“人类学上的特点”。

曼德尔根据由“人类学上的特点”所决定的人类基本需要的有限性，推论出按需分配的可能性：“既然这些需要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基本上是不变的，既然连过去最富有的有产阶级也没有在消费开支上超出这种异常狭窄的需要范围，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达到物资丰富、个人觉悟和社会觉悟都比过去成熟得多、这会在需要方面引起极大的变化。‘效率递减’规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在需要的强度问题上那样适用。”^③在此处所讲的“‘效率递减’规律”的基础上，曼德尔又发展了由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首先提出的“就逐个产品界定丰裕”的方法，从而进一步论证了按需分配的可能性：“丰裕在理论上的正确定义是指需求的饱和。当某一产品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大约为零或在零以下，这时该产品可以说是丰裕的——应予以注意的是，在这个水平上，对该产品实行免费分配，较之以不断下挫的‘实际’价格继续出售该产品，在经济上要更有效率，因为产品的分配成本会大大降低。长期的统计数据，尤其是西欧的数据，提供了压倒一切的证据：大量产品在较为富裕的国家可以划归这类范畴——这不仅对于百万富翁是如此，而且对于大部分人口也同样如此。”^④根据曼德尔的“就逐个产品界定丰裕”的方法，一个物资丰裕的社会就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① [英]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② 同上书，第85页。

③ [比] 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7页。

④ [比]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

二 由人类学上的特点所决定的人性的可塑性

由“一成不变”的“人类学上的特点”所决定的人类基本需要的有限性，提供了按需分配的可能性，这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人性”的另一方面，是它的可塑性。

对于人性为什么是可以被不断塑造的，曼德尔从人类学的角度作了论证。“人类生物学认为人是早产的胚胎^①，从而具有一种生理组织，能够更长久地学习，并有几乎无限的适应能力——这是有赖于作为母体外胚胎而生存一年的过程中的积极性和社会化。这里，系统发生学证实了胎生学，因为现在胎生学界已普遍同意人类起源时期就有同样的积极性（有意识训练的产生）和社会化。”^② 据此，曼德尔认为：“适应和学习几乎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人类学上的根本特征。”^③ 换言之，“人之本性，恰恰正是其适应能力，通过训练而创造第二本性的能力；正如阿诺尔·盖伦教授所说，人只有通过训练才能生存。”^④ 正是以此为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按需分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所必将引起的心理革命，才是可以理解的。

三 对两种错误人性观的驳斥

曼德尔的上述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的观点提供了人类学的论证，驳斥了“人性本恶”、“人性自私”的谬论。这种“私人意识”的根源不应到“人性”中，而应到经济基础中去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论述中指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

^① “直立的姿势使女性的骨盆变窄，无疑是造成人类太早分娩的一种原因。” [比] 曼德尔：《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向青译，第十七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② [比] 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307 页。

^③ 同上书，第 306 页。

^④ 同上。

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① 马克思的这段话揭示了“私人意识”的根源所在，即私人劳动以物的关系为中介的间接社会性。另外，马克思又指出，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个人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② 这表明了劳动的直接社会性，而这正是同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相区别和对立的重要特点，在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上，“私人意识”的根源消失了，“人性本恶”、“人性自私”的观点成了无根之浮萍。

除了“人性本恶”、“人性自私”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性中潜藏着非理性的部分，批评“马克思只考虑人性的一部分，（即）那些理性的和以利润为指向的人，而轻视了潜在（于）人性中的兽性本能。”^③ 比如，伯恩费尔德与赖希就认为，“在人的行为中有着非理性的方面，它似乎滥觞于裸猿人化的最初阶段，它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反叛或个体对与文明相伴而生的社会行为规则的拒斥。”^④ 伯恩费尔德与赖希并且以此解释“为什么部分工人阶级同意服从于最恶毒的敌人的利益”等社会现象，指出：“一心要（在群众组织或国家中）攫取权力的统治者或蛊惑人心的政客，会故意利用这种非理性主义。如果他们的对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仅仅以合乎逻辑的观点相回应，就可能失败。”^⑤

对人性的这种观点似乎是得到现代科学的支撑的，但是，曼德尔指出，把它作为个体心理学来研究是一回事，从这种个体心理学出发去解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③ [比]曼德尔：《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④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⑤ 同上书，第161—162页。

人类历史现象则是另一回事，后者所表现出的一个基本缺陷就是：“它不能解释下述事实：为什么永久起作用的力量导致的结果却各不相同。历史是变动不居的，而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成分至少几千年来没有变化。还是这些群众，他们在希特勒崛起过程中表现出非理性主义因素，但就在10年前，却采取了完全理性主义的行动：在1920年粉碎了卡普—冯·吕特维茨的暴乱。还是这些群众，他们在1914年8月如此卑鄙地接受了战争和屠杀，在1917—1918年，至少在俄国、德国和奥地利，则以同样激烈的态度反对战争。这些个体心理学和集体心理学之‘谜’，只有在下述不断变动的现实历史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这些现实包括：群众生活状况、主要社会阶级之间及其内部的力量对比、不同思潮和政见的影响力，等等。”^①也就是说，“人性”中固然存在着潜意识、非理性的成分，但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它们所导致的结果可以是截然不同的。在一个非理性的社会中，人性中的非理性部分会转变成破坏性的力量，但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人性中的非理性部分或者可以受到调节遏制而不对社会发生明显的影响，或者可以对社会产生完全积极的影响。正因为人性中非理性部分的存在——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我们才特别地需要一个理性的社会。

曼德尔对过渡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关系、经济规律、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的探讨，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现实中过渡社会的实践经验，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前者提供了问题的“实然”方面，后者提供了问题的“应然”方面。两相比较，就“呈现”出现实中过渡社会的问题与不足，及与之相应的对策。这样，曼德尔就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又没有离开现实基础，而对新的实践经验作了理论概括。曼德尔对过渡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关系、经济规律、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的探讨，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指导下，在苏联过渡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社会理论的发展。

曼德尔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在苏联等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点补充，以一些新的材料和

^①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数据支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

当过渡社会的现实问题与我们照面的那一天，曼德尔的这份理论遗产，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一点补充和发展，会彰显它的价值。当然，由于过渡社会经验的有限性和特殊性，曼德尔的这些理论必然要在新的更丰富的过渡社会实践中接受验证和发展。

结 语

对曼德尔思想的巡礼至此告一段落了。曼德尔作为 20 世纪下半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第四国际”的主要领袖，他的著作种类繁多，内涵包容宏富，本文不可能、也不打算述及曼德尔思想的方方面面，而是通过对曼德尔思想的全面梳理和把握，力图围绕“晚期资本主义”、“革命”与“过渡社会”这三个关键词，勾勒出曼德尔思想的主要面貌，并揭示其意义。“晚期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典型的“过渡社会”是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主要的社会现状，曼德尔对此两者的批判指向革命的结论，服务于他革命的实践。按照曼德尔的革命战略，只有“晚期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以苏联为典型的“过渡社会”中的政治革命相互配合、共同推进，才能完成世界革命的总体进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奠定基础。因此，不仅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过渡社会理论和他的革命理论是统一的，而且曼德尔的所有这些理论与他的革命实践是契合无间的。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以苏联为典型的过渡社会的批判是曼德尔的两条思想战线，是曼德尔思想的两翼，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则是联结这两条战线的纽带、凝聚曼德尔思想的核心，也是将理论的战线引向现实的战线的枢轴：这样一个“三位一体”最扼要地概括了曼德尔的思想面貌甚至曼德尔的人格。

就曼德尔的理论而言，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是他最重要的理论建树，不少重要的西方左翼思想家都从中汲取了灵感，甚至“晚期资本主义”一词亦成了表征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名噪一时的专用术语。曼德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经济理论运用自如，且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全面深入地剖析了“晚期资本主义”这个继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内在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在国际、国内层面上，在社会各个领域

中的表现。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中建构起了资本主义一以贯之的旧本质与它在这一阶段上所表现出的层出不穷的新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这一“理性抽象”与晚期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感性具体”之间建立了桥梁，而这座桥梁的建构本身就呈现出一种新的“理性具体”。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性具体”，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的“理性具体”，那么，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则是——或者说力图达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理性具体”。因此，曼德尔的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尤其是其经济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应用和发展，对我们认识和研究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就曼德尔的理论特点而言，曼德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论述主要着眼于经济领域，这既是一种不足，也是一种优点。说它不足，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矛盾和危机是全面的，大大超出了经济领域。与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论述相比，曼德尔的视野就显得比较狭隘。说它是优点，因为紧紧抓住经济领域不放、把它作为理解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透视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刻之处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其他领域的矛盾和危机归根到底是由经济领域的矛盾和危机所决定的，因而，经济领域的矛盾和危机是理解其他领域矛盾和危机的锁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局限于经济领域，至多是不够全面，但若忽视了经济领域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则会偏离正确。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和拥护者所害怕和极力要避免的，是对资本主义伤筋动骨，而资本主义的“筋”和“骨”恰恰在经济领域，于是，他们往往倾向于淡化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把其他领域的问题如文化危机、政治危机说成是主要的，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无可回避时，他们所开出的药方至多是给资本主义的“皮肉”动动刀子。只有像曼德尔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死死点住资本主义的死穴不放，而这也势必要得出革命的结论，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死穴正是最不容商量之处。

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结稿于20世纪70年代初，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60年代末的长波扩张期。而大约从70年代起，长波转入收缩期，资产阶级的国家政策也随之

有所变化，例如由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转变为弱化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那么，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在此后是否适用？安迪·克米斯特就此指出，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虽然国家干预的形式有所改变，但国家干预未变，国家干预与新自由主义并行不悖，“比较恰当的看法是：新自由主义属于比较低的抽象层次，而‘资本主义阶段’（如晚期资本主义）的抽象层次则较高。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各种资本主义战略的综合，源自于特定的具体历史环节，而这些历史环节又是受到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独特阶段）的各种基本特征所形塑。”^①因而，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没有过时。

在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理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贡献，它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50年左右的长周期现象作出解释。在曼德尔之前，虽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或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如帕尔瓦斯、考茨基、盖尔德伦、托洛茨基等）首先注意到了这种长波现象，但他们并没有系统地理论上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于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学者。资产阶级学者虽然对长波现象提出了种种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在论证的细致和严谨上超过了各类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其理论出发点是悖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因此不可能对长波现象作出真正科学的说明。在这一总体背景下，曼德尔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系统地阐发长波理论，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经济学理论内在契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经济现象面前表现出它的生命力和涵容力。曼德尔的这一尝试不无成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导的国际学界争得了话语权和一席之地，也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探索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曼德尔以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之方法论的中间环节理论来统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以此作为建构长波理论的重要理论媒介，也是本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方法论上的开掘。但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四次长波的分析在时间节点上只截

^① [英] 安迪·克米斯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新版导言》，万毓译译，载曼德尔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至 20 世纪 70 年代，自那以后，历史的车轮又走过了三四十个年头，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经济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发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是否还能以曼德尔的长波理论统摄资本主义经济新近的发展？如其不然，又该在曼德尔的理论基础上作出哪些发展或更正？这是在对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作出系统的梳理和客观的评价之后，留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探索和填充的理论空间。

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与稍前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起构成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武库。如果把曼德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加以系统的研究，一定也会受益颇丰，并对曼德尔的经济学贡献有更深入的认识，但由于本书在立意上并未打算过分偏重经济学的理论细节，因此除长波理论外未能在这方面作出更详细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这也许会成为笔者下一阶段的研究课题和方向。

如果说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包括其中的长波理论）具有较强的原创性，那么他的革命战略理论和过渡社会理论则带有明显的托派印记。托派虽有其固有的理论局限性，但客观而论——特别是经过了近几十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沉淀之后，其中也不乏正确甚至深刻之见。比如，对于以苏联为典型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托洛茨基—曼德尔对它们的性质的界定，对它们的成因的分析，对它们的弊端的揭露，颇能切中这些国家的要害。托洛茨基早就指出，官僚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客观的物质方面，即生产力的低下和物质的匮乏，而不在于主观方面。在前者得不到改变的情况下，主观上任何反对官僚主义的努力所能取得的效果都只能是有限的。曼德尔继承了对官僚主义的这一唯物主义说明，并结合苏联官僚主义的发展历史，对官僚主义的主客观原因作了比托洛茨基更为专门、详细的分析，以《权力与货币》为标志，形成了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这一理论虽是曼德尔过渡社会理论中的一部分，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为我们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重新反思和矫正官僚主义现象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托洛茨基—曼德尔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表明了倒退到传统社会主义不是出路，同时也表明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托洛茨基—曼德尔的世界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的第二部分)至今还是一个颇富争议、也有待历史验证的命题,但是,他们在世界革命论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预见不是在苏东剧变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从而颇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吗?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世界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新的世界局势下各自探索着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若仍一味拘执于世界革命,否定除此以外的其他发展道路,就显得教条和狭隘,而表现出托派的理论局限性了。

如果说对以苏联为典型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曼德尔过渡社会理论中的现实部分,那么,他对建立在扬弃了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过渡社会的预期,则是曼德尔过渡社会理论中的理想部分。在后一部分中,曼德尔本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则性提示,勾勒出理想的过渡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轮廓,预见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这一理论具有前瞻性、超前性甚至空想性,无疑要接受社会历史之进一步发展的验证。但它作为一种本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精神的社会理想模型鞭策着我们,教我们保持着面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进步动力,不忘马克思主义者的终极使命。

曼德尔的异化理论在深入分析马克思异化观点之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论述了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四种表现形式及其经济根源,揭示了对马克思异化观点的各种误解误读背后深刻的现实根源,指出了异化固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着,在扭曲的过渡社会即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并没有消除,并指明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和官僚专制的革命实践才能创造出使异化消亡的先决条件,从而系统地勾勒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

如果说曼德尔的革命战略理论带有明显的托派印记,那么曼德尔的革命主体理论特别是阶级意识理论则是对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曼德尔论述了先锋党、先进工人、工人群众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描画了革命意识和革命行动在这三者之间不同的传导机制,这应当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分析,其中既体现了曼德尔对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等革命家的组织理论的熟稔运用和取长补短,也体现了曼德尔作为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家对近年来世界各地革命活动实际经验的总结。曼德尔也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阶层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不同影响以及无产阶级的应对

策略，与上述内容一起构成了曼德尔的阶级意识理论，成为曼德尔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曼德尔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当代运用和发展。

总体来看，曼德尔是一位激烈的批判家和革命家，他的激烈中不乏偏激，也因此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局限。他没有一个着眼于近期的改革方案，不顾条件地把革命置于议程之上，否认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以及在缓和矛盾、延缓革命上所确实起到的作用。一方面，他低估了整个资本主义机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对无产阶级意识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他高估了（比托洛茨基更高估）那些工人官僚国家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意义，低估了工人官僚国家中官僚的反动性，对工人官僚国家的发展趋势作了错误的预见。此外，像苏联那样蜕化到一定程度的官僚国家是不是属于“工人国家”的范畴，是不是仅由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就应当把它们定位为“工人国家”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社会”，从而认为它们就比资本主义优越，就应对它们采取无条件捍卫的态度？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些观点也是可以商榷的，诚如对马忠行所指出。总之，对资本主义的低估和对官僚国家的高估不仅是曼德尔，也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普遍失误。

此外，作为革命家的曼德尔也并非没有性格的缺陷，塔里克·艾里在为简·威廉姆·斯丢特著的曼德尔传记——《埃内斯特·曼德尔——一个反叛者的被推迟的梦想》——所写的前言中写道：“简·威廉姆·斯丢特提供给我们的并非一本圣徒传：他写到曼德尔经常‘不愿——若非不能的话——保卫他信念的完整性，他倾向于在关键时刻妥协。’依我之见，当曼德尔参加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之标志的冗长争论时，情况更是如此。”^①“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之标志的冗长争论”，这确乎点出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冗长的争论以及由此引起的分歧往往耽搁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行动，这似乎不只是曼德尔个人的性格缺陷，而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某种性格缺陷了。

尽管有着托派的理论局限，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曼德尔的晚期资本

^① [巴基斯坦] 塔里克·艾里：Ernest Mandel—A Rebel's Dream Deferred, “Foreword”, Verso, 2009。

主义理论和过渡社会理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且不管其理论上的得失，他的着眼于世界全局的国际视角，他的理论与实践完全统一的品格，他的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对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是值得每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肃然起敬，并引为榜样的。

附 曼德尔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一个重要的但长期没有受到我们重视的思想，曼德尔的《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一书中对此作了专章讨论。

东方市场作为英国工业销售渠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马克思想要了解这些社会结构对此的反应，这是马克思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初衷之一。马克思想以此来解释印度、中国、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发展与西欧的历史发展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或者说，想用以否定式地揭露那些在欧洲导致资本和资本主义兴盛的正面因素，这是马克思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初衷之二。总之，马克思不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而是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看待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可能是在三种思潮的影响下提出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等经济学家，关于东方国家的游记、回忆录和专著，以及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乡村共同体的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首次讨论见诸1853年6—7月他们之间的三封通信，以及马克思6月10日的一篇文章（见于6月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随后马克思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多篇文章中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但要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充分的讨论。

在1853年6—7月的三封信中和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四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足够详尽地阐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曼德尔将它们归纳如下：“（1）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首要特征是土地私有制的不存在。（2）因此，乡村共同体保持着一种极重要的内聚力，从而经受住了那个时代里最血腥的征服。（3）古代乡村共同体的这种内部凝聚

性又因存在于其中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统一而进一步增强。(4)然而,由于地理和气候原因,这些地区农业的繁荣需要可观的水利工程:‘人工灌溉在此处是农业的首要条件。’这种灌溉几乎要求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处于核心的权威来管理它和承担大型工程。(5)由于此种原因,国家成功地把社会剩余产品中的较大部分集中在自己手里,这导致靠这些剩余产品供养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并构成社会的统治权(由此有了‘东方专制主义’这一表述)。这种社会的‘内在逻辑’有利于维持基本生产关系中很大程度的稳定性。”^①

所有这些特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都提到了,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又提出了许多额外的观点,它们能使我们更精确地界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这一表述所表达的含义。曼德尔就此展开了具体而深入的论述,以下是其中主要的观点。

第一,东方国家中城镇的十分偶然的和次生的发展,以及它们对于国家首脑或它们的总督的严格从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被强调了多次。这意味着生产仍然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城镇既从属于农业又从属于中央政权这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结构意味着资本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中国在明朝时经历了奢侈品生产和私人贸易的扩展,以至于到达了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的门槛前,但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结构使中国没能跨过这一门槛。

第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存在,产生了对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需求,而后者由于服务于农业,没有为资本兴起留出可能性。中国农民的“高超技艺有赖于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存在,其规模是如此之巨,以至于不是各公社,甚至公社集团或一个省份所能承担的。从中产生了对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客观需求及这一角色的功能,这也使得大型制造业的相当快速的发展成为可能——比在欧洲快得多——但并没有产生出一个自由的资产阶级,即便是在该词的中世纪的意义。国家太强大了,它加于货币资本积累的是一种太不连续的规律,它将所有的智力和科学活动太彻底地服务于农业的要求,从而没有为这样一种过程留出可能性,即相当于发

^①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 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年版, 第 121—122 页。

生在西欧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和伴随着自由无产阶级的现代工业的形成过程。”^①

第三，那种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无阶级社会或阶级尚未充分发展的社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有明确界定或构成的社会阶级，与农民并存的有公职人员、手工业者、地主、商人、银行家等阶级。但与一般阶级社会不同的是，由于面临着庞大的国家政权，这些阶级经济上的富裕不能使他们获得社会和政治权力，而正是这种社会和政治权力在其他国家催生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确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元素，“大规模的地产即使不在法律上存在，那也在事实上存在，它们以劳役的方式耕种，或者迫使农民交付地租”，但这种“封建主义”的元素并未发展成封建社会，这一封建阶级并未发展成统治阶级，其原因在于，“它的发展常常被视为对国家权力和农民权利的侵犯，并且当这些侵犯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周期性地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危机通常以农民战争推翻统治王朝而告终，而新产生的王朝又使地主们臣服。”^② 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封建社会的区别所在。

第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保持了他在1853年的观点，即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交换的瓦解作用所表现出来的抵抗，他写道：“贸易显然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它所涉及的共同体发生作用。它将或多或少地使生产服从于交换价值；它使人们的生存更依赖于销售，而非产品的直接使用，相应地，直接的使用价值就被推得越来越远直至进入幕后。它瓦解了曾经确立的关系。它因而加强了货币的流通。它首先掌握了剩余产品的生产，然后逐渐控制了生产本身。但是，它的瓦解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贸易所涉及的这些生产性共同体的性质。因此，它几乎没有扰乱印度的古代共同体，或总的说来没有扰乱亚细亚的环境。”^③

第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原始共同体的解体，就像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原始共同体中，人们紧密地融合于生存的自然条件

^①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1971年版，第129页。

^② 同上书，第134—135页。

^③ 同上书，第136—137页。重点由曼德尔所加。

中，融合于共同体中，“他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共同体的财产。”^① 原始共同体的解体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来说不啻为一场悲剧，因为他们被切断了与其土地的天然联系，这意味着生产者与其传统的劳动资料的分离（比如独立手艺人情况），以及与他们甚至在开始生产前就拥有的消费基金的分离。这样就使他们处在向资本出卖劳动力的经济压力下。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之一“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② 只要仍然能够自由进入相对丰裕的土地，那么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不可能的。然而另一方面，也只有当这种发展超越了原始共同体的阶段，人类才开始个体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说：“……人类只有在历史过程中才会个体化。”^③ 它为个体的完全成熟以及“……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④ 创造了必需的条件，而这些在原始共同体中是阙如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受压抑的。

从曼德尔的不断刻画和反复强调中可以见出，水利和其他大型公共工程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国家的庞大和专制性质，以及土地私有制的不存在，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② 同上书，第471页。

③ 转引自：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Brian Pearce 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1971年版，第13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参考文献

论著部分：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7、16、21、22、23、31、39上、42、46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31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 《列宁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
7.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9. [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0. [比]曼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华、杜章智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1. [比]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高德平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 [比]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齐春子、胡尔湖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64、1979年版。
14. [比]曼德尔：《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向青译，“中文马克思

主义文库”网，<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

15. [比]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张乃烈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6. [比]曼德尔：《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兆立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7.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Steve Bloo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18. [苏联]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

19. [苏联]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柴金如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版。

20. [苏联]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三联书店资料室1965年版。

21. [苏联]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石瓮、施用勤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22. [苏联]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齐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23. [苏联]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王凡西、郑超麟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4. 阎志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极左派——托派“第四国际”》，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 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26. 陈秋霞：《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山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27.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8.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9. 刘平梅：《中国托派党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30. 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流亡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31. [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大洪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2. 罗伯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高德平译，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

33. [法] 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刘宏宜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34.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版。

35. 郑超麟：《不断革命论 ABC》，“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36. [捷克] 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37. 《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东方出版社 2010 年版。

38. 《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 2》，东方出版社 2010 年版。

39. [英]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 2011 年版。

40.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41. 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42. [美] 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43. 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4. Jan Willem Stutje: *Ernest Mandel—A Rebel's Dream Deferred*,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Beck and Peter Drucker, Verso, 2009.

45.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1843 to Capital*,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46. [德]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331 页。

47. 王凡西：《苏联研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48.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现状与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84 页。

论文部分：

1. [比] 曼德尔：《何以误解马克思》，载 [加] 罗伯特·维尔、

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王来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比]曼德尔：《过渡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规律十点提纲》，何虹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3. [比]曼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4. [比]曼德尔：《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5. [比]曼德尔：《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6. [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基本矛盾》，“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7. [比]曼德尔：《今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教派主义还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8. [比]曼德尔：《货币主义的没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9. [比]曼德尔：《欧洲货币大混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0. [比]曼德尔：《从反对资产阶级大学走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南灿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1. [比]曼德尔：《当代世界革命——托洛斯基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2. [比]曼德尔：《世界革命的现阶段》，涓滴摘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3. [比]曼德尔：《苏联的社会性质与社会主义民主》，容智仁选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4. [比]曼德尔：《建设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晨星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5. [比]曼德尔：《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6. [比]曼德尔：《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薛彦平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7. [比]曼德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的一党制和

官僚制度》，李宗禹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8. [比]曼德尔：《共产主义的前途》，许由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19. [苏联]斯·缅希科夫、[比]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对话》，于洪君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0. [比]曼德尔：《新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刘元祺摘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1. 《“资本家不知怎么办”——曼德尔访问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2. [比]曼德尔：《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廖化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3. [比]曼德尔：《莫斯科审判案受害者的平反》，小点摘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4. [比]曼德尔：《建立“第四国际”的理由及其现时的有效性》，“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5. [比]曼德尔：“The Causes of Alienation”，“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网，<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

26. 维尔卡曼（Francois Vercammen）：《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7. 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曼德尔（1923—1995）思想肖像》，万毓泽校订，“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8. [苏联]托洛茨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过渡纲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29. 陈东：《纪念革命家曼德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30. 王国宏：《曼德尔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载《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4期。

31. 张亮：《晚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晚期资本主义”：一种历史考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2. 赵光武：《晚期资本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

33. 唐正东：《在科学抽象与具体历史之间：方法论的视角》，载《东

岳论丛》2008年第3期。

34. 刘英杰：《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

35. 张金清、吴有红：《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分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6. 王莉娟：《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初探》，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3期。

37. 马建堂：《长波理论模型评述》，载《中州学刊》1990年第3期。

38. 许建康：《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载《经济纵横》2009年第11期。

39. 孟捷：《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40. 孟捷：《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41. 肖磊、赵磊：《长期经济波动理论研究述评》，载《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42. 曹浩瀚：《曼德尔的工人官僚理论略述》，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2期。

43. 王国宏：《曼德尔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国外名家论社会主义（二）》，载《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4期。

44. 罗燕明：《战后西方左翼关于技术的争论》，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6期。

45. 韩雅丽：《詹姆逊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46. 杜建国：《曼德尔是技术决定论者吗？》，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0期。

47. “Tariq Ali interviews Ernest Mandel—The Luck of a Crazy Youth”，“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网。

48. John Molyneux：“Contradictory states”，“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网。

49. 李莉：《托洛茨基的文艺观》，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5期。

50. 邱运华：《问题与主义：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研究》，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51. 郑异凡：《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简论》，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2期。
52. 陈秋霞、李尚德：《托洛茨基的重大理论贡献——纪念托洛茨基诞辰130周年》，载《学术论坛》2009年第10期。
53. 刘平梅：《书评〈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54. 谢山：《〈中国托派史〉是怎样一本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55. 王凡西：《评〈中国托派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56. 王凡西：《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兼答彭述之夫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
57. 王凡西：《苏联与社会主义》，<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wangfanxi/marxist.org-chinese-wong-195007.htm>。
58. 吴晓明：《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我的博士论文后记记录了写作本书初稿的心路历程，因此特附录于下，以为纪念，亦聊致谢忱：

在复旦完成博士学业之际，已近而立之年了。已近而立之年，而尚未踏上工作岗位，尚是一个未经世事的书生，更谈不上成就任何事业，想起来颇多感慨，比起年纪轻轻就早已发迹的左亲右邻更不禁令人汗颜。但是，我对把本已无多的青春的尾巴付诸进一步的求学，仍颇感值得。因为我深知，在这个喧嚣浮夸的时代，能够躲进象牙塔内心无旁骛地读一点书，与其说是一种艰辛，不如说是一份难得的奢侈。我争取到了这份奢侈。尤其是在读博前有了短暂的工作经历，饱尝了整块的读书时间被各种俗务肢解得支离破碎的痛苦之后，更感到这份奢侈的可贵。

我天资愚钝，虽然对书本有着一种天生的癖好，但真要读起来却往往事倍功半，食古不化。幸赖自己的一点勤奋和执着，自我感觉在复旦的三年还是颇有收获的，自然，这本论文便是主要的收获之一。

说起来还得感谢复旦宽松而不失严谨的学习环境，以及我的导师孙承叔教授。与我以前的经历相比，我确实感到了复旦的优越性，这一点是无须讳言的。孙老师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和信任构成了我学习上的重要动力之一。每当你提出了一点新的想法或取得了一点初步的成绩时，他不会吝啬对你的鼓励甚至赞扬，但真当你拿出了比较成形的成果时，他又决不会让你感到满足，而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这是我在临毕业前所总结出的孙老师的基本教育方法，就在他这

一松一紧之间恰到好处地控制着促人进步的张力。

我对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经过了好几次的游移，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网上读到了一篇曼德尔驳斥另一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乔恩·埃尔斯特的文章，深为其流畅犀利的文笔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所折服，便开始关注他并初步决定以他为研究方向。当我把这一想法告知孙老师后，得到了他的多次赞同和鼓励，遂使我下定决心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地读起曼德尔的文章著作来。

曾有一个时期，我们几个学生每隔一周的周一上午都要去孙老师的办公室与他交流心得感悟，我们三个一排坐在沙发里，他则面对着我们坐在那张转椅上，相互之间侃侃而谈，那是非常美好的回忆。的确，我在孙老师身边没有什么压抑感和拘束感，表达起自己的观点来，不仅在同门师姐妹面前好为人师，在孙老师面前亦不甘谦虚。就在这种其乐融融的对谈中，我推进着博士论文的初步写作。当然，在我写出部分的初稿后，孙老师又多次高屋建瓴地向我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促进我的论文不断完善。

除孙老师外，本院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的陈学明、邹诗鹏、郑召利、王金林等教授在开题、中期考核或预答辩时也曾就我的论文作出过指点，无疑也要向他们表示感谢。几位老师在预答辩时对我论文的肯定使我获得了在学术上继续耕耘的信心。当然，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本论文的写作不过是一次差强人意的学术锻炼；以我天资之愚钝，要想在学术上真正耕耘出一片天地来，不知还需要若干年的勤奋。

最后，要感谢父母对我生活上的照顾，使我能专心向学。否则，连读博都难以如愿，遑论本论文的写成。此外，也许值得一记的是，此论文的孕育过程与妻子孕育小宝宝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此论文正式答辩之时也将是小宝宝诞生之际。这意味着我将在双重意义上踏上人生的新的起点，前面有着未知而充满希望的人生等待我去开拓，去耕耘。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当我来到浙江工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以后，又获得了一个同样良好的治学环境，使我能在授课之余顺利地把这

一研究继续推进。经过一年多的修改、完善，不仅对博士论文有了量的扩展，而且也有了某种质的提升，虽然这点进步从更高的层次来看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我自己来说总还是值得欣慰的。在这个过程中，本书得到了201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后期资助（课题名称：“当代托洛茨基主义——埃内斯特·曼德尔思想研究”，课题编号：15HQZZ015），使它终于有机会出版问世；此外，这项研究也是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名称：“托洛茨基主义理论述评”，项目批准号：15YJC710039）的部分成果。本书能够获得立项，既是对我的资助和支持，更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全书完稿之后，我的博士导师孙承叔教授又在炎炎夏日拨冗审阅，并泼墨作序，令人感激之余深受激励。孙教授的“序”不仅以其高超的理论驾驭能力条分缕析地概括提炼出拙著的主要意思，而且以其自己的视角将这些理论引向对于中国现实的意义，从而，这些我本已十分熟悉的材料经过孙教授的重新组织，竟又焕发新意、颇富启迪！我曾说，此初稿的写作与小宝宝的孕育几乎是同步的，而今，它的修改完善又伴随了吕晨宁小宝宝最初的成长历程，希望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自己学业上的一点小小成绩之余，也成为致他的第一份薄礼。

吕佳翼

2015年7月31日子夜
于无锡万科寓所

当代托洛茨基主义

——埃内斯特·曼德尔思想研究

Dangdai Tuoluocijizhuyi
Aineisite Mandeer Sixiang Yanjiu



扫一扫
获得更多新书信息

ISBN 978-7-5161-8799-9



9 787516 187999 >

定价：56.00 元